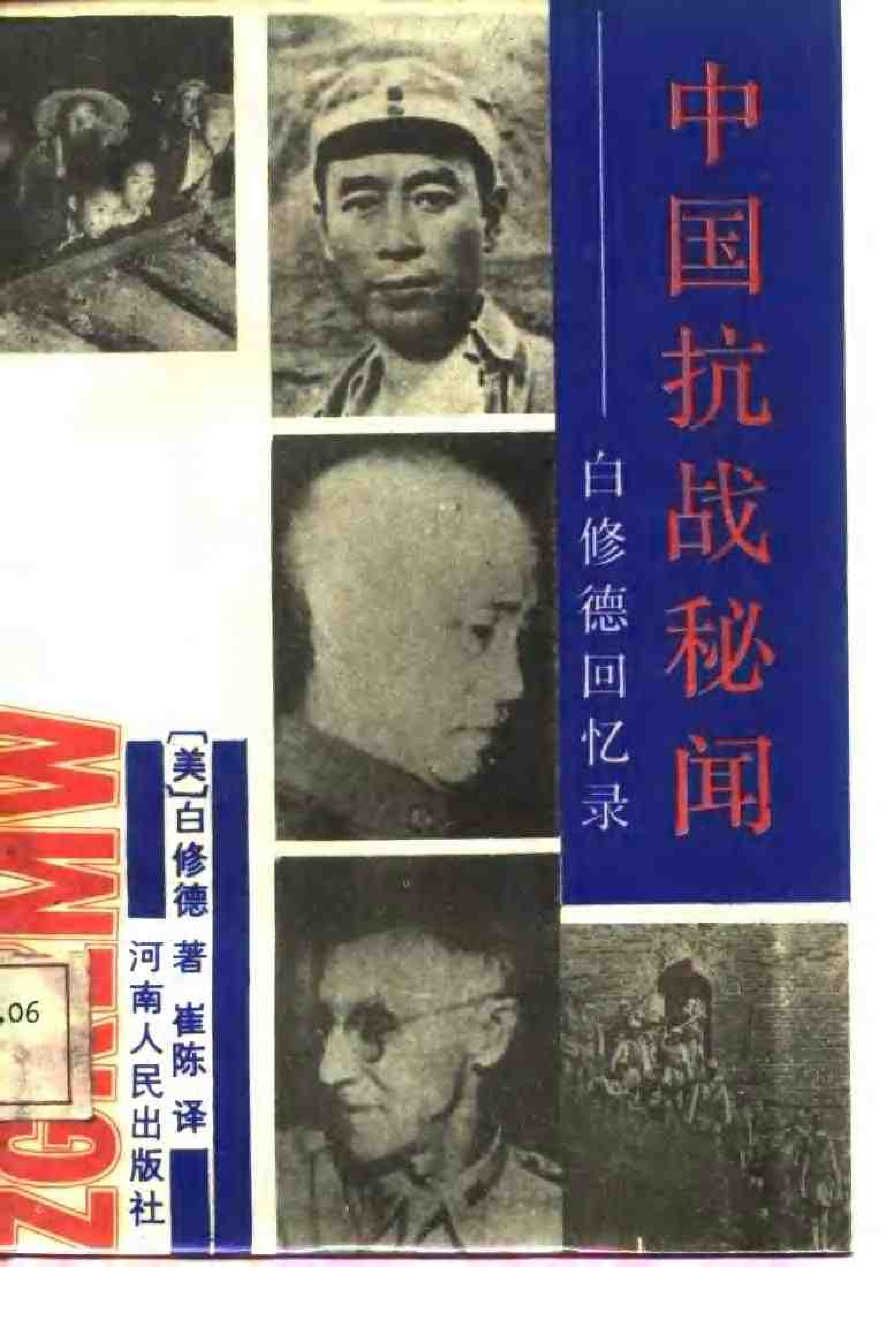

中国抗战秘闻
白修德回忆录
〔美〕白修德 著 崔陈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06



中国抗战秘闻

白修德回忆录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抗战秘闻
——白修德回忆录
〔美〕白修德著　崔陈译
责任编辑　夏晓远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修武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180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8,000册
ISBN 7—215—00153—9/K·43
统一书号11105·218　定价2.00元

译者序

作者西奥多·怀特，中文名字白修德，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记者兼政治评论家，祖籍俄国，1915年出生在波士顿的一个犹太家庭。因为家境贫寒，孩提时的怀特被送进免费的波士顿公立拉丁学校读书，幼年丧父，十六岁的怀特不得不中断学业，到街头卖报维持家计，饱尝了30年代的那场经济大衰退给穷人带来的痛苦和辛酸。

1934年，怀特获得了220美元的奖学金和180美元的报童基金，合在一起恰好是一个学期的学费，因此，他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读书，以后转入该校的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五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怀特来到了中国，乘飞机从香港飞到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重庆。他先是受聘于中国新闻部任顾问，不久辞职，当上了美国《时代》杂志驻亚洲记者兼远东编辑。他在中国一住就是六年，和中国及中国人民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

怀特于1945年应召回国后定居在纽约，同雅各比夫人合著了以中国为题材的文学回忆录《中国之怒吼》；又于1948年编辑出版了《史迪威文件》一书。他于1946年结婚，夫人是比特丽斯·霍夫斯达特。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海登是英文教员，儿子戴维是新闻记者兼小说家。

1948年，怀特作为美国“海外通讯社”的驻欧洲记者，举家迁居巴黎，报导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情况。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有《灰烬中的火焰》。

1953年，一个在海外漂泊了十多年的游子回到了美国，但回国后的生活却不如人意：他先是同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公道话的许多美国进步人士一样，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吊销了护照，继而是雇用他的一家杂志破产倒闭，他成为一名无办公室可去的失业者。这时候，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撰写了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优秀小说《山路》，受到好评，并拍成了电影，稿费足够全家两年的开支。因此，怀特决定实行一生职业的重大转变，首开美国新闻史上的先河，单枪匹马地投入美国总统选举的专业报导。美国每四年举行一次大选，产生出一位总统，他就写一本《总统的诞生》的专著。

这个具有冒险性质的写作计划，经过怀特锲而不舍的奋斗，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系列丛书《总统的诞生》首卷在1961年问世后，立刻受到国内外读者的称赞，荣获1962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它的最后一卷《美国的自我探索——总统的诞生，1956年——1980年》是怀特的封刀之作，也是顶峰

之作，现已被美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馆作为了解、介绍美国当代政治的参考书在中国散发。

怀特先生对新中国态度友好，对已故周恩来总理推崇备至。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曾多次来中国旧地重游，返美后在《时代》杂志发表文章，对我国的现行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怀特因患癌症于1986年在纽约逝世。

本书原名：《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是怀特先生晚年的回忆录。通过这部书，他回顾了自己那波澜起伏、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他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他所结识的著名人物都在这本书中有栩栩如生的回忆和描绘，并根据他自己的认识水平，给予中肯、公正的评价。1980年，这本书成为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原书共有四部分、十一章组成。我所翻译的是其中原名为“亚洲”的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由一个引子和五章组成，占据了原著的近一半篇幅，是怀特着力刻划的重点，也是原著中最精彩、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在本书里，怀特以他亲身的经历和见闻为主线，对中国抗日战争中，中美两国的交往中以及中国新闻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进行了回顾，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并据此提出了他自己的新颖独到的见解。译者相信，本书对于从事研究抗日战争史、中美关系史的史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以及对这“两史”有兴趣的朋友们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本书中，怀特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日本侵略军的战争暴行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揭露。同时，通过对山西的晋东南地区（中条山）的实地采访，对中国共产党崭新的政治理想和策略表示由衷的钦佩，并勇敢地断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终将在中国取得胜利，一种崭新的政治和文明将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相反，作为美国人的怀特，对那个由亲美分子垄断着内政外交，“连做梦都在英语中进行”的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表示盲目的肯定态度。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特别是亲眼目睹了1943年震惊中外的河南大灾荒，他发现这个政府里的官员对自己国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对自己的人民一无所知，在他的面前“都成了一堆废物”。怀特在本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政府只有履行保护人民的职责，人民才有理由接受它，否则，就应该拒绝它。因此，他得出结论：象国民党这样的不能为人民建立有效秩序的政府，应该让它垮台得愈早、愈彻底愈好。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怀特是一个美国决定论或者说是美国至上主义者。他把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完全归功于美国的参战；对于中国政治的观点，也完全是建立在怎样对美国更有利的基础上的。这是怀特先生心灵上的毒瘤，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予以充分注意。

应该说，怀特在本书中所提供的主要史料是翔实的，准确的，可信的，但也不能不看到，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某种偏见，对中国抗日战争中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也不可能了解得尽善尽美。凡是发现明显与事实

有出入的地方，译者都尽量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于他含有偏颇的观点，以及未发现的错漏之处，只好请读者自己留心了。

译者翻译这样大部头的英文原著还是首次，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也研究甚少，因而本书的翻译无论在技术上或是内容方面一定存在为数不少的错误和缺陷，诚恳希望翻译界和史学界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本书的英文原著是著名的旅美作家江南先生（刘宜良）生前赠送给我的，并多次鼓励我克服困难，早日将此书译出奉献给中国的读者。值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江南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先生的遗孀崔蓉芝女士致以深切的慰问，并向为此书的出版倾注了极大热情的我家乡的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

崔　阵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日

於沈阳

目　录

开 场 白

一个观光者[1]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正离开波士顿的羽毛未丰的大学毕业生，好象是从望远镜的反端去凝视某些不认识的事物一样，我所能看见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匆匆过客，挟带一只箱子和一台旧打字机，准备周游世界，在回国之前成为一名历史学教授——一个典型的青年观光者的形象。

作为一个年轻的观光者，我进行了多年的准备，出于保存资料的考虑，强使自己养成了作笔录和记日记的习惯。就是这些从哈佛到中国的匆忙的旅途日记为我构筑了一条唯一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才得以从一个世界跳出来，进入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

① 本节原为第三人称，为便于读者阅读，现改为第一人称。

当时的我一身具备两个完全不同的传统，一个是犹太人的精神，另一个是新英格兰人的习俗。它们伴随我登上路程。

当我在1938年从波士顿出发时，还在进行着犹太式的内省。直到那时，对于龙虾、蛤肉、猪肉、火腿和其它显而易见的非犹太教食品从来未敢问津。同我的导师共进早餐时，我总是把咸猪肉推到鸡蛋一侧，再藏到烤面包片底下。我那时是个恪守古老社会传统的纯正的犹太教徒。不论是我，还是我在哈佛的任何一个朋友——不是一个人——都没有在毕业之前同任何一个性感的女人有过交往。在古老的犹太传统里，性生活只能在婚后进行，在结婚之前连接吻也是不允许的；那时被视为越轨行为。

但我仍然是波士顿人。波士顿的贾奇·贝克基金会是一个度假指导中心，当时就有人对我母亲说，你的儿子聪敏过人，智能超群，会成为一个电气工程师的。但是，波士顿的善举把我从祖传的基础里拆了出来。波士顿的善举给我带来了巴勒斯报童奖学金①，给我带来哈佛的另外几笔奖学金；并最终又使我荣获谢尔登旅行奖金②。这些钱使我离开了我的出生地，踏上了经风沐雨的旅程。

关于这次短促旅行的日记开始时几乎全是个人方面的私事，但时间仅仅几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日记一开始几乎全是围绕三件事。第一件是钱——汽车票价，的士小费，侍者小费，还有关于旅馆价格的争论。第二是性——我对异性产

① 巴勒斯（1837—1921），美国作家、自然主义者。
② 谢尔登（1833—1897），美国教育家。

生了强烈难禁的憧憬幻想。在旅途中，一遇上妓女，就使得我陷入对性的想入非非。最后一件是政治——在业余时间我试图用在哈佛学到的历史教程去解释旅途中所见到的一切，这些记满了一页又一页。但是，这些在1938年的秋天和1939年冬天里的见闻，我只有以后才能真正理解。

穿越欧洲的旅行是短暂的，没有做什么深化理解力的事情。欧洲同报纸上和教科书里描绘的一模一样，慕尼黑危机刚刚过去，但在1938年10月，防毒面具正在伦敦分发，海德公园新挖的防空堑壕清晰可见。巴黎还是象布林顿教授描绘的那样妩媚。离开巴黎，我去访问了我的祖先发祥地——巴勒斯坦。

那时，约有45万犹太人居住在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的地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已经相互难以忍受。阿芙卡协会的伊曼纽尔·拉比斯，是我哈佛的同窗好友，也是哈佛乐团的一名有才华的小提琴家。他是在一年前到巴勒斯坦的。时过一年后再见到拉比斯，不禁令人大吃一惊。拉比斯选准了一条献身于一种事业的道路。拉比斯已经在此安家立业了。他在一个移民的柑桔种植园里，工作是骑马搜集处在收获季节的柳条，拉小提琴的手满是干活农民的那种老茧，野外工作使他精疲力尽，瘦骨嶙峋。拉比斯想要建立一个以色列国，正在学习用枪。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是可以撰写一篇故事的。在我看来，这场冲突恐怕还要再持续几个星期——最短也足够给温斯普先生发这个故事的稿件，也许他正在付印《波士顿环

球报》呢。温斯普买下了这个故事，但我当时并不晓得他已经使我的名字第一次见了报。还是几个月后到达香港时，我才发现在快邮的《波士顿环球报》上刊登了这则故事并收到一张8美元的支票。8块钱不可少，快邮的报纸尤为重要。有了这份报纸，我就能在上海宣布，我是《波士顿环球报》在远东的记者，晃动这份报纸，不啻是一份工作委任书，它的作用是温斯普先生未曾想到过的。

离开巴勒斯坦到亚洲，乘坐的是艘挪威货船M.V冰湖号。这个运载工具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我所学过的关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概念。这般货船在经过大英帝国的地图上所标明的每个点时都要停泊，当时，这个帝国正在从其旅程的顶点开始走下坡路。苏丹、亚丁、科伦坡、新加坡，也许在某个殖民者的办公室里，存放有殖民地码头的标准设计图纸；每个码头都有整洁的混凝土防波堤，都有直通停泊处的单轨铁路，起重机卧在铁轨上，它的长臂在把货物吊上卸下。当地土著的情况却是因地而异的。苏丹港用非洲人卸货，亚丁港用的是阿拉伯人，锡兰港用的是泰米尔人。泰米尔人那一绺一绺的黑色长发在背后扬拂。锡兰盛产茶叶。一个蓝色的霓虹灯在客运码头闪烁，上写“锡兰名茶”。新加坡港则使用中国人干活。这艘船所到之处，都是英国人的天下。我去新加坡的邮局时，注意到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都在站着排队，我也站在行列里准备寄封信。后来有一位白人妇女把我拉出了队列，她严肃对我说：“白人是站在队列前头的。”我当时真象在旧时南方的客车后面被人家捉住一样。每个停泊

的港口，以及整个亚洲的边缘地带，白人都是在队列前头昂首阔步，“土著”在后头俯首听命。

上海是难以同帝国主义的巴黎相匹敌的，但在教科书上倒是预见它们将会是一样的。几个月来，我一直把上海作为活动基地，不时宣称我是哈佛大学谢尔资旅行基金会的成员和《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从上海又到了天津和北京，并闯进了日本皇军的新闻发布会，每天下午去听军事发言人发布关于中国战事的报告，什么中国的战争已经结束，皇军正在肃清残敌。我曾不顾羞耻地讨那个日本陆军发言人的欢心，劝说他发给我这个《波士顿环球报》特派记者一张去满洲的通行证。但在这头几个月里，事事都不顺心，我只好又回到了上海。

上海是就业的集中地。在30年代，为数不少的美国记者，厌恶家庭琐事，便到上海或巴黎搞口头报导。在这两个城市里，英文报纸雇用了一些不太著名的记者，如埃里克·西瓦里德和埃德加·斯诺就在充任临时编辑。所以，在上海的三大英文报纸中，经验丰富，靠卖苦力挣钱的美国记者真是为数不少。

我有时四处闲逛几天，有时，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租的房子里敲打打字机；还经常去推开没有笑脸相迎的办公室去寻找工作，记者、作家、店员、办公室勤杂都可以干。两个月后，快到旅行期限时，我竟想留在中国，不想再回波士顿当历史教授了。当我散步时或四处游逛时，当我坐在汽车里或坐在黄包车上洋洋得意时，看到这个城市充斥着光怪陆

离的现象，神甫牧师，灯光欢笑，花园流氓，上海确有其独特之处。在这个中国人居住的城市里，统治者是白人，对于它的最底层，我这个波士顿来的穷孩子感到难以置信地绝望，就象上层人物对堕落的喜悦让波士顿的文人们感到不可思议一样。

早在1843年英国人就在上海建立了他们的商业邮政。到1939年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然而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300万中国人生活在上海市政会的司法管辖下。这个市政会是由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领事官员联合组成的。毗邻的法租界由法国人统治，仍保持傲慢的独立性。上海的中国人是没有权力的人民，他们的法律、法庭、警察都是远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外国人所强加的。上海是个开放的城市，在外滩，酒吧、鸦片馆、妓院、黑社会、流氓团伙应有尽有。我逛过妓院，却并未染指过女人；在夜里我和其他失业的新闻人员一块喝酒。这个城市在痛苦，我也跟着痛苦。上海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这个记忆一直延续到1972年。那时，我随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重访旧地，一眼就看出，著名的上海滩一改过去那肮脏、灰暗、残骸遍地的旧貌，注入了迷人的魅力，但与久已消逝了的奢侈享乐对比，又给人一种难言的悲哀。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上海变成了一座居住型的城市，既无欢乐也无恐慌。

我第一次被吸引停下来观光时，我曾在日记中记下了上海的一天。那天是参观上海的工厂。那时，无人对中国工人看上一眼，尤其是中国的富人更对中国工人不屑一顾。当英

美在良心上感到有点阵疼时，这些城市的主人们让市政厅建立了一个挂名的工厂督察系统。其中有个警官，是个年轻的丹麦人，名叫克里斯·博杰森，他厌恶这个工作，因为他的感情对这一工作难以承受。有一天，他想开开心，便拉着我和他一齐值勤，希望我能写出一篇故事来。

我们一齐游览了工厂。有个玻璃瓶厂——在那里工作的小男孩也就是十岁或十一岁。他们拖着木履，抱着破碎的玻璃瓶子，步子沉重地来到一只大桶前，把旧瓶子投放进去进行溶化。我们接着参观了一个纺织厂——博杰森一脚踹开了一筒竹席，那是堆在靠近排水道的工厂垃圾里的，走近一看里边竟裹着一个小女孩的尸体，曾是工厂里的小女工。每天夜里总有二至三领这样的席子扔出来供垃圾站收殓。再下一个是缫丝厂，蒸汽棚里滚热烤人——在这里工作的女孩子只有六、七岁，她们的工作就是一天到晚站立在蒸汽缸旁。丝茧在缸里的开水中溶解，她们再从里面捞出丝线，解开挂在细钩子上。博杰森领着我到作业线上，他轻轻地拉过来一个小女孩，我发现她每只手的关节，手指连同手掌都在腐烂。皮肤上起了水泡，肉和脓血都裸露在外。就这个样子了，她们的双手每天还都泡在茧缸里。博杰森说，这样的孩子都是从农村她们的农民父母手中买来的。如果她们死了，也象那家纺织厂的女孩子一样，用竹席一卷，运走拉倒。我想把它写成小说，可真写出来后，却没人买，就连《波士顿环球报》也不理睬。

我为所看到这一景象感到震惊。以云游四方的观光者的

心态，我在日记中记载了我决定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或是做一个革命者，或是党人或是一个鼓动家，都可以。但在上海的那几个月里，我遇到的最激进的团体竟是一帮托洛茨基分子，全是清一色的白人和飘泊者。他们几乎是立刻把我摒弃在这个组织以外。一个我最为佩服的人对我说："怀特，你只是一个社会党人，你要放明白点。"

所以，我又通过别的途径去采取行动——当时在亚洲进行的最大行动，没有疑问，就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建立联系，就要往西行，那是一片被群山和峡谷所隔离的地方。这场战争也是反法西斯阵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象西班牙那场忠于共和政府的战争一样。我同蒋介石的人取得了联系，吁请他们为我提供帮助。我不能再在上海滞留了，钱快用完了。我计划在赶回波士顿之前，一定要先看看中国内部的情形。

我买了一张船票，乘英国的蒸汽客轮从上海到河内，计划从河内沿法国的铁路到昆明。也许能在昆明，找到通向蒋介石穴居的山城——重庆的道路。那时再返波士顿，但行动一定要快，赶在谢尔登旅行奖金告罄之前。

一艘巴特菲尔德·史威里公司的客轮载我驶离了上海。我坐在二等舱里，附近还有一群妇女，是一帮正在待命的英国军官的夫人，她们是被运到帝国环形防线上的另一块前进殖民地去。船上没有三等舱，其余是苦力和甲板阶级的栖身之处。我和这些大腹便便、没有韵味、平平淡淡的英国女人一块坐二等舱就算不错了。我有点喜欢她们了，因为她们也

恨希特勒。有个军人的妻子说我是个"正牌的布尔什维克"，她的忠诚可嘉，但她的政治概念却很混乱。她们是热爱英国的。"我爱吾王吾后和王室"，另一个人进行着解释，好象在上帝面前报告她的宗教和信仰似的。实实在在的女人，用实实在在的忠诚，向我灌输着她们对英国根深蒂固的热爱。多年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我才弄明白，在这些平凡的女人遭人冷眼的时候，英国正丧失它的伟大而她们的男人正在使英国恢复伟大。

我是在一个下午到达香港的。下一站便是河内。第二天一早，我离船上岸去察看一下英国在香港报纸的就业市场行情。大约是11点钟，我迈进了中华民国的新闻处的大门。早在上海我就同他们的人建立起联系了。

他们正在等着我。他们肯定收到了我的信，但他们进行了断章取义式的曲解。我是被当作来自波士顿的"新闻记者"受到接待的——此公在哈佛学过中文，现在是该大学的研究员——自愿为重庆的国民政府服务！在重庆，一名澳大利亚记者，将要离开宣传部门，他手下有六个中国专栏作家。他们搜集稿件，发给美国和英国的新闻界。他们问我，能马上动身去重庆和内地的中国吗？他们所讲的"马上"，好象就是后天，那时将有一架夜航班机越过日本人的防线到内地的那个战时首都去。我能去吗？

要去。我迫不及待地赶回船上，收拾了一下行李，还同事务长就到河内船票的未用部分的退款问题争吵了一番，最后还是退给了我现金，付了当天晚上和第二天白天的旅馆费。

我的日记记录了那个夜里的思绪。我应当为外国政府服务而成为一名宣传家吗？这样做就是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帮助吗？这个工作是否永远取消了我在美国新闻界里的资格呢？是否应取得美国领事馆的同意呢？我的出路在哪里？

但是，那一夜的独自思索既无必要也不真诚。我已同意接受这份工作了。只要飞机一起飞，我就置身于战争之中了。我将目睹轰炸，重庆理所当然的是日本空军的第一号目标。不论历史是副什么模样，我将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将进入中国政府的内部做事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飞机。一个周五的深夜，我排队登上了一架中国的容克飞机。飞机轮胎在机场的跑道上滚动，似乎要把周围的群山撕裂，然后直冲云霄。蓝、红、白三色组成的手镯般的光环盘绕在香港的夜空，飞机不久就把它们抛到脑后，进入了一片黑暗的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夜里是看不见灯火的。

我正在飞进风云迭起的、最雄伟壮观的20世纪。一种出乎预料的快速，啪的一声中断了我同祖国，同波士顿，同家庭及哈佛大学的最后联系。我这位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将不得不为即将见到的东西陷入深深的惊恐之中。

第一章

中国：战争与抵抗

我于1939年4月10日到达重庆，飞机是在长江边上降落的。

我环顾四周。飞机跑道原来是铺盖着石头的沙洲，沙洲的两边都有河流穿过，携带着亚洲内陆黄色的淤泥经过下面的峡谷，再被送到遥远的海洋中去。这个简易机场只能在冬天和春天使用，那时水位低，而到夏天和初秋，随着西藏高原积雪的融化，河水就会淹没机场。一个人行渡从湍急的河上通过，一直到褐色的悬崖脚下。而在高高的悬崖之上，盘绕着重庆旧城的城墙。

飞行员离我们匆匆而去，装上了早已在那里等候的旅客，随即迅速飞上天空。他不能让掠夺成性的日本飞机发现他的飞机在地面停泊，否则就要被消灭掉。

我终于来到一个处在战争中的国家首都。它距海边1,400英里，位于长江的上游，400英里之外就是日本的防线了。

轿夫被招呼来抬着我，踏上了那凿在悬壁上的数以百计的石级。这种轿子象个吊床，是用竹条编成的。在竹杠做成的两个扶手中间，一前一后的两个轿夫都被挟在竹杠中央，我就晃晃悠悠地坐在其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人们这样干活的，象是载重的牲口一样。我记得他们汗水淋漓地赶路，领头的轿夫裸露的肩上褐色的老茧比牛皮垫还厚。“哎——呀——子——啦，哎——呀——子——啦”，每登一阶都要喊一声号子；后面的轿夫也用相同的“哎——呀——子啦”的号子呼应。每上一个台阶，都踉跄一下，发出一阵呻吟。到达崖顶，走上了大路，进入重庆城墙，我就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中了。

前几周，引起我关注的，不是我的工作或抱负，而是这个城市本身。

马可·波罗在大约700年前访问过四川，对类似这样的城市作过描绘。掀掉20世纪那层薄薄的幕布，在幕布掩盖下的重庆，我发现我又一次来到他笔下那时的中国。让我在我能看到的地方留连一番吧，因为这是我要了解的中国故事的开头。

这座城位于群崖之中的一个楔形山地上，嘉陵江和长江从两侧流过，然后在楔形山地的一个山嘴处汇合。城墙上有九座门，是明朝建造的，已经500多年了。在我到达的前几年里，城墙有很多处被拆毁做建筑材料了，但九座门依然耸立，

其中有一座还在发挥作用。门上巨大的铜瘤横梁在日落时落下，黎明时打开。这座门朝朝廷的官路敞开，名曰"通远门"，即通往远方之门——现已辟成能走汽车的公路了。这条汽车路，即"老"路，已经有12年的路龄了；直到1928年，重庆还为没有机动车，没有汽车，没有黄包车，甚至连独轮车都没有而感到自豪呢。而那条沿着南城墙根的新汽车路，还是在我到的那一年才竣工使用。轿子和轿夫，数不清的黄包车和车夫，足足有2,000至3,000。

公路并没有明显地改变了这个城市的生活，重庆象过去祖祖辈辈那样仍然是一个附属的中心，一直依赖于农村。一片片的稻田地延伸到城墙边上。在长江岸下的边缘，农民也满怀希望地种上了蔬菜，在夏日的洪水把他们的小片荒地淹没之前，总含有几分赌注的性质。极目远眺，长江两岸，嘉陵江两旁，月牙形的稻田一直延伸到山上成为梯田，延伸到另一片山背上，一片连着一片，一直连到距离重庆有275英里之遥的被高大城墙围着的成都。无边无际的稻田一直达到西藏高原才为止，对那里的悬崖绝壁农民是无能为力的。

城墙内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中国。以花来说吧。从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中国人如何爱花——但目前，是春天，这里的花圃之多超过了我的家乡波士顿。在亚热带的四川，鲜花的开放象是忘掉了季节似的。纸一样白的水仙花开在隆冬时节；梅花撒遍山间，点缀着三月的花市；茶花一年四季都有，花圃连同占地面积不大的灌木丛，使各条潮湿、阴暗的胡同增加了光亮。再说水果：玲珑的黄樱桃，又面又甜，一筐一筐

构，早在五月就上市了。随六月而来的是桃，黄皮红肉，除去山东产的，这里的要算是最佳的品种了。接着是仲夏的杏、李和荔枝，再接着便是八月和九月的西瓜，紧接着是梨子成熟了。晚秋是又黄又红的柿子收获的季节。最后是独占鳌头的冬季水果大放光彩——粉红色的柚桔，还有水果中的佼佼者——十二月的红桔。不几年，我就象重庆的中国人一样，学会了用水果来识别时令节气的本领。

鲜花和水果所提供的节气是栩栩如生的。但这个城市真正不停地变奏的韵律，却是同那些稻田地联系在一起的。四川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在稻田地上，有5千万农民在劳作，以填充战时中国的粮仓。稻米用平底驳船从上游集中运来，都是装在麻袋里的。眼下是战争时期，稻米要运往前线，不再象以前那样运往沿海了。在重庆，富人中最富有的人便是米商和拥有稻田的地主。肉、米来自农村，好象取之不尽似的。每天早晨，都有猪被运送进城。猪的四条腿捆扎在一根棍子上，由两个苦力抬着进城。猪的眼睑眯缝着，一路上发出极端痛苦的嚎叫，直到屠宰场才算罢休。待它再出来时已是鲜红的板肉，在卖肉的柜台上渗滴着鲜血。有的分切成灰白长条肉，苍蝇在上面乱飞，有的则被熏烤为黑白相间的干腊肠，长短不等，一串串地挂在木格子里的钩子上，卖肉的可依顾客的要求卖这些一英寸到两英尺长的腊肠。城里奉还给农村的是大粪。收集者一早就挨门挨户倒净了大便池里的这些东西，光着脚沿石级而下来到江边，担着两大桶大粪汤战战兢兢地走到被外国人幽默地称呼为“甜蜜船”的驳船

上去。他们把粪便倒进驳船里，便返回来。赤身裸体的船工们摇着橹，把这些污浊的驳船驶向臭气冲天的各收集点去。这就是重庆回赠给田野的礼物。这些大粪被运到上游，卖给农民做肥料用。在这同一条江里，挑水工也挑着含有泥沙的河水，战兢兢地奔走在这些相差不多的石级上，卖给那些还没有自来水管道的人家。重庆新建立了自来水系统，但用户很有限。这样，就使得这些山路，上上下下的石阶上沾满了溅落物，时间一长，变得十分光滑。所以，谁也弄不清楚，什么样的污浊物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让你躲闪不及。

沿城市的一条汽车路出发，登上山脊的最高处．人人都有穿越几个世纪，回复到古代之感。这条主要街道的两旁有着沿海城市那样的门面，商店里卖着布匹、手电、汽车零件、罐头食品，还有霓虹灯广告；小摊上贩卖的有针、线、空瓶子，都是从长江下游进来的。但一走出这条大街便坠入漆黑一团的陋巷中。重庆总是雾气腾腾的，除非是在晴朗的仲夏，而那正是轰炸的月份。这里街巷总是阴暗的，有些地方狭窄不堪，以致过路人须用雨伞挡着两边屋檐的滴水方可通过。这一切，组成了一个香气臭气同时散发的气味交响乐。散发香气的是食品和调料，鲜花的芬芳，炒熟的板栗，焚香炉，还有鸦片的烟雾；发臭气的是未收拾的垃圾和遍地的粪便。噪音组成了另一类型的交响乐——男人的喊叫，女人的尖叫，婴儿的哭闹，还有各家各户鸡舍里母鸡的叫声。还有，那就是苦力们挑水时发出的单调号子和走街串巷的货郎唱出的咏叹调。每个动作都发出它特有的声响。木料搬运工在江边上

劳作。卖棉花的小贩，一边走一边"噼噼啪啪"节奏分明地敲打着一块木砧板。卖小玩意儿的把他的东西都放在一只大黑箱子里，用常见的那种语调，叫卖着他的杂货。就象波士顿艾丽街头的香蕉和鱼贩子，嘴里念叨着特有的语调。收集大粪的人也向人们发出带有警告性的吆喝。那些卖猫儿铃、小刀、筷子、挖耳勺、抓痒耙的人们，肩上都放根长扁担，象考尔德汽车，一步三晃地行进着。

生活在这些大街小巷里的人们，一如往常，总是对时代的变化反应迟钝，好象个动物，只有用棍子插进窝里，再刺它一下才改变一下常态。只有少数几个人才知道去市里的三个教会医院就医。他们有了病，多半去看中医或去针灸，用药是西方从未听说过的——发霉的豆腐渣再加上小孩尿、麝香或犀牛角粉可治喉炎。男性用的春药和女性的生育药，治头疼、背疼的药，美容剂和洗涤剂都是用传统的方法制成，都可以在药房里买到。他们对生活、爱情和享受有着一成不变的、令人捉摸不透的追求，连每天的美国电视广告对此也无济于事。汽车路边上扯着电线，使商店门前的霓虹灯和政府办公室通亮，但街巷深处，居民仍使用油灯和蜡烛照明。干旱时节，身披绿树叶的游行队伍祈神降雨；传统的结婚队伍跟在披上红布的新娘的嫁妆后边，铜、钹铿锵作响；在葬礼上，人们都白装素裹，就象基督教至福千年庆典那样，跟随着棺材——有时，送葬的人在死人身上拴只啼叫的公鸡，让它超度亡灵。

重庆，这座山谷里的城市，过去并不需要我所见过的沿

海城市里那样的政府。西方人在沿海的城市里设置了租界，开办了工业。重庆同农村的联系是直接的。它昔日的传统政府尽管是残忍的，却是单纯的。当地的政府是个发号施令的地方，对象是商人、钱庄的老板、商店的业主等能向山里的农民提供市场的人。政府维持治安，商人服从权威，谁有长矛、士兵、枪炮就服从谁，谁有权力保证贸易进行就服从谁。这样的人民，几千年来，一直向帝国的行政官员，向地方官员和督军们交贡纳税，近年来要进贡的还有军阀。他们会永远地交纳下去，只要生活不受干扰，不受掠夺，没有战争进行。不仅是重庆，而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都需要一个新型的政府。我到重庆来，就是要为这个刚到这里避难的政府服务。

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它控制了这个面积最大，物资最丰富的省份——四川的咽喉。这一片最肥沃的田野，东边被高山和三峡所封闭，西边背靠着亚洲的屋脊，5千万人民在这块亚热带区的内陆帝国里生息，自足自给，几乎坚不可摧。到1939年春天，也就是我抵达时，日本军队已占领了所有的沿海城市——上海、广州、天津、北平，整个华北，除去汉口外，所有的长江流域城市悉陷敌手。汉口西部，横亘着难以逾越的三峡，三峡以西，便是重庆；凭着这座天然屏障，国民党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抵抗。

战前，重庆是个大约有30万人口的城市。25万难民，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也从沦陷区逃来。这是我到重庆以前的

事情。战争结束之前，又有25万人陆续到来。这些外地来的政府职员，他们的境遇远不如我这个来自波士顿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在沿海的城市里长大，在中国沿海的大学里就读，已习惯于使用电灯、抽水马桶、污物处理系统、汽车、电车、报纸、图书馆等；他们的太太则习惯于现代化的厨房、淋浴、汽车、电影院和西药。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在重庆几乎是见不到的。例如，这里有一家电影院，在1940年还放映1936年的新闻短片。难民们被驱入内地犹如让倒退到落后的过去，那是令他们不堪忍受的。这就象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的最能干、最忠诚的行政官员不得已离家去建立对付来自阿巴拉契亚山的敌人抵抗据点一样。

重庆曾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省级首府，现在，要为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变得不知所措了。政府的先遣人员一到重庆，就觉得昔日悠闲轻松的生活中，缺乏战时的严肃政治所必需的纪律性。于是鸦片立即遭禁，那是1938年底的事情。我到达重庆的四个月前，浴池也关闭了——有名的妓院往往是商人聚众吃酒的地方，酒足饭饱之后，则往来于热气腾腾的浴房洗澡，抓痒搓背，还有职业的女人伺候。严肃是战时改革的主题——饮酒之风很快遭到禁止。传统的奢侈的婚嫁消费也被宣布为非法。不久，又提出用简单的火葬代替浪费的老式的土葬仪式。黄包车和轿子的数量大减而且都必须持照营业了。禁止在大街上随地吐痰的运动也展开了。但除禁止鸦片的命令外，别的法令一个也没有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中得到贯彻。这些法令渐渐地被新来的外地人破坏了。这个古

老的城市在新事物的空白下依旧维持其古老的生活方式。

英勇——是这个流亡政府的人民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那些数以千计的文职官员们，不论是何人，都是本可以留在沦陷的沿海城市里，象其他数以千计的官员那样，朝征服者日本人卑躬屈膝的。可他们却没那样做。他们宁可忍受盛夏的酷暑，宁可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挨过多雨寒冷的冬天。他们宁可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染病，常常死去——但他们决不屈服。

不光是政府官员选择了抗战的道路，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教授，也都象政府官员那样来到了重庆周围几英里外的临时大学校园里。很多沿海的小商人也是如此，他们背井离乡不是为了发财，全是出于民族气节，做一个刚强正直的中国人。在他们之后不可思议的是妓女，她们也接踵而来，她们也不愿留下为敌人服务。战争结束以前，除了巴黎和纽约以外，重庆给我提供的饭食是世界上其它城市都做不到的。从福建、广州、上海、北京、湖北、湖南等地逃难来的厨师，荟集在各大饭店献技，表演他们的桌台技术，显露他们各省的美味佳肴。

我发现这里所有的人——政府官员、学者、士兵、店员、饭店服务人员——都有历史的浪漫蒂克。现在回过头去看，再回想起他们是如何轻而易举赢得钦佩是件困难的事。战争收尾时，当通货膨胀使得纸币工资不值一文，而他们不得不贪污时，当美国的援助使国民党和农村脱离时，当他们私下进行的反共内战毒害了每个人的思想时，重庆变成了一座腐

败到顶点的城市。但是在开头，这些官员的孩子在政府办公室的阶梯上嬉戏，太太走出宿舍到办公楼晾晒潮湿的衣服，这些官员吃的是集体伙食，训练他们的孩子去躲避不可避免的轰炸。春天里大雾散去，轰炸接着就要来的。走访这些官员，确是件令人鼓舞的事。几袋子大米，一点食油是官方按月发下的配给。全家挤在一间兼作办公室的宿舍里，冬天取暖的是木炭火盆。

新到的政府占用了几乎所有的旅馆，半现代化的办公楼，中学校园及周围地盘也都被征用了。由于到来的人急剧增加，便只好向农村的竹棚扩展。这种竹棚是用竹条编织起来的，糊上一层泥巴，再粉刷一下就算完成了。

每天清晨，处处都可听见凄楚动人的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当我尽力把这首每天把我们从梦中吵醒的歌翻译出来时，西方的来访者都不禁为这又滑稽又严肃的歌词捧腹。但是配曲却是既令人激动又令人感伤的，我一听到它就感到震动。黄昏，当国民党的十二罗经点星旗徐徐降落时，军号齐鸣，传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我也为之感动不已。

使我倾倒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事业，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的无处不在的美国方式。

在亚洲没有一个政府，在这种意义上，别的任何地方也从不曾有过一个政府，能象重庆的共和国政府这样，完全地被"亲美主义分子"所渗透。恐怕只有南越共和国政府，才能这样完全地被美国的理想、援助和劝说所毁灭。政府中的

男男女女，作为一个团体，并不完全是美国的俘虏，但作为个人，却全是美国的理想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孜孜追求者。传教士们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对中国古老的理想进行干扰，教会办的大学和小学加深了美国的影响。其中的先进分子，坚持奋斗，渴望一个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中国，追求美国的学问、技术、文化，好象美国掌握着生活的全部真谛。

这种渗透，由于蒋介石夫人的介入而开始达到高峰。她受过韦尔斯利大学①教育，是最高统帅的妻子，就是她劝说丈夫参加基督教卫理公会的。蒋介石的财政部长是孔祥熙，他读过美国的两个大学：奥伯林和耶鲁；蒋的外交部长是1904年的耶鲁毕业生；他的教育部长是匹兹堡大学毕业的；立法院长是孙科，拥有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两个大学的博士学位。新闻部长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中国银行总裁是宋子文，后来做过中国的行政院长，是哈佛大学1915年的学生。中国政府中的美国毕业生名单是开列不完的——多得无法计算。从国家卫生署到盐业总局再到外贸委员会比比皆是。中国的驻外使节中，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也占压倒性的优势：驻华盛顿的，是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和哥伦比亚两所大学的毕业生；驻伦敦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驻巴黎的威灵顿·郭先生，不仅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个学位，还编辑过该校的校报。不仅如此，他眼下正为其儿子成为哈佛大学《克里姆森》杂志的职员而自鸣得意呢。

---

① 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西南部的韦尔斯利镇，以风景优美著名。

我在哈佛的学位在这里比在波士顿吃香多了。后来，我组织了一个中国哈佛大学俱乐部，其中蒋介石重庆政府里的高官占的数量竟然比日后约翰·肯尼迪入主华盛顿时的哈佛俱乐部的人还要多！

当然，回顾起来，这一切都是悲剧性的。我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发现，这个国民政府中个个高官都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但他们同人民的距离之远，对自己人民的了解——甚至包括对重庆老城的了解，竟使得他们在我面前成为了一堆废物。他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对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些人的生活、睡梦、思维、说话都在英语中进行——但蒋介石是个例外。

蒋在这个政府里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对这个人，我先是崇敬和钦佩，继而可怜，随后是鄙弃。蒋不讲英语 不读英语，出身于一个比毛泽东还穷苦的家庭里。蒋选择这些亲美分子来充实他的政府，现在回顾起来，就象现代电气系统中的一个控制盘。有人一按电钮，灯光就灭了。但背后的电线不通向任何地方，控制盘没有同运转系统接上。成群结队的美国顾问、援助专家和各级将军，后来在搭救那些在崩溃中进行无力挣扎的家伙时才发现这个控制盘并没有发挥作用。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才能允许谒见蒋，大多数人见到的是他大院的石墙，有两个警卫班守护着入口处，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通到山里，转几道弯就不知所终了。这条公路的消逝之处，也就是另一个中国“政府”的发端之地——这个“政府”在指挥前线的部队作战，在同军阀结成必要的联盟，通

过那小得可怜的现代高速公路来到农村、集镇，那里的保甲制度，才是真正的政府发端之地。

在这些完全美国化的中国官员们的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地区，中国的另一个“政府”，正处在萌发之中。对于这一点美国人是不懂得的。中国人也弄不懂美国顾问们向他们所介绍的美国制度。蒋邀请众多的顾问来帮助他的政府，因为他认为美国人拥有某种奥妙，某种技术，可以不加选择地人工嫁接到他的制度中去。

多年后，美国在中国的顾问制度就成为一件奇迹了。那以后的35年中，我曾见到美国的顾问和间谍象一个个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游荡，拯救一些民族毁灭另一些民族。重庆便是我观察旅行中的第一站。

闲言少叙。那年夏天，我受到邀请同美国顾问们聚餐。他们每天晚上都集中在卫理公会使团吃一顿美国饭菜。其中有一位年老的航空顾问，鲜言寡语却彬彬有礼，他就是美国空军的退休上校，克莱尔·陈纳德。他正着手组织中国的空军。在空袭时陈纳德是从来不蹲防空洞的，一俟日本飞机离去就研究起日本飞机的编队来了，就象一个足球教练研究一部就要与之交手的对手的电影一样。他发现日本的“零”式飞机机动性高，但火力不足，投弹也不准。他相信，美国新式飞机P—40，具有各式机枪和高度准确与快速等方面的优势。如果将它投入战争，只要采取控制制高优势的战术，就可从空中给予日本“零”式飞机以毁灭性打击。以后，他的战术被证明是正确的。还有一个民航顾问叫威廉·兰格霍恩·

邦德，他教我怎样识别从空中呼啸而来的炸弹。更为重要的是怎样观察敌机：如果你站在电线杆后面，飞机看来在电线杆上方的天空中做垂直攀登，那就赶快钻防空洞；如果飞机从电线杆的视区内转向而去，炸弹就不会投向你。聚餐会上有几位财政顾问，他们脸色忧郁地谈起了中央银行系统和税收的状况，并把他们的忠告传达给蒋介石本人。我对经济学家的不信任感可能就产生在那时：他们给中国人讲授现代中央银行系统的职能，教中央银行如何印刷钞票。中国政府随即以极大的热情着手进行，一直到这些纸币变得一文不值才罢休。这样做，无异于教一个妙龄少女怎样去吸食海洛因。

对比之下，美国顾问团中最有趣味的人当推那个自称"奥斯本"的人。他一心想成为一名皮货商。奥斯本又是嘻嘻哈哈的乐天派。他的真名叫赫伯特·奥·亚德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美国密码和破译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那班人马后来发展成为国家情报署，比美国战略情报局，甚至比中央情报局的资格还要老。这个"奥斯本—亚德利"在重庆为我们表演如何截取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再把它们破译出来。他做为一个为蒋介石效劳的技师，同时，还在帮助美国海军做好了对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密码破译工作的准备。

赫伯特·奥·亚德利是个职业的密码破译工作者。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美国暗室》，在美国情报人员所公开发表的一系列专著中，此书具有开拓性的价值。《美国暗室》一书讲的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密码破译工作。亚德利的现身说法要比书上讲的生动得多。他把此书公开出版的理由

是无可指责的。他在亨利·史汀生任国务卿时被解职。因为他截取破译了正在同我们进行谈判的外国使馆的电报，此事被史汀生知道后颇不以为然。“君子不拆别人的信”，史汀生深信此理因此放弃了亚德利暗室。亚氏的另一部书《打牌指南》，是西门和斯凯斯特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是一本启蒙性质的书。此书是对美国民间文化的一大贡献，在指导年轻人玩扑克方面的作用，就象性手册对刚进校门的大学生那样必不可少。

奥斯本好同我开玩笑。他是个妙语连珠、热情奔放的人，他的热情体现在酒杯里、赌博场上和女人的怀抱里。当我们结为朋友后，他就教我玩扑克。他让我站在他背后，看着他展开双手，把扑克玩得花样百出。他认为我应当对性有点体验，就邀请一些他认识的上等女人，连同我都到他家参加一个宴会，劝我尝尝味儿，我不愿意领教，波士顿一直在强烈地吸引着我。他还教给我一套本领，其重要性可以说在从其他任何一个美国顾问或能人处所学到的东西之上。那就是如何对付空袭。亚德利的理论是，如果飞机直接朝你冲来，上帝也救不了你的命。他说，空袭中的主要危险是窗上迸裂的玻璃。所以，一听到警报，马上带点饮料和两个枕头到一把长椅上躺下——用一个枕头遮住眼睛，另一个盖住腹股沟。碎玻璃可能要伤害这些致命的器官，但如果眼睛或腹股沟受到损害，生活便没什么意思了。在原子弹出世前的年代，这是对每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忠告；我都照着办了。在蒋介石的重庆，有很多比较老的外国人，但唯有亚德利对我特别

友善。

当然，在中国政府的美国顾问团中，我算是这个统治集团中的小字辈了。我的地位之低，几乎到了察觉不到的程度。二十三岁，初出校门，之所以被这个完全美国化的中国政府所雇用，是因为我来自哈佛大学的高级研究生班，这是中国高官们都没经历过的，所以，我被授予了中国新闻部顾问的头衔。对这个工作我是一窍不通的。我不懂这个工作，也没有人向我作过介绍。我想我在青少年时期，只是一个满嘴充满僵硬的社会主义的花言巧语的“反法西斯战士”。但是实际上，我是被雇佣来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的。美国对抗日的支持是政府赖以生存的希望所在，而影响美国的新闻界则是迫切需要的。向美国撒点谎，骗一骗美国人，不惜一切地说服美国，什么中美两国的前途在反对日本的事业中是一致的之类的话都被认为是必需的。这是我在1939年到重庆时，中国政府对美国政策的唯一战略，而我的工作就是为实施这种战略而进行一切必须的欺骗。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中国新闻委员会”里新闻专栏部的主任。我的每月工资是400中国法币，根据那时的兑换比率，相当于65美元。我可以用我的不受约束的笔去进行自由写作，我发表的任何东西都是为中国的事业服务的。

开始几周，我住在一家教会的院子里。后来，预料中的轰炸开始了，教会的房子被毁。轰炸过后，我搬进一处位于新闻部办公楼楼下的政府公寓里，和中国同行们一起居住，早饭和午餐都和他们一起吃。过了一段时间，对重庆的轰炸

越来越频繁时，新闻部便在毗邻的后院里，为外籍记者建筑了一处招待所，我便同新闻团的人都搬了进去。

还没有过上两周，人人都发觉我原来是一个二百五的新闻记者。我所领导的那六位新闻专栏作家象我一样能讲一口英语，年纪都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他们都有在沿海城市的英文报社里当记者的经历，都是出自爱国心才为政府效劳，工资只是几袋大米而已。而我，才二十三岁的毛头小伙子，竟派来指挥他们做事。还有，我並没有他们那种对政府的献身精神；他们的政府是个不可思议的怪物。我急忙对这个政府里的情况刺探一番，把我在工作部门里所骗取的零零碎碎的情报，统统交给了美国新闻使团。对我来说，一个好的素材就是一个好的故事，不论其是否具有宣传价值。我的主顾是外国新闻界同行，不管是居住在重庆的或路过重庆的，都有着对新闻的渴望。

这些人都是派来进行战争报导的，天天都要编造故事——但是那场战争远在长江下游的几百英里之外，要经过一周的跋涉，方可到达前线，再经过一周才能返回。中国有关当局既不允许中国记者实地采访，也不容许中国报纸刊登真实情况，这可是个並不简单的悲剧。在军政部午夜发布的战争新闻简报里，人人都必须迅速学会翻译那一套古怪的中国文言文。日本人从来不称作日本人，总是喜欢把他们称之为“日寇”。在战争新闻简报中，日本人从未进行过“攻击”，而是“偷袭”（选用这个词意味着敌人象夜行贼一样干鬼鬼祟祟的勾当）。当日本人于1938年占领汉口，达到他们

的胜利顶峰时，消息在重庆被压下了一周，尔后才以“敌人之足迹出现于汉口”为题在报上披露。中国军队的退却总是被宣布为该军“正在进行重大的侧翼包围行动”。如某城某地被报导为“我方已胜利将敌人诱入陷阱”，则无疑表明该城已沦入日本人手中。如果前线出现了一个小胜利，总是以中国军队缴获敌人的“武器无数”而结束。

这种新闻让外国通讯社感到沮丧。也有些记者可以忍受得了。合众社的代表是个娶了中国老婆的年轻丹麦人；路透社雇了个中国人做局长代理，其它通讯社都要它们的人员忠诚于中国政府。政府讲什么，他们就报导什么。有两个最难对付的记者，一个是年轻的合众社记者，名叫罗伯特·马丁，当心血来潮时能写一手好诗。另一名是《纽约时报》的梯尔曼·杜丁，是历来报导亚洲事务最伟大的外国记者之一，他的正直使得在他面前说谎的中国官员为之退缩。反过来，最容易操纵的人，倒是要人名流，训练有素的官员，美、英各大报纸崛起的明星。他们乘飞机来到重庆不过进行四天的访问，然后就能发出有关战争和中国人抵抗精神的政治性稿件。作为一个鼓动者，我的单调的差使，便是当一个个的外国记者抵达重庆时，参加于当天晚上举行的政府宴请，在访问的四天里，让他们烂醉如泥地从一个宴会奔赴另一个宴会，然后，我便在新闻委员会里的办公桌上，为来访者写出他需要的全部稿件。同这些人在一起，我是最幸运不过的了。

没过几周，他们便有礼貌地把我降级使用了。我被告知说，我是这么好的一个作家，我应当自己动笔撰写新闻特写。

这样一来不仅“保住了面子”，也使我更好地发挥了特长。从我自己的经历中，我对于辨别传说中的自我奋斗生活的真假，学到了很多东西。

记者们对我吵吵嚷嚷，因为我是个“政府里”的人，向我索要那些军事新闻公报的合订本，里面充斥着外国人难以正确发音的单音节汉字所组成的地名。美联社打算每天发回不少于五百字的电讯稿，路透社计划一天发回两千字，不管它们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我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一家中国报纸的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段新闻报导，说的是浙江省某个地方，已被日本人占领了。有个名叫蔡黄花的中国妇女朝坐满日本兵的戏院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一些日本人，随后便逃跑了。我把这个中国名字——黄花进行了意译处理，文雅一点，便变成了金花小姐·蔡，一个游击队首领，一支中国抵抗力量的巾帼英雄。经我这么一发挥，立即吸引了除杜丁以外的外籍记者。他们在国内的报社还要发这个故事的照片。新闻部的同事们便提供了一张身着制服、年轻的中国妇女照片，腰间还插着两支手枪。于是，她便成了“双枪金花小姐”了。记者们还要，新闻处就发、发、发。几个月来，由于我捏造的这个故事，金花·蔡变成了抵抗运动的女英雄，影响仅在蒋介石夫人之下。经过人们之手一再改写传到美国，她的事迹竟变成传奇式的了。三年后，我早已不在中国政府里做事了，现在已不复存在的《美国周刊》把她的事迹作为头条新闻登了整整一版。那时，我是设在纽约的《时代》杂志驻远东的临时编辑，当有人建

议《时代》应采用这个故事时，我不得不持反对态度，并为自己是这个骗局的制造者感到内疚。

在我对动乱和悲剧的规模进行描绘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这件事关系到历史的真实和新闻事业的生命。我曾多次报导过难民和他们的疾苦。全国赈济总署宣称有统计资料，我就去采访了一下：从日本发动侵略的1937年到汉口陷落的1938年的14个月里，该署共向难民营发放了2,500万顿饭——数字是从难民那里得来的。他们每天要两次往返于领大米粥和其它食物的临时棚子里。数字是2,500万顿——而不是人。但在我的文章的某些章节里，经我对这个数字进行一番发挥，数字便走了样，变成了2,500万人在中日战争的前几年里逃离了沦陷区。这个数字传到国外，保存在资料室中，出现于杂志的文章里，经常反复地披露于研究关于中国战争的权威报导中。这个数字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现在，我才弄明白，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确实搞清楚日本侵略所带来的那场大混乱的深度和规模了。可能只有200万或500万中国人宁愿流离失所而不愿当异族顺民。但这个2,500万的数字已被印刷在大多数的历史书中了。

中国人对美国的新闻报导是敏感的。有些稿件被新闻检查官截留，只有蒋介石本人能读到它们的译文。稿件中涉及到哪一位部长，就必须用电话通知本人，待他批准后，方能放行发往美国。我同检查官们都住在政府公寓里，两名白天检查官，一名夜间检查官，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吃、喝、聚会都在一起。新闻部副部长也住在这所公寓里，和我们同住

一个单元。如果那个夜间检查官对一份稿件拿不定主意时，他就持稿来找这位副部长。我住的房间紧贴厕所，仅有一张薄薄的竹板墙隔着，有时在夜间可偶然听到他们在里面悄悄对话的声音。原来这个可怜的副部长是个慢性便秘患者，直到夜深人静才去拉大便。一蹲就是一个小时，疼痛难忍。但他又是一个正派人，不愿意因个人私事在白天打扰别的职员。当他在那道薄墙后边的小屋里大便时，就要发出干咳、呻吟，有时候甚至是抽泣。在有些夜晚，当那个夜间检查官带着发往美国的稿件，艰难上楼时，这位叫徐邪（音译——译者）的副部长就让他站在便所门外，用英语向他读稿件，此公却不时坐在马桶上呻吟。他们讨论稿件时使用中文，我只能听懂其中的几个字。这位可怜的副部长和这位夜间检查官考虑这样一个稿件对美国人思想的影响，共同商定他们是否有权允许这样的措词发出去，他们是否必须告知那些重要的记者，这个稿件中的措词须转送更高一级的当局审批。他们并不想欺骗美国，他们在效忠自己的国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自己欺骗自己，怀疑的不是记者对中国是否友好倒是该记者讲的是否属实。“你认为他所讲的都是真的吗？”一个人会通过竹墙问另一个人，对他们自己所参与的战争产生了疑问。他们并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和我以及我们中的所有人一样，只是在服务于我们所认为的抵抗事业，但我们也都无一例外地一无所知。

下一步所领教的便是暴力了。

重庆在1939年5月3日，5月4日接连两天受到轰炸。

今天，在大气层遭到恐怖的历史上，这些轰炸已成为被人忘却的里程碑，但在那时，它们却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从空中进行大屠杀的标志。日本人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历史上首创先例。

日本人的第一次轰炸发生在5月3日的正午刚过，但我们办公室的防空洞距离炸弹的落点甚远。第二天傍晚，又进行一次轰炸。为欺骗中国的防空部队，日本人先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环城飞行，待中国的驱逐机燃油耗尽，落地加油时，突然投弹，进行屠杀。

那一天，我和新闻部的朋友们一起，离开我们在其中呆了很久的防空洞，到嘉陵江岸边看日落。刚到江边，四面八方的警报一齐响了起来。这时候，只听见从无云的天空里传来一阵嗡嗡声，接着便看见了由27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天空。中国的高射兵器准备好已经摸黑，红黄相间的照明信号弹犹如正在施放的礼花，指向日本的飞机编队，以便朝它们开火。炮弹在远处闪光爆炸——但很短暂，转瞬即逝，对上面的飞机无能为力。紧接着，从旧城墙里的山背后传来"砰"的一声爆炸，日本飞机已逃之夭夭，并未受伤。

我夺路回到办公室，又往四英里外的教友会住地走去。教友会在城里，是我那时的下榻之处。这时，天全黑下来了，我所看到的，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市同现代世界进行首次野蛮接触的反应——到处是一片恐慌。山坡后是正在蔓延的红色火焰，在这个红色半圆形火区的外缘，是正在逃难的人群。

他们有的靠双脚跋涉，有的坐在黄包车上，有的坐在轿子里，有的推着独轮车。当他们汇聚为人河时，偶而也有汽车和军用卡车鸣着喇叭一晃而过，或从队伍中穿越而过，使队伍断而又合，继续朝农村逃去。他们带着褥垫，铺盖卷，水壶，铁锅，食物和少量的家具。有的人怀里还抱着婴儿；有的老祖母爬在男人的肩上。但他们都不讲话，在默默的队伍中只能听到他们蹭蹭的脚步声。

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顶上，我的视野更开阔了。输电线被炸断，重庆的自来水干线也被炸毁，使大街上积水遍地。没有灯光，只有火光，没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庆旧城的大小山谷里横冲直撞。人人都可以听到大火吞噬竹林时竹节所发出的爆破声。还可以听见吵嚷声，女人的嚎啕、男人的喊叫、婴儿的啼哭应有尽有。有的人往石头上一坐，就颓倒在地，捶胸顿足。我听到背后的山谷里有人在哭贱，有好几次，我见到人们利箭般地从山坡后边冲出，来到大街上，他们的衣服上着了火，就在地上翻来覆去打起滚来，把火扑灭。

我回到教友会驻地，我到重庆后的前几周都住在这里。这时，我马上明白，不能再在此地住下去了。这座房子被落在附近的一颗炸弹震塌了，在我的房间里还横卧着一具尸体。它可能是炸弹爆炸时甩进来的，脸被炸弹皮削去了一块，肋骨架也被炸碎了。根据裸露的乳房胸肌可辨认出，这是一具女人的尸体。那一夜我不能在那里睡了，或许永远不能再来了，便走出去继续前行。在无意中遇到了好朋友，合众社记者马

丁，我们一起步行到凌晨4点钟。

那一夜，我一直陪同马丁散步，对新旧对比的悬殊感到迷惑不解。沿着那条我认为我已在几周里摸得很熟的主要街道走去，发现那些山坡仍掩映在竹林和茅草房群里。我来到一个仍在燃烧的山坡上，发现所有的房屋都已化为灰烬，有一座庙还在。它的一堵墙崩倒在山崖的一侧，殿堂已被烧得精光，只有那尊巨大的青铜塑像盘腿危坐。它被大火烤得灼热烫人，但我仍可看到它那慈祥的面孔正朝着这座哭泣和嚎啕的城市发出柔和的微笑。

第一天的轰炸过后，一如古老的部落对待危险的通常做法，重庆也对此作出了反应。这两次轰炸中间的那个晚上，这个城市的更夫，摇着手中的铃铛，在街上巡游，告诫能听见他呼喊的行人不要捡香烟抽。他提醒着人们，日本飞机曾撒下有毒的香烟，一抽上它就会被毒死。那天夜里恰好有月食发生，下午遭到轰炸的地方还在冒烟，人们就开始进行驱除妖魔的祈祷活动了。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月食是因为有天狗在吞食月亮。那天夜晚，人们都象履行职责似的，敲着铜锣，念着咒语，用以吓走天狗。眼下是第二个晚上了，经过那场骇人的轰炸，祷告的人没有了，保护这个古老城市的人民免遭新时代杀戮之灾的措施一点也没有。

统计资料会将人们引入歧途。这一次却没有。官方数字表明，那天夜里，在那场日本轰炸而引发的大火中，被烧死的人在3,000和4,000之间。究竟死的人数比这个数字大多少或小多少，对于我的回忆是关系不大的。现在看来，那一夜

死于轰炸的人数超过以往。这次屠杀的目的是造成恐怖气氛，这才是重要的。以前，南京和上海也遭受过轰炸，但是，那些轰炸都是属于战争性质的。在古老的重庆城墙之内，根本就没有军事目标。日本人精心选择，蓄意要把重庆夷为平地。对于城里的所有人民，是想挫垮他们那种不可理解的精神；对于政府，是想摧毁它的抵抗，摧毁它在重庆郊区建立的收容所。从那时起，当我们轰炸日本时，我从未产生过一点内疚之感。因为我们的轰炸，目的是摧毁日本的工业和军事实力。美国的飞机从没有象日本飞机那样对重庆大街上的行人用机关枪进行猝不及防的低空射击。

当时我还不知道，后来在越南才明白，无目标的恐怖要比无效果的恐怖还糟糕。无目标的恐怖摒弃了懦夫，拒绝了服从，关闭了潜在的合作，封死了刺激或迫使屈服的可能。对重庆的这种无目标的恐怖使我立刻联想到政治并开始了我对于政治的探讨。

我的体会是，政府只有兑现它的首要职责——保护人民，人民才接受政府。这是一条铁的规律。从炸得一塌糊涂的重庆到中世纪的封建领地，再到纽约的林荫大道或罗马城里那无依无靠经常倒毙街头的人们，都是适用的。不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或帝国，城市社会人民从无政府的状态下选择了政府，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们免遭他们个人或家庭力量所不能对付的灾害。

那时，在5月轰炸的日子里，不论是“逃亡”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没有人提出过政治抗议。那时，原来的

市政府已被取消，重庆被宣布为“特别”市，即中央政府的一个直辖市。任命的市长是经过他们挑选出来的一个亲美人物——吴国桢。他曾受过普林斯顿大学教育，能用英文写一手漂亮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吴国桢不是象美国的那种市长靠选票获胜的，所以他的施政作风是专横的，但政绩却是可观的。他清理了街道上的废墟，建立了灭火系统，修复了供水设备。他做起这一切事情来都象美国市长那样行之有效，堪可称之为一个现代美国市长的楷模，但他不会讲古老的重庆方言。

在以后的两年中，他管辖的这个城市里的地下工程获得了迅速发展，办法是用中国老式的黑色炸药实行爆破，再经过开凿，就成了防空洞。这个政府既给重庆带来了新的局面，但也招致了日本的连续轰炸；它对保护人民是认真负责的。渐渐地，重庆的政府和人民走到一起来了。两年后，就我观察，这两个方面的人都同我相处得十分愉快。那时的重庆没有太多的恐慌，新老不同的人物学会了和平共处。

但是，我并没有在这个国民政府里工作很久。作为一个宣传鼓动家，轰炸太频繁实在写不下去。在新闻事业上大干一番，把自己的观感大写一番的想法和在印刷物上见到自己大名的欲望日益强烈。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件提供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会。

伴随着1939年那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类似这类由远方决定的偶然事件经常发生。在纽约，亨利·卢斯已为创办三个刊物准备就绪，它们是：《时代》《生活》和《幸运》，用来对这场战争进行全面报导。卢斯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

人。约翰·赫西，也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那时他刚从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知名度还不算太高，就成了卢斯的心腹。年轻的赫西在1939年春天被派往东方物色"上弦工"，即能在亚洲向他的杂志提供稿件的人。

约翰·赫西在当年5月底抵达重庆时年方二十五岁，而我也刚在那个月度过了我的二十四岁生日。赫西在旅途中只在重庆呆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询问是否有闲散的新闻人材适合给《时代》杂志"上弦"。欢快、漂亮、高个子的赫西，是耶鲁大学足球代表队的队员，有着那时令我钦佩不已的各种现代气质，他的处事沉着和潇洒也同样令我倾倒。他那时的年龄，正属于一个开拓型的人物。他一喝酒，就慷慨高歌，就象我的祖父那样，声音浑厚雄壮。他还可以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体育场上对垒。有一回，180磅重的马丁喝得酩酊大醉，赫西背起他就走，一直背他爬上崖边的石级，防止了马丁摔下山去。那些天里赫西说起话来从容不迫，彬彬有礼，据我和外界所知，他写的东西也是高人一筹的。总之，就如我和卢斯一样，他热爱中国，中国也是他的出生之地。但是，他对历史投注的热情比对每日的新闻报导投注的热情更多。这最后一个气质使他颇自然地在两年后战争降临美国时候成为新闻学界新一代人的真正先驱。

那一周快结束的时候，赫西提出了要我当"上弦工"。按他的解释，这个工作容易极了。从重庆到纽约，一个字的电报费是50美分。是贵了一点。这样，我可以写一些背景性和介绍资料性的文章。杂志对中国的隔夜新闻和现场新闻不

感兴趣；我所写的时间跨度为六周至两个月的稿件才是有用的。总之，我可以写一些类似我以前发往《波士顿环球报》那样的短文，或不拘一格的随笔杂感之类，长短勿需介意，纽约的编辑部会选择录用的。我应当写的不是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正在发生什么。这是日报和新闻杂志的实质分野。这样，连同随时开销的附加费就能保证我每月50美元的收入了。

我立刻开始了往《时代》杂志发送稿件的工作。7月底，一个装满零星物品的邮包到达重庆，里面装了不少支票。其中有一张？元的支票来自《波士顿环球报》，我投给该报的那篇文章，又被《曼彻斯特卫报》买去，稿费是4个英国金币！我又把此稿投给“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居然也得到5个澳大利亚镑的酬劳！最高的稿酬是《时代》杂志的50元支票，附加一张125元的支票。那是我6月发给他们的第一批爆炸性材料的报酬。合在一起，比我在新闻部三个月的薪水还要多。我开始考虑我是否去做一名记者了。

我沉思着改行的事，但行动起来须小心谨慎。下一步，就是辞去新闻部的工作，去经营自己的新闻天地。我需要一个大部头的故事——一部叙事体而非特写体的独家新闻——这将使《时代》杂志和我凝结在一起。新闻事业和我接受的历史学教育幸运地联到了一起来。重庆的其他新闻工作者都被他们的工作拴在电传机和每天报纸的大字标题上了，他们不肯花上几周的时间前往只可步行到达的战争前线采访，而我一离开新闻部，就可只身前往了。于是，在1939年的9月，

欧洲的战争刚刚爆发，我就朝着北方的黄河之滨出发了，目标是正在打仗的山西省。如果我能赶上实际战斗，我就写出来发给《时代》杂志。写这些东西要比写已成为家常便饭的重庆大轰炸生动得多。

新闻部也乐于我离开，据我猜测，我的追问开始惹他们烦恼了。他们给我一个低规格的军事通行证访问战区，並安排了一张到西安的飞机票。从西安，我就要自己一个人通过250英里的行程到达战争的前线。幸亏我持有的通行证是低规格的，如果给我的是通常只给著名记者和达官显贵的VIP① 证，那么我就要被护送到前线，再体面地归来，什么东西也见不到，就象30年后我成了名，被隔绝在现实之外，身在越南却对越南战争一无所知那样。我的证件只是简单地证实我不是日本间谍，但这足可以让我以蚯蚓的速度穿过战争中的中国了。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往华北的旅行犹如从重庆的公路上一下子坠入它的山谷中一样——时间在慢慢往回倒流，回复到古老中国的那种农民文化中去。但是在那里20世纪的战争暴行正在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永远地焚烧干净。我看见延续了2,000年的文明正开始走向瓦解。一些年后，在这些文明的废墟上，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将建立起另一种文明。我就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结识这些共产党人的。

乘飞机仅两个小时就抵达了西安。然后用了五天多的时

---

① 英文重要人物的缩写。

间，才走了170英里渡过黄河，来到华北前线。以后又用了七天的时间，有时步行有时骑马，走完了80英里，来到前沿阵地。我在前沿阵地上滞留了几周，以后就漫无目标地在后方游历，最远到达位于北部沙漠边缘的兰州。

现在回忆起来，我几乎是突然坠入半是观光者，半是人类学者的心境中的。我虽然可以到村子里直接观察那里的人们，但他们对于我来说太陌生了，以至我无法理解他们。没有人会讲英语，而我又没带翻译，我在哈佛大学所学的那点中文也不比古典拉丁语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村子里更有用。待到两个月之后我返回重庆时，我几乎能用粗鄙的中国土话在中国任何一地探道问路了——但就在那时候，我所学到的也只是一些结结巴巴的中文。

我先从农村考察起。那时的中国依旧是一个农村社会，甚至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仍是那样。因为一个人看事情只能有唯一的第一次，所以在以后的六年里，把我对这些村子的印象，同我所见到的一个又一个的村子进行一番对照，发现所有的村子在我的眼睛里都是一个样，它们太相似了！

我见到的第一个村子没有名字。乘火车出西安还没到20英里就遇到一个炸弹坑。我到当地的军事部门亮了一下通行证，一个军官咕哝了一阵子，派了一个士兵送我到一两英里外的一座土屋里。我在那里的人家睡了一宿——躺在一张平放的门板上，身子底下铺一张席子，旁边卧着一头母牛。全家也都睡在铺有席子的门板上，小鸡在一旁咯咯地直叫唤。第二天我一醒来发现那个家庭的主妇在磨小麦，一头公牛套

在一根木棒上，木棒拴在磨石上，牛一走就带动上面的磨石转动起来，面粉就从下面的石磨缝槽里流出来。小鸡飞过来啄面，主妇就把它们赶走。土屋外有个大粪坑，在上面大小便时，要踉踉跄跄地踩在两块石头上以保持平衡，用树叶当手纸揩屁股。

如果说重庆象所有的中国城镇一样嘈杂的话，那么，大多数的农村却是沉寂的——昏昏沉沉，万籁俱寂。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正是农村所特有的冷漠和空虚的表现。村子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农民在自己的村子里生老病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一年四季同土地和庄稼打交道。在他们的生活中既没有信息，也没有激情，除了恐惧之外，所有的就是聊天。中国半数以上的村子都有寨墙环绕，寨墙里面有五六条小巷，这些小巷由用土墙封闭的小院子组成。在这样的小村子里，巷路都是人们踩出来的，在大一点的村子里，巷路则修得坚固一些。有的巷子里种有树，有的则没有树。车辙把巷路弄得坑坑洼洼，牲口走过尘土飞扬，苍蝇到处乱飞，孩子们都穿着没有裤裆的粗棉布衣服，脏物随处倒，瘦骨嶙峋的狗在太阳下打瞌睡。电气、报纸、汽车——这些都是距现实极为遥远的东西。

在以后的两个月乃至以后的六年中，我所经过的村子几乎都是用同一个刻板的模子倒出来的。农民和他的全家从土地上获取，靠土地生活，把他们的大小便还给土地，最后连他们自己都回归到土地里去。华南的农民吃稻米，华北的农民则吃馒头、小米和面条。蔬菜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逢年

过节杀只鸡吃，只有富人才能吃上肉。

当我在战区游历了一周后我知道了农村是如何自足自给的。除了暴力侵入，他们可以一如既往象这样永远地生活下去。当我骑马从山上下来时看到一处未受日本人蹂躏或现代公路干扰的农村。年轻的女人是健康的，她们黑色的秀发闪闪发光。有的山区仍很落后，做父母的仍让他们年轻的妇女裹缠着小脚。其实，这种习俗连同男人留辫子，早在30年前满清王朝被推翻时，就被明令禁止了。在这个村子里，小孩子们看来是幸福的。他们玩着充气的猪膀胱，拍起来象气球似的。有一次我的马停在村子里的街道中央，尿了一泡尿，成了一个水坑。一群小孩子马上过来做“跳池”游戏，一遍又一遍地在水坑上跳来跳去，直到有人落“水”了，才有一个老太婆走出来朝他们叱骂。她那拉大嗓门大声叫骂的情景犹如当年在波士顿的爱丽街头，我的祖母对我的责骂一样。

但是，越往前方的山梁上走去，就发现愁眉苦脸的村子越多——不是刚刚遭受过战争的蹂躏，就是正在遭受战争的折磨。过去一个山脊再进入位于另一个山谷里的村子，那里的生命循环破裂了。由于饥饿，孩子们的腹部肿胀，剃光的小脑袋上长满了癣，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个个含怒不语。在一个村子里，我见到一大群受沙眼之害的人。男人、女人、儿童都没有例外地红肿着眼睑，有的人不得不挤出眼角里的脓水，才能张开眼睛看见东西。在大部分村子里，不论男女，一过四十岁，满嘴黄牙开始腐烂脱落，只留下黑色的牙根，

发出恶臭。

村子里的文化生活是口头相传的民间故事，以过去的事情为题材。唯一的新闻渠道就是聊天，聊的是激动人心的惊骇、希望、传说和生活现实。我了解到村子里确实没有时间观念。到任何一个村子里问钟点对表，如果有三个人有表，就会有三种不同的时间。每一个村子都有本地县长所规定的时间标准。如果某个村子的时间是县长规定的中午12点钟，同时在20英里之外的另一村子，则可能是11点半或12点半，甚至提前或拖后一个小时之多。没有标准时间，所有的时间都是不准确的。日期是根据中秋节或月亮的圆缺盈亏来计算的。重要一点的日期或是根据某个军阀发迹的年月或是根据某个人是出生在革命（1911年）前或革命后而确定的。一个村子里只有一个公认的劳动时间标准——那就是日出和日落。日出，男人去田间耕作；看到太阳偏西，他们就知道该收工回家了。这时主妇煮饭，也许有一盏小油灯在黑暗里忽闪几分钟。那时可看到缕缕的炊烟，象一团团灰色的羽毛在渐黑的夜空中冉冉升起。待到做好晚饭或吃完晚饭后，天也就完全黑下来了，小油灯也很快熄灭了。这时，除城市外的整个中国，都笼罩在黑夜之中。除了四季分明的气候可以区分时间，别无任何现实的时间标志可言。

我们通过一条新修的公路穿过一些村庄。我们得到特许才可以走这种路。中国的农民可不行，因为公路刚刚竣工。但他们记住了通车的日期（象他们记住灾荒、军阀或季节一样），因为这条路把他们同外面的政府连结起来。这些公路

是有用的：小贩们可沿它们到村子里做买卖。但这些公路也同样是危险的。它使我渐渐明白了“交通干线”一词许多年前在欧洲的含义。“交通干线”为人们提供了多少便利，然而又使人担当多么大的风险啊。对于一条公路给农民带来的风险，我在1939年的那次旅行中所做的几页简短笔记，曾作过比较出色生动的描绘。

我离开前线时，有时搭乘军用卡车，有时则坐“黄鱼”巴士，根据我那天晚上的笔记，不久便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路上，我们的卡车追上了一头驮有杂物的驴。驴突然一转向，它背上凸出的横木撞碎了汽车的前灯。司机、机修工还有几个士兵都跳下了车，抓住那个农民就揍了起来。他们无情地抽打他，他发出令人揪心的哭叫。他在地上连连打滚，一会儿又缩成一团。他一边哭叫，一边磕头不止，那一幅媚态令人作呕。他刚一抬头恳求可怜，那个机修工就朝他的脸上踢去。和农民在一块的那个小男孩也大哭求饶。士兵们把这个男孩捆起来扔到行李顶上，再回来对那个农民拳打脚踢。直到队长（中尉）来了，他们才住手。队长要他们放走这个农民。农民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脸上红一块、紫一块，伤痕斑斑，一再向队长致谢。队长对士兵说：‘不要打他，没有用。’队长向我解释说，司机和机修工都恼火了，因为他们要为汽车的前灯赔偿20元钱的损失。”

现代化的中国是需要公路的，公路则意味着要训练司机和机修工，为了使他们不盗窃汽车零件或汽油——就要对他们的错误或过失实行处罚，不管是否属于他们的罪过。而司机

和机修工们看到农民占用了他们的路，本来就不顺眼，因为对他们不方便，如果威胁到他们的工作，农民就要大祸临头了。“交通干线”对于我这个持官方通行证的西方人来说是通行无阻的，但对一个农民来说，则是他最易倒霉的地方。

象政府的这种新玩意儿给村民带来的危险一样，日本人眼下正沿着这样的公路把村民引向一个更为危险的境地。

我不是来写一本关于乡村社会学专著的，我是对这场战争进行报导的，而我之所以选择了山西这个地方，因为只有这里才是中国最活跃的战争前线。1939年的夏天和秋天，日本人突破了所有的防线，接着就要占领黄河上的制高点，这样就可以对西安轻而易举地实施封锁，完全有可能把中国分割成两部分，即彻底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系斩断。日本的胜利以后被标榜为一个壮举，被誉为战争史上的壮观。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坚守的事实，即山西晋东南地区的那场战争却有在战争史上不可抹杀的价值。在1939年夏天之前，为据守这些防线，千千万万的人民付出了生命，一直到1944年，他们仍坚守着这些阵地。在历史的眼光里，他们的死没有意义，不值得记载。但对于我，却是领受到了一次非凡的教育，这是我亲眼目睹的第一个真正的战争前线。

山西省晋东南的中条山地区是这场战争的舞台。山西省蜷伏在黄河的转弯处，那年夏天，日本皇军出动了三个师团的兵力，企图肃清那个地方进而渡过黄河南犯。但那年的秋雨来得早，卡车、火炮都陷入了泥泞，从而给了中国步兵以集中兵力的机会，把日军分割在小块地区内。日军被孤立在

乡村集镇，企图逃脱，在被驱逐出之前，急得暴跳如雷，又一筹莫展。

我在1939年秋天所见到的那场激烈战斗发生在沁河流域。那里官路的修建要追溯到满清王朝，颤动的石板，上面还依稀印着马车的轨迹。我一直随同中国士兵行军。他们步行一天也就是15到20英里，这是因为要爬山下山，还要越过山里的沟沟壑壑，他们的长官都骑马走在队伍前头。他们所需用的一切都由士兵负荷着——铺盖卷、香肠状的米袋、弹药，还有手榴弹。有的士兵背着电话线、机枪零件、子弹箱、药箱，重量是其他士兵的两倍。骡子驮着拆散的火炮，压得直叫唤。从前线下来的病号，拄着棍子一瘸一拐的，要走上五天或十天才能找到最近的补给站。成群结队的乞丐走村串巷地讨饭吃，好象一支支的队伍。有时候你还可以见到强征来的农民抬着重病号或重伤员行军，他们中有的在昏迷，有的在呻吟，都赤身躺在担架上，苍蝇在上面嗡嗡作响。趁无人发现，我伺机沿一条日本人撤退的小路溜到一个被他们糟蹋过的村子里。如果我在记述日本人的行为时经常夸大的话，那么把我的记忆限制在原始文稿的记载里也许是最可靠不过了。

"……一个接一个的村子都遭受了彻底破坏。房屋被烧塌了，断壁焦黑，桥梁中断。房屋是被（日本）兵烧焚的，一方面是出于他们的无聊和残暴，另一方面是因为天冷，要点火取暖。

日本人掠夺起来既无选择又富有效率。任何有价值的东

西悉被洗劫一空。电话机、电话线、座钟、肥皂、铺盖卷都被集中运到他们自己的供应部门去了。在他们自己内部，士兵们之间也发生小规模的争夺。衣服和食物是他们所短缺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被收罗了来。什么女人的丝绸上衣，农民的棉裤、鞋子、内衣都被从它们的主人身上扒下来，谁叫这些中国人如此不幸地落入日本人手中，遭此劫难呢？

日本兵陷入了泥泞，怒气满腔，两周未刮的胡须竖立，肚子里饥饿难忍。在日本人来到之前，农民都逃跑了，他们的猪、牛、粮食和别的食物都被他们带到山里去了，那里是日本人无法涉足的。在整个沁河流域，一小股一小股的日本兵陷入泥沼，互不通音讯，吃的也渐渐没了……。村庄的名字（柳舍、王家庄等），在100英里之外就毫无意义了。在有的村庄里，凡是妇女都没有例外地遭到日本兵的强奸。有的村子村民们未来得及逃跑，日本兵进村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搜索女人，对她们恣意凌辱。逃到庄稼地里躲藏的女人也不能幸免，被骑在马上的士兵从庄稼地里驱赶出来。

村里的男人都被剥光了衣服，捆绑在马车上，让皇军当作禽兽拖在地上前进。日本人的骡马都在泥泞中被打死了，在这个流域的所有山路旁都可以见到这些牲口的尸体在腐烂，马骨头在阳光下都发白了。被强征来服各种劳役的中国农民也同样受着无情狂怒的驱使，直到他们倒下，死去或发疯。”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我所见到的沁河流域的激烈战斗使

我写出了一篇优秀的战地文学报告的处女作。

但是，还有比我的这些战地报告更为重要的，虽然完全遗漏在这些报告文字之外，却珍藏在我的笔记中，那就是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我希望我能把那个战斗的地区在我眼前所展示的东西描绘得生动一些。因为我在那五天的时间里所看到的，后来完全改变了我对政治的理解。

在那五天里，我穿梭于各个部队之间，从日本防线的后侧穿过，进入了游击区和游击渗透区——伴随我的是几个中国军官。他们的年龄都同我相仿，都是刚离开学校不久的大学生。他们正领导着一股股的游击队。在这里，如果仅从他们忠诚程度、合作态度和互相猜疑的范围来看，我实在分辨不出前线的一支普通部队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

我所能想到的唯一比喻来自当地的民间传说。我所通过的中条山的山谷是以雾霭闻名的，确实象我们现在所观赏到的巨幅中国画中的那种“云山”。中国的旅游作家们，一定会对山里低垂的云雾，远山深处忽上忽下的骑马人，产生奇妙的联想和创作的灵感。我眼下也身临其境，大饱眼福。一路上，只见远处的山崖上一队队骑在马上的人正在山顶上一条狭长的小道上攀登，象骑在一片云雾上似的——骑马人就象在天上！一下山，这些骑马的人就又消逝在云山雾海之中了。待他们沿着前面的足迹继续前行，不久又在云端深处冒出来了。再翻过一个岭又不见了。

我经常看见大车队和成群结队的士兵在远处的山雾里时

隐时现，他们的长官都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头。但在这五天里，我始终没搞清楚在远处山脊上，上上下下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所以，我也就不能组成正确的史料，因为我也在那座云山里迷失了方向——这里有政治的、语言的，还有雾中骑马的恐惧。然而，在这五天里，产生的插曲是重要的。

严肃的读者一定会把我这种在日本防线周围的冒险行为同我现在的极端小心联系在一起。我是刚刚被抛出重庆巨大的政治圈，带一口在波士顿学的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前往华北的。费了好几周的时间才把我学到的古汉语纠正到现代汉语上来；我出发了，还不知道怎样用学到的中国话问路、问便所，直到我坐上一辆运载中国士兵的火车，才在苦恼之中被这些普通的士兵们教会了正确的发音。我的中国话提高很快，不久便学会了诸如大炮、步枪、机关枪、连、营、炸弹、炮弹、师、司令部、飞机、距离等名词。在任何一种语言中，用军事术语对话是最简单的一种交流方式，但我从来没学过。甚至在中国生活六年之后，就连动机形成、人物传记、政治目的及事物变化的过程和原因之类的替换词都没学会。我对山西晋东南地区的战斗、政治的模糊回忆是有重大缺陷的。但是我的回忆所依据的记录却是真实的——通常是在夜里的烛光下写成的，当时我为了弄清那些一知半解的交谈和故事的含义，吃尽了苦头。

在我的记忆里把政治转向革命兴起的大舞台，是从一个十分荒谬的小舞台开始的，在这里政治的重要性远非战斗可以比拟的。这个舞台就是沁河流域，长、宽只不过70和30英

里。如果用美国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在上面打上方格，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完横线，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完竖线。但在那时候，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无线电或其它通讯设施，只有十几个世纪来一成不变地生活在村子里的人民；而眼下却要面临变化了。几天的步行和马背上的生活，使我走出了这个地区。在那片地区里，居住的是高度自给自足的人民，他们虽然孤立无援却不屈不挠地捍卫着家乡田园，他们是最优秀的战士，他们是最富于说服力的理想的传播者。他们就是和我同一个年龄的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正在实现让人民参与政治的理想。

有三个县，每个县约有20至30万农民，就散住在这块土地上。每个县都有城墙环绕，都有雉堞堆起的城楼——它们就是阳城、晋城和高平。在这三个县里，阳城和晋城的新任县长都才二十六岁，而高平县的县长只有二十四岁！他们中有两个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那是中国的哈佛。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专攻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毕业于省立山西大学，是专攻政治学的。当两年前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这些学生宁肯逃离被占领的城市到山里进行抵抗，也不愿呆在日本人统治下。他们懂得历史，他们年轻，朝气勃勃，血气方刚——所以，他们都是栋梁之材。其实（国民政府和省政府都很快地发现）任命县长的传统做法，在战争中的晋东南已完全不适用了。

以阳城县为例吧。当日本人于一年前，也就是1938年夏天首次来犯时，年老的县长率领一班官员，身穿黑丝绸长袍

到城外去迎接这些强盗，向他们屈膝投降、优礼有加。这是他们对所有的土匪和军阀所惯用的一套。日军的大队人马过去了，日本飞机跟来了，对站在阳城大街上的农民用机关枪进行扫射。农民以前从来没见过飞机，就站在大街上看，因此他们都成了牺牲品。之后返回的日军屠杀了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全部农民。日本人在1938年秋天，还进行过一次类似的袭击。在这以前，不管中国的军队番号有多么杂乱，但指挥官们都在呼吁当地的民众给予更多的支持。当我1939年夏天抵达那里的时候，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在晋东南流血的30个县里，那些身穿黑长袍马褂的老家伙都被年轻的新式人物取代了。当然，並不是所有的新式人物都是完全胜任的，也並不都具有我所接触的那三位县长的阅历，但他们都是高度灵敏的控制盘，当地抵抗运动的领导中坚。军队需要他们的支持，需要靠他们同农民建立联系。对日本人的屠杀政策感到厌恶和恐怖的农民自愿投向能活命的任何地方。

那位年方二十六岁的阳城县长，是山西省立大学研究政治学的毕业生。有天夜里，我就睡在这位县长的大院子里。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他正在向村里的骨干们授课，讲的是“政府”的功能。要他们一定不能打农民，一定不要向农民强征苛捐杂税，公粮必须直接交给他所指定的副县长们，这样才能为军队提供给养。

那个晋城县长也只有二十六岁，北京大学毕业。他倒是一个善于装腔作势的人，嘴里总是紧紧地叼着一个烟嘴。晋城地区盛产煤和铁矿石，他就在山里建立了一些铁匠炉，造

手榴弹壳，里面填入黑色炸药，就可用来伏击日本的军车了。有一个作坊里正在为士兵和军官造手枪，钢材是从日本扔弃的设备中捡来的。

那个刚刚二十四岁，恰好和我同岁的高平县长，穿一件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大衣，那大衣宽松地挂在他丰满的骨架上，几乎拖拉到地。圆圆的脸，金属边的眼镜，谈起话来，颇象个刚毕业回家的学生。我用蹩脚的中文和他谈起了历史，而他却避开历史大谈起组织乡村自卫队的事情。这个姓曹的高平县长，向我指点着地图上日本占领军、共产党游击队、政府军和国民党游击队之间模糊不清的接合部位。曹县长是忠于蒋介石的，但他也同共产党的游击队相处得和睦。当然他也是效忠于本省的军阀省长阎锡山的。路过的国民党的队伍他也予以关照。凡是抗日的力量他都给予方便。因为他是学中国历史的，他憎恨的只是日本人，他的唯一目的便是组织抵抗。

这三个年轻的县长，在我抵达的时候，都对战争这门学问有了相当精湛的研究。在他们的辖区里，敌人得不到一点合作，使他们不能象在别地那样横冲直撞。在被占领的山西省，日本军队里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是"傀儡军"——中国人中的变节分子，满洲的中国人，台湾的中国人，以及没有民族意识的华北农民等。他们为敌人效劳是为了温饱，为了钱，或是惧怕他们的家庭遭到报复。山西的那三个学生出身的县长进行的就是唤醒民族意识的工作。

他们的信条是：人人必须战斗。妇女必须打日本人——

于是出现了全国妇女救国会的组织。她们为军队纺线、编草鞋、织毛毯。学生必须打日本人——出现了全国学生救国会的组织。每个村都有自卫队——大的村子里由三十人组成，每人发五颗手榴弹，每支自卫队有两三条枪。儿童必须站岗放哨；不能逃走的老人在敌人经过时也必须担负监视他们的责任。烧掉他们自己的房屋，使土地荒芜，农村凋敝，总比让它们为日本人服务要好。每个村子里的墙上都刷上了大标语："坚壁清野、人去室空"。

那三个年轻的县长懂得，他们是在有意识地实施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那一套组织办法和行政措施，在使农村成为让一切敌人都闻风丧胆的畏途；他们在对纯朴的农民进行思想教育，教会人们进行自卫和杀敌的方法。他们三人全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但他们却没有理由去敌视他们的共产党盟友。我距离前线越近，就越感到这种关系的温馨。

那个待人热情的高平县长，对共产党非常友好。他的那个县已被占领，不可理解但却很清楚的事实是，它被一分为三：一部分是日本人的，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另一部分是共产党的。这三块地方相互交叉地存在，这三部分实体都心照不宣地相互承认。因为我一直想见见共产党，他又每天同共产党打交道，于是就由他介绍我同共产党游击队进行了接触。

那位共产党领导人——我的笔记仅记下他的名字是吴连长——比我岁数大一点，他看样子约有二十八、九岁。个子高高的，很少见他脸上出现笑容。让我费解的是，他对蒋介

石政府的憎恨程度竟同对日本侵略者一样强烈。我们在他的位于日本防线后侧的营地里进行了一夜的长谈，才知道他恨日本人，是因为日本人是杀人犯；他对蒋介石也是满腔怒火，因为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领袖”——共的共产党队伍每人月领仅1元钱（折合15美分），而蒋的政府军月薪却是8元（折合1美元20美分）；政府军的粮秣都是装在麻袋里运来的，而他的队伍只能劝说农民分摊。政府军的枪支弹药都是供应的，他的士兵只能从作战对象手里缴获所需的步枪和机关枪。他的这支队伍里有八种不同型号的枪支，你怎么能搞到这些不同型号的子弹呢？

吴连长表情严肃，精力充沛，是个十分精明强干的青年人。我现在回忆起来，他不知道怎么突然变换了话题，对“托派”产生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怒火。最后，我才从他激烈的长篇演说中弄清楚“托派”原来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些山沟里，在战争的环境中，战斗的和朴素的共产主义孕育了他的政治观。他以前连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也没见过，但对这个托洛茨基派系的火气，也同对日本人和蒋介石一样凶。他说，托洛茨基分子是属于“一切反”的那种人。吴连长说，这种人对一切事物都持反对态度。托派反对日本人（反日），反对蒋介石（反国），反对共产党（反共），总之，他们什么都反，所以称他们为“一切反”。他的部队最近就处死了一名托洛茨基分子。我问他是如何识别这个人是“托派”的，吴连长愤愤地回答说，他在帮助日本人做事。以他的能力，他对托洛茨基怪物的怒气大概是不会错的。但令我不可理解

的是，30年后围绕着毛泽东的那种算命先生式的说教而展开的宗派斗争，竟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去打击共产党人。

到第二天早晨轮到我发火了。那时候，我被这些古老的中国农村中不同的时间标准惹怒了，並且是爆炸性的。我打算在6点钟起床，7点钟骑上马出发。7点到了，8点到了，一直到了9点钟，才有一个排的共产党士兵来接我。所以我想，中国共产党也不见得比国民党或军阀有较多的时间观念或时间选择——他们简直就没有时间标准。但当我路过吴连长的村子时才恍然大悟，他们为什么耽误了我的时间。孩子们在大街上排着队，挥舞着小旗。旗上写着一些中国和美国是朋友、中美两国应当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斗争进行到底之类的话。其中有一个醒目的大标语上用英文写着，"欢迎西奥多·H·怀特，著名的美国记者，抵抗运动的朋友。"我的怒气顿时冰消云散。孩子们唱着歌，把我当做一名英雄送到村外。吴连长赠送给了我一套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大衣和军帽，我们又继续赶路了。

吴连长向我解释了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它们全都是些简单的大道理。晚秋或冬天不能打游击战，因为庄稼收割后，田野里丧失了屏障。夏天和早秋是他们大显身手的良机，因为庄稼长高了，能为他们提供掩护。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和日本人的战斗，他们从来也没有进行过一次阵地战，一次也没有过。他们跑到山里，躲进村里，消逝了，溶解了，以后再去另一个地点集结。有农民同他们在一起是必不可少的——搜集情报，提供庇护，供应粮食，

照看伤员。毛泽东的话："人民是汪洋大海，我们是大海里的鱼"，是他们的最高信条。

毛泽东所说的"大海"倒更象我们正沿岸而行的一条滚滚大河。当我们骑着马走走停停，涉水过河时，我渐渐地发现，在我们停下来的地方，总有一些小孩在吵吵嚷嚷，有的成群结队，有的三五成群。原来他们也被游击队里的浪漫生活所吸引，投身到这条滚滚大河中来，並成为游击队的一员了。他们被称为"小鬼"，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些从十岁到十五岁大小不等的孩子。是战争使农村解体，他们才离开家，跟随大一点的兄长到游击队的，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夜里，他们坐在营地里听老兵们讲故事。至于内容少不了那些口头相传的关于1934年至1935年长征的传说。他们做饭、挑水、运东西，军队成了他们的家。当部队遇有深河大川，孩子们难以通过时，老兵们就把小一点的孩子放在肩膀上背过河去。这些小孩子，如果他们能幸存到今天，或许成为了中国红军①的指挥官了吧。他们所来自的那个世界已经绝迹，军队成了他们父母依托和家庭。

那个正在被扫荡的旧世界，在吴连长领我登上一座山脊朝下观望时，十分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下边的山谷里有一个高墙盘绕的大村镇，里面有一个日本的岗楼。当我们瞭望着散布在山谷里犹如星罗棋布的小村子时，吴能辨别出哪

① 原文如此。请读者注意，在本书中，作者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区别历史时期，一概称为中国红军。实际上，这时军队应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些是“我们的”（即共产党的），哪些是“友军的”（即国民党的），哪些是被日本人占领的。

这简直是在欣赏一幅微细胞结构的放大照片。那时的中国是个拥有五亿人口的国家，那么，也许有三亿人口生活在这样的小村庄里，每个小村庄就是一个单一的细胞，迄今为止，处于世界上一个最不富于变化的社会里。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时间停滞的中国历史上，这些细胞一直凝结在青铜器的绿锈上。延续数千年的帝国政府生活在一种令人赞叹的珍品和残酷的文化之中，把铜锈磨得闪闪发光。但是，在青铜器的绿锈下面，早已产生一种融解性，在慢慢地使生命的冻块融化。它的躯壳尚存但却脆弱得很——一接触西方的商业，一接触到军阀，即变得脆弱不堪。眼下终于在日本人强加给这个国家的祸及农村的战争面前，脆弱得无法生存下去了。每个村子的领导阶层都面临变化，由于需要生存，一种新的思想正在产生出来，那就是需要一个必须提供保护的政府。在那个山背上和我一起观察的吴连长，是个讲究实效的年轻的游击队领导人。现在我能够把他那时所指点的村子形象地演绎为我想象中的政治融解。山下那些由共产党占据的村子，都有一个一眼可以看出的标志，那就是围墙被推倒了！吴连长说，这样做，游击队可在日本人进村之前或之后逃走或进入，不再存有被围墙阻陷之虞了。

这位共产党人憎恨围墙，这属于一种猎人式的条件反射，以后他们胜利了，哎呀，这种憎恨竟变成了对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漂亮、最宏伟的北京旧城墙的毁灭。但在那个时候，

共产党人正同日本人作战，知道世界需要变化，推倒围墙便成为了他们到场的明显签字——这就是旧中国融解的象征。

而我，在这五天的艰苦跋涉中，在前线地区，我虽然见到了这一切变化，但却不能按照报导的模式撰写成漂亮的故事。旧制度在日本的渗透下消融、崩溃了，共产党人也把他们自己融化在遗留物之中。日本人的侵略，袭击、轰炸、震塌了中国一处又一处的建筑，所遗留下的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群密如海绵的民众。这是一处充满被捣碎的巢室的蜂窝，在大部分的巢室内还留有一定的锋芒。有些村子支持国民党，有些支持本省政府，也有支持共产党的——总之，谁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保护，使他们的女人免遭日本兵的奸污，他们的男人免遭强征劳力，他们就支持谁。日本兵来了要杀人，共产党人恰好是抗击日本兵的强硬对手。

有一则小故事也许会给这群处于抵抗中的蜂窝添加些乐趣。我清楚记得一个晚上，我同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中尉一齐骑马外出，他是当地游击队的一位负责人。日本兵朝我们冲过来，我们连忙夺路而逃，跑到山坡上的一个村子里，太阳正在下山。据我现在回忆，我骑的是一匹白马，配的是木鞍，在追击中，我吃惊的发现，在木鞍和马背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毛毯。毛毯已经破裂，马皮被磨破了，马背上在渗血。这是我们在穿涧越溪使劲抽打它赶路时才发现的。我们来到村子里，央求农民给马弄点吃的，喝的，为出血的马包扎一下。中尉让我们几个人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向几个农民索要水和食物。他对他们说（我那时已能听懂很多中国口语了），

“我们是八路军。”就是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我问他为何这样讲，我们可是一帮国民党的人呀。他急促地对我说：“住口！如果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国民党的游击队，他们就不会给我们的马弄吃的弄喝的了。”

这则故事，我当时还并不觉得有什么重要之处，但它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共产党所带来的信条，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它们已经渗入到山沟里，已经占据了这些既不会读书又不会写字的农民的“灵魂和思想”。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农民并不是对国民党有什么敌意，国民党和他们一样也恨日本人。但他们的政治领导阶层，被以最朴实的方法，争取到了共产党方面。共产党人在开始传播理想了。

这种由又联合又冲突的势力所组成的拼凑是奇怪的，但这种奇怪的拼凑并不仅限于吴连长向我指点的这个山区。远不止这块地方。例如，我到高平县前线时，一路上是被第四十军护送的。我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军的士兵都是满洲的中国人，当1931年日本人夺取满洲时，他们被赶出了故乡。但他们一直在战斗。在1936年的西安，就是他们参加了先是包围，继而是劫持蒋介石的行动。他们的人员目前受到缩编，但他们为返回家园已经战斗了十个年头。四十军的人同共产党相处得很好，尽管他们名义上仍属于蒋介石的国民军。我从高平四十军的防地被送到共产党的部队，再从共产党部队送到第二十七军，一路上冻得直哆嗦。这个军是绝对地受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官指挥的。刚刚离开游击区，我是在受到强烈怀疑的情况下被接待的。二十七军是我在前线见到的唯一同

后方使用电话通讯的部队。由于怀疑我的身份，前沿部队的指挥官就让我在前厅里闲逛，我又饿又累，他在向一系列的单位打电话证实我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是日本人的侦探，还是共产党的间谍，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流浪汉。接电话的那个人肯定掌握着我的通行证号码，当那个指挥官知道我确实是个美国记者时，立即给了我优厚的礼遇：他的士兵用热水为我洗了脚，给我递过来几条用香水喷洒过的热毛巾擦脸，饭菜是极好的佳肴。

从前线回来的路上，我对事情看得更清楚了。拿第二十七军来说，它的新兵都是从远在南方的云南和四川两省征来的，他们都有足够的给养，因为上尉以上的军官，全都是蒋介石开办的军事院校的毕业生。而第四十军就不同了，因为它一度是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奉军，其时已变成"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下。这个二十七军同驻守在他们南面的杨虎城军队也不一样。杨虎城系绿林出身，既单纯又幼稚。当我离开二十七军返回时，也由军队护送，防备的不是敌人，而是杨虎城部散漫的士兵可能施加的伤害。

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不仅让他的军队全部接受了洗礼，而且他还大力推行最基本的社会道德。他禁止他的部队奸淫妇女，违者要处罚。举一件时常发生的事，就是在巡视部队的时候，在检查完枪支后，他就命令所有的士兵伸出手来检查一下手指甲剪了没有。我对于中国生活中的军阀统治的偏见，在经过这次旅行，进行了一次政治人类学的调查后，立即终止了。这些军阀的人格都是颇具魅力的——较

多的魅力是产生于退化到野蛮状态的政府里的轶事，——但他们都是过去的人物，而非现实的。在那段时间里，我搜集了关于军阀的传说，但我记忆最清楚、也是最后一次的关于冯玉祥的印象是发生在战后的纽约。那时我们时有来往。他的寓所位于河边大道，赫德森河的风光尽收眼底。但他的屋子里塞满了行李箱、纸箱、杂货、咖啡、菜汤和罐头等。在别人的劝诱下他原准备在纽约定居，供给则完全由受他控制的人员保证。他被说服离开美国到苏联是在1948年。他也许被认为对俄国人无用，所以烧死在黑海里的一艘轮船上。① 其他军阀也各具特色。以吴佩孚为例，他不仅是占据河南的军阀，还是个热爱花草树木的人。他曾试图在全省都种上花木，但只在他所控制的铁路沿线获得成功。在直奉战争中，满洲军阀张作霖败北，吴佩孚追赶他。在撤退中，张作霖传出命令，要他的军车在沿途所经之处，都要派出军队去砍伐吴佩孚当年栽植的小树。这些砍树的队伍里可能就有我这次旅行中所遇到的第四十军。这些军阀的许多残部都参加了对日本人的作战，尤其是山东军阀的部队，最终都倒向了共产党方面。在20年代盘据山东达十年之久的大军阀是张宗昌，绰号“老八六元”，传说他的阳具在不勃起时也有86个银元堆积起来那么长。一个银元摞在另一个银元上——那么，差不多该有九英寸长了吧。

我对前线之行的全部回忆尽是些村庄、山峦、杀戮、贫

① 冯玉祥系因电影胶片爆炸而亡。作者这里的说法显然是一种带偏见的推测。

穷、艰辛，但我结识并产生好感的那三个年轻的县长和吴连长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不可磨灭，他们的音容笑貌常在脑际浮现。老年人用理想激励着青年人，但只有青年人自己懂得其他青年人如何进行去留取舍的抉择。在一般情况下，学生是传播理想的最好工具，因为他们的思想具有可塑性，能适应变化。他们还能够调整老一代的思想给现实的影响，就象他们在中国的农村和山区所做到的那样——在美国的贫民窟和郊区的情况也是这样。

老一代的人头脑在逐渐僵化，但却坚持着在同一个柜台上经营他们的那一套理想；他们懂得已暴露的错误之结症所在，但却脆弱得弄不懂怎样去确定错误的实质。年轻人也是要变老的，但是把激情转移到政治再变为动力，其速度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离开晋东南一年后，当我想同那里的朋友们再沟通联系时，才知道阳城县那个年轻的县长，也就是那个专攻政治学的大学生，已经受到了清洗。但是被谁或哪个集团，是什么原因清洗的，我无从得知。其他人的情况也一概不得而知。年轻人进行胜利的事业有时会一帆风顺的。他们中的幸运者把自己磨炼成为官僚，遗弃了贫贱时的伙伴，那是另外一种逻辑，即政治逻辑侵蚀了他们。大多数人在通往胜利的旅途中或颓唐落伍或献出了生命——我确信，当多年的革命使他们变得冷酷时，在我的那些青年朋友身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乘坐巴士从战区归来，记得的只是在跨越秦岭山脉，

向着南方行进的漫长旅途中，一路上那绮丽迷人的风光。这个山脉是华北和四川省的地理分界线。一过阳平关，半小时后，你就会把覆盖在北国贫脊的大地上那被侵蚀的山地抛弃在远方、发现你正面对那温暖湿润的四川盆地，竹子已开始在山岭的南麓发出新芽。

四川仍是一片和平的绿洲，看不见有战争的气氛。我越过秦岭之后的第一个夜晚便是在一个香烟缭绕的寺庙中度过的。周围修竹丛丛，院中的水池倒映出一轮圆月，池中的几只水鸭弄得水波鳞鳞，月光涟漪，和尚念着单调的经文，和我在波士顿博伊尔斯顿学院的书本上所看到的中国一模一样。虽历经十几个世纪以来的改朝换代，这座优雅的古代建筑却依然被保存下来。当我把在华北的耳闻目睹作一番比较之后，便对这种“优雅”还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多久产生了疑问。

我领教了一堂关于政治、政府和历史的教育。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名副其实的第一课。那就是政府建立在人民中间是第一要求，让人民感激地接受它，它就要保护人民免遭暴力袭击和杀戮。我是从大轰炸后中央政府取代当地的重庆政府的时候才开始观察到这一点的。但我目前已经看到了政府在山西的山沟里意味着什么。那里的共产党人並未宣称他们自己就是政府，但他们正在发挥着政府的职能，为人民提供保护。

在以后的年月里，我又学到了许多关于政治和政府的课程，但究其重要性都无法与这一课相比。

所以，在我奔赴重庆的途中，我不能再把蒋介石或他的美国化的政权看作是一个真正的政府了。他们实在缺乏对时局的控制力，而我则迫不及待地要同他们分道扬镳了。

第二章

亚洲采访：名人轶事

我回到重庆两周以后，才知道我已成为一名为人所注目的记者了。

《时代》杂志发来了电报，对我发自前线的报导表示满意——登载我的文章的杂志也到达了。我发回的稿子占了整整一页半的篇幅，下面署着我的大名！——大名前面还冠以“特派记者”；这个《时代》杂志以前从未赐与他人的殊荣，让我首次获得了。为配合我的报导，杂志里还插有一幅地图，用弯弯曲曲的红线标示我这个记者进入山西晋东南山区的路线。约翰·赫西把我的文章修饰得天衣无缝。纽约的一家叫兰道姆的出版商发来了一封电报，邀我写一本关于中国战事的专著。我已经首战告捷，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了。

到1939年12月，我离开哈佛已经一年半了。《时代》杂

志自愿提高每月给我的各种保证费用，中国新闻部也乐于接受我的辞呈。临别，出于同舟共济的情谊，新闻部里的同志们为我举行了一个宴会，庆祝我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外籍记者。但他们对我的关切並没有就此中断。

对这些人来说，或早或晚，终有一天都会幸运地从这个群体中脱离的。当这个最令人陶醉的时刻到来之日，也即是他们挣脱其他人的羁绊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之时。只有到那时，他们不再是受人支配的生命之躯，他们才会认识到自己的愿望和权力。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个决裂的时刻发生在三十多岁的最佳年龄，那时正是人们生命之泉的活力顶峰，而且这种活力也已经受到阅历的淬砺。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这样的时刻则来得晚一些，发生在四十岁左右。我们这些人都处在战争的年代。战争，可怕的战争，赐与了我们挣脱那个管理锁链的机会，也封闭了我们早年接受专业科目训练的可能。如果有人已幸运地发现了某个重大激烈的活动，如果有人能够找到使自己置身于这种活动之中的途径，这个决裂的时刻也许在二十多岁时就到来了。幸运之神把我带到了中国。幸运之神把我带进了战争，这种活动令人感奋，足有写出来供发表的价值。战争酝酿了机会：美国驻在国外的或战地的记者，在1938年我离开哈佛时也许只有200人，到了1945年，估计已增加到大约3,000人了。战争是一种刺激性极强的事业；我是一名战争中的弄潮儿，並受着它的浪打波击。

对我来说很清楚，我再也不可能回到波士顿做我的历史

学教授了，那个梦在重庆的五月大轰炸和山西战争中间突然中断了。

我再也不是一个观光的学生了。但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一个记者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去做，尤其是一个驻外记者的职责是什么，就我那时看来，我仍然是一名另一个类型的观光者——把所见所闻的印象搜集起来，写成文稿，再装入稿件袋中邮走就是了。我搜集的是所见所闻的名人、轶事，还有关于各种人物的传闻。《时代》杂志在那时的影响力远非今日可比，那时喜欢登载的是奇闻轶事，妙语格言，不管它是真还是假。如果涉及到某一种历史观点，纽约幕后的编辑们先确定这种历史的含义，而记者们只是提供原始材料。我作为一个原材料的采购者，在远东负责搜集名人及各种人物的奇闻轶事，我乐得其所——确定大政方针的人反正在纽约。

我的地位变化，使得很多好事接踵而来。

给《时代》杂志中国记者的请帖来到了。其中大部分是发自外交使团的。我们这些被派住到这场差不多被忘却的亚洲战争中的使节，形同流放，天天晚上设宴相互招待，互相交换所获得的一星半点情报。伴随这种外交邀请，我们也偶尔可以接触到了异性。有一天晚上，我应邀参加比利时公使馆的正式宴请，日本飞机突然来空袭了。我们急忙钻进公使馆的防空洞，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我开始同一个女人攀谈起来。她是中国人，是比利时公使馆里一个随员的“女管家”，而这个随员却不会讲中国话。大伙儿都蜷伏在防空

洞里等待轰炸，她就和我开始用中文扯了起来，在场的其他外国人谁也听不懂中国话。所以，两天后我们俩人就在一家中国旅馆里约会了。我们租了一间房，她向我诉说，我是如何地让她神魂颠倒，昼思夜想。我们吃的饭菜很好，但约会的经过却令人扫兴。受炸弹震动的旅馆窗户上糊上了一层油纸，中国的服务员用手指头把纸捅破个洞偷看我们。我们来到床上，我笨手笨脚地抚弄她。一眼就可以看出，我的床上功夫尚欠火候。她抽泣起来，用中国话说道："你真是个孩子家，啥子都不懂哟。"在战争早期，我所需要的性生活，从此以后，就这样不拘礼节地时尔进行着。爱情是在很久以后才降临的。既然对此道已经入门，也就放弃了对性的美好憧憬。

但是，还有比我在那外交使团防空洞里的艳遇更为重要的，那就是我结识了第一个大人物。当他在历史书里出现时，所扮演的是"代表性的人物"。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真算三生有幸，他竟被派到重庆做英国驻华大使来了。他就是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后来晋封为英佛查普尔勋爵，任驻华盛顿大使。我现在才知道，同漂亮的年轻人聊聊天，同年轻人一边思考一边说话，对年轻人进行启迪和开导是老年人的乐趣。经过几次会见，克拉克·克尔，干脆让我称他为"阿尔奇爵士"，一有闲工夫就和我聊天，什么历史呀，大英帝国呀，已经使用或正在使用的外交手腕呀等等，从上个世纪到目前无所不谈，使我受益匪浅。象所有年轻的英国外交官一样，在那个世纪的转折时刻，他也是被招募来的。那时的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是个同性恋者，他仔细审

阅所有年轻的候选人后，把他们派往世界各地担任不拿薪水的秘书职务。作为一个刚跨入外交门槛的外交官，阿尔奇曾一度在华盛顿受教于伟大的布赖斯爵士。他是从别人口中才知道这个爵士的。布赖斯爵士的经典著作是《美国财富》，在他写作《共和国》一书时，听到有人议论他似乎是一边聆听柏拉图的说教一边撰写此书的。在1914年至1918年的堑壕战时，阿尔奇离开了外交界与苏格兰政府军共同战斗。后来他又回到外交界。他的阅历使他具有世界观点。这一点，是在重庆的西方外交官都无法匹敌的。

对于我，最重要的一点，是阿尔奇爵士担任了我的政治学老师。象把邮票一张张地嵌入集邮册一样，我把他的观点都一一载入我的笔记本里。克拉克·克尔会把我谈话中的所提及人名一一挑出来，再把他们插入到政治和历史中去。我从外地或战争前线回来，根据原始材料进行报导时，他就来听，把我所见到的东西分门别类。他总是把题目扯到共产党身上，他相信共产主义者终将在中国取胜，但他並不为此感到悲哀。他说那是历史的归宿。在重庆的战争年代里，也许克拉克·克尔是最优秀的老资格的外交记者了。

“名字”对于年轻的记者犹如银行的存款。它们是可信的参考资料，是联系其它事物的关键，是获取其它资源的先导。把那些邀请信件翻译过来就是一大堆朋友，再进一步就是故事。许多年来，直到1963年，我对故事的创作也即是对名字和人物的探索。自从认识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开始，到1940年的春天和夏天，我的人名册越集越厚，我所编

织的故事的网也越来越宽了。合资的《时代》杂志向我发来了一个不可违抗的指令，去东南亚旅行，填补他们资料室里的空白，就是说用我所擅长的新闻特写、人物报导和旅途观感之类的东西来填充他们的资料室。欧洲已经燃起了战火，荷兰、比利时、法兰西相继陷落，战火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到亚洲来，《时代》杂志想获得足够的背景资料填充他们的档案，待一旦发生事变时以便对它们着色描绘。他们将负责这次三至四个月的旅行费用，这便意味着我可以第一次享受我平生一直相信我应当享受的——最高级的旅馆，最高档的饭菜，可以不必为包车费或附加费同人家争吵不休了。

我在东南亚的旅行中所度过的那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只有两个印象值得重提。我关注的主要是搜索名人、名言和风土人情，但实际所看到的却是20世纪里最大的一次扩张。由于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在越南故事的第一回里做了失策的估计，并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那时是一个为人所瞧不起的人物——的主要人格产生了误解。

这种扩张当然是来自日本人。在整个30年代，日本人就象纳粹在欧洲那样在亚洲横冲直撞，使这块大陆上的全部政治和全部事务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当时的日本的工业正处于发展的门槛上，为把他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欲望变成现实，这种欲望正演绎成为掠夺海外资源最露骨的狂热，石油、橡胶、锡、煤、大米等都在攫取之列。法兰西陷落了，荷兰被占领了，不列颠被包围了，——这些古老帝国的昔日大大小小的属地都展现在掠夺者的面前。我沿着日本人扩张的屠

洋——法国人的印度支那，英国人的马来西亚，荷兰人的印度尼西亚，美国人的菲律宾——的边缘地带，试图记录一些关于日本扩张压力的性质和范围的资料。

我仍然对日本人怒火满腔。我承认这是一种偏见。在重庆和华北，我第一次领教到的暴力就是日本人赐予的；而1940年的那次考察日本人动机的漫长的东南亚之行，又一次证实了我对日本人的厌恶。他们那种赤裸裸的野心和粗鄙的手段令人可憎。他们所仗恃的是飞机、军队，没有一丝一毫的正常外交礼仪可言。在印度尼西亚，他们西装革履，脸色冷峻地向荷兰殖民当局递交索要石油的哀的美敦书。他们坐在河内那古老的洛可可式的大都会饭店里，身着咖啡色衬衫，呼噜呼噜地随意往地板上吐着痰，对谁也不屑一顾。他们来向法国殖民当局索要越南北部的三个空军基地，有了这三个基地，他们的空军就可以对中国的华南进行轰炸。在这个地区遇到的正在扩张中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带有兽性。

我到达的第一站是河内，日本人正在这里逼迫法国的殖民统治者屈服。我真羡慕那些天天只照发电讯稿的记者们，不管法国当局的还是日本人的那一套电讯是多么明显的不值一顾，都被这些记者们很好地装订成册。但我对我的邮递员工作很满意，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方面，集中在我的文稿中所称谓的“土著”或“安南人”身上。我发现他们在大街上总是点头哈腰的，在我的报导中把他们描绘为“一屁股坐下来，口嚼槟榔子，什么活也不干”，不管是法国人留下或日本人进来都是这副模样。我在报导中说，在他们身上确有

一种迷人的具有异国风情的"土味"，我特别指出他们女人的姿色。她们走起路来总是令人吃惊地保持着笔直的身材，依我的人类学的观点看来，应把此归结于一种训练，那就是越南姑娘从小就用头顶筐，又要走路又要注意保持平衡。从人类学的观点进一步观察，她们的这种美色也同马来人和中国人混合的血统遗传有关。强健的体格、丰腴的臀部和胸脯，是马来人的特征，娇嫩的面孔和表情则为中国人所具有。至于他们的男人，我所接触和所听到的关于"土著"的情况都是从法国人那里得来的，讲出来就更不中听了。我为一家美国杂志进行了一番推测，一旦同日本人在战场上交起火来，当地会出现什么样的抵抗，我的估计是，"土著"既不会支持法国佬也不会支持日本人。在谈到今后的越南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时，这个曾使我们的国家在战争中丢尽脸面的民族，我却在一篇报导中把他们归结为"一群群只会哀鸣呼号，卑躬屈膝，死气沉沉的苦力，集骡子、公羊、兔子的特性于一身。"

也许是我在法国人的印度支那旅行并同那里的人进餐时，才不可避免地得出这一结论的。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掩盖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事实，那就是在这块白人的殖民地里，一切政治都在围绕着仇恨转动。法国军队是一个压迫工具——它包括7,000法国人，3,000外籍军团，还有数千名黑色非洲的殖民军队，他们当中有头戴土耳其帽的摩洛哥人，身着特种制服的阿尔及利亚人。法国人既在印度支那赚钱又瞧不起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在河内，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白人打

一个土著——一个法国人抽打一个抗议少付了车费的黄包车夫。有时，还有本地的"三K"党一类的种族主义分子挑逗性地伤害当地"土著"。举一个生动的画面为例吧。一群法国人驱使一群黄包车夫到一家土窑子里去，让他们加快速度拼命奔跑，首先到达窑子里的优胜者，这时已累得挥汗如雨，精疲力尽了。法国人再把他带到楼上去，叫他同一个妓女当场造爱。这个车夫再有性欲，也在刚才的苦役下累得精力全无，根本无法在妓女面前让阳具勃起。法国人见到他在他们为挑逗他而付过钱的妓女面前那副无能为力的窘态，都笑得前俯后仰。我很容易由此种情形联系到种族仇恨的政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事隔30年，这种政治竟也使美国的政治陷入危机。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还没有见到一个越南人为了维护白人的统治甘愿去死的。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日本人则纯粹是一群新的征服者；看来他们倒乐于暂时蒙受法国人羞辱，待日后再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在河内，造诣颇深的法国学者，来自法国的法兰西远东学院。西方人至今还持有的关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艺术、文化及传统的大部分学问就是他们研究的成果。法国人为"土著"人带来了美酒、美食、礼仪和漂亮的海边公路——当然还有鸦片。殖民政府进口鸦片，让鸦片馆持牌照营业，用毒品毒害当地的人民，政府的税收由此得以兴旺——同时还模仿纽约港的那尊伟大的自由女神像，也伪善地在河内竖起了一座小塑像。而且做得煞有介事。法国人同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之间除去仇恨不存在任何联系。法国人，当年曾是那

样地作贱、亵渎、奴役越南人民，今天却常常在世界舞台上公开以越南的朋友自诩，而我们美国人竟被指责为杀人放火的强盗。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们为拯救越南文明的那场演习牺牲了5万条美国人的生命，越南人则要超过100万。

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情。当我在1940年经过越南时，只是觉得那里的女人漂亮，男人沉闷，法国殖民者又残暴又愚蠢，我觉得美国人不应当使自己参与其中。在越南问题上，我那时是个孤立主义者，也将永远持这种态度。

我从越南去了泰国，又去了马来西亚。然后，在经过东印度群岛时，看到了日本人在敲诈荷兰殖民地的石油。又从那里到了菲律宾，会见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从历史上看，麦克阿瑟对亚洲历史的影响远远在美国的政治之上。他重建了日本。然而，我总是喜欢把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来进行研究。1940年他就被从美国的权力和影响范围里驱逐了出来，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为某种事业而奋斗的“代表性人物”。在波动的历史价值市场上，麦克阿瑟现在是一个打了折扣的人物。他讲起话来蛮横生硬。老练的学者只要轻而易举地引用他在激动时刻的讲话，就可以把他看成象是一个白痴。那个时候，他也确实是个白痴。但是，拂去这一切微尘，他又是一个十分干练的人，一个好心肠的将军。在战场上他能体恤部下，一个能以较少的流血换取较大胜利的能手，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有纪录的美国将军都比不上他。只是在政治领域里，麦克阿瑟有点呆头呆脑，这是指在美国

的政治里，而不是东方的那种政治。

同他进行这次旅行会见时，我还很年轻，与其说是个记者倒不如说还是个观光者。而那时的他，根据我年轻人的标准来判断，已是一个很老的长者了——年逾六十了！我所以到菲律宾去采访他，仅仅是因为我在对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情况进行考察时，曾对驻守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感到失望，他们被一些呆头呆脑的人所指挥。在马尼拉有一个军事发言人简直是愚不可言，竟敢在“上了年纪的”，一度退过休的陆军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面前表示不敬。他们戏谑地称他是“吕宋岛上的拿破仑”。那位军衔为少校的新闻发言人在1940年告诉我，麦克阿瑟“在这里的作用还不如一个下士呢”。他说，麦克阿瑟只是菲律宾军队的顾问，不值得光顾。我要去看望的这具历史文物，伟大的军人，眼下正担任着菲律宾军队的陆军元帅。

六十岁的麦克阿瑟，正处于指挥这场伟大战争的前夜，在我看来依然神采奕奕，风韵不减。他的双手有点发抖，讲话时，时而发出格吱吱的怪声，但他从来不坐下讲话。他踱步、喊叫、比划、跺脚，在雪茄烟的刺激下，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既有睿智的灵光，也有华而不实的词藻，颇有一些说服力。他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说，当这场战争爆发时，他就在进行指挥这支美国远征军的准备工作。这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一年，他坚持说战争正日益逼近。谈到日本的海军——他认为那是第一流的。要注意日本海军的动向，他接着说，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日本航空部队更加锐不可挡。

狃然，他认为，日本的陆军也不是第二流的，但依靠财力就可以将其击溃。他本人目前就正在为曼纽尔·奎松[①]创建一支新式的菲律宾陆军。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他就要把它投入战斗。象战士们一样，麦克阿瑟对亚洲人确实是尊敬的。总的说来，他就象威廉·麦金利[②]当年喜欢"褐色小兄弟"那样地喜欢亚洲人。由此而引发他大谈起吨位呀、距离呀、里程呀、火力呀之类的事，他的说教中令人难忘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了。

我就亚洲的防务情况为《时代》杂志写好了稿件。为避免引起争论，我从下榻的马尼拉旅馆里的房间上楼，直奔他在楼顶的办公室，让他看一下我对他是否有冒犯之处。我写道，集三个月之观察，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美国的、法国的、荷兰的、英国的——所有的将军中，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的佼佼者当推美国陆军退休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判断，麦克阿瑟完全同意，于是，我很快被召到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我写的那个稿件实在太了不起了！

那是一个傍晚，他穿了一件蓝灰相间的老式西点军校的毛料浴衣，背上印有一个表示军队的"A"字。他一走路，极瘦的小腿肉就显得很突出，他不时地朝着玉米轴做的烟斗喘气。我们个人都认为日本对美国的严重危险，是日本的扩张，对这次相聚，我们都感到欣喜；在共鸣的情绪中，他开

① 曼纽尔·奎松（1878—1944），菲律宾政治家，当时的菲律宾总统。

② 威廉·麦金利（1843—1901），第二十五届美国总统，支持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始缅怀往事。当他于1903年在西点军校毕业怀揣委任状到菲律宾时，是一名年轻的中尉。在阿奎纳尔多①起义中，他同菲律宾的"褐色小兄弟"们交过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指挥美军的一个师参加了战斗，随后实施了对莱茵河流域的占领。他曾在胡佛任内出任过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随后就退休了。但是，他总感到，我们和亚洲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也是一名美国内战时的将军。老麦克阿瑟已经尽完了他的职责，而他的儿子，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要克尽这个职责。这是一场值得回味的谈话，当太阳落进马尼拉海湾里时，他从阳台上转过来对我说："是命运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怀特，是命运呀！啊，上帝，是命运把我抛到现在的这个地方。"

从1935年到1951年，麦克阿瑟一直呆在亚洲，从没有回过祖国。他征服了太平洋上的群岛，占领并重建了日本列岛，指挥了朝鲜战争，直到哈里·杜鲁门把他解职。当然，哈里·杜鲁门把他解职是有其充分理由的。他们之间的那场激烈冲突是美国历史上世纪相传的军民冲突的典型事例，这种冲突我将在史迪威的故事里给予更为详尽的报导：在多大的程度上战争是属于政治的？如果有一部分是，又属于哪一家的政治？麦克阿瑟是谙熟亚洲政治的，不仅表现在他对日本人的馈赠物之中，而且还体现在对其部属的规劝之中（"在亚洲这块土地上，谁要是让美国陆军做坏事都要拿脑袋来见"），

① 阿奎纳尔多（1869—？），菲律宾领袖。文中提到的反对美国的这场起义，发生在1899—1901年间，以后失败被俘，卒年不详。

此话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解。他所不能谙熟的是美国政治，归根结底，是总统的政治。他信奉的是，军事和政治是美国历史上的合作伙伴，在伟大的战争冒险中应平分秋色。

在那以后的六年里，我和麦克阿瑟会见过许多次，但直到两年后我才发现他在政治上是个有缺陷的人物。当然，那时候，我们已处在对日本的战争中了。他刚从科里基多①逃出来，又成为一名美国将军，而不是菲律宾陆军元帅了，被授权统率美国在西南太平洋上的全部武装力量——但是却见不到来自美国本土的军队、舰只和物资的支持。他对此颇感愤慨。我作为一名记者对他的采访，是在他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司令部里进行的。我们一交谈，他就急于把他的话全盘托出。在平等相待，自由随便的气氛中，谈到了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谈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谈到了我的杂志发行人，亨利·卢斯，还谈到了美国的海军。他认为，美国海军可怜得很（“怀特，”他说，“世界上最优秀的海军莫过于日本海军了。那是第一流的海军。其次是不列颠海军。美国海军是第四流的海军，甚至还赶不上意大利海军”）。在1942年的春天，他还这样讲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海军即将被证明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海军，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乔治·马歇尔也是比他伟大得多的人物。

然而，直到1940年12月，我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钦佩、爱慕之心仍不减如初。我同他在政治上分手是很久以后的事

---

① 科里基多，位于马尼拉湾的要塞，1942年5月被日本人攻陷。

情。麦克阿瑟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提供过帮助。麦克阿瑟是个可塑性极强的人物，《时代》杂志的资料室里充满了我写的关于他的栩栩如生的材料，这都是该杂志所喜欢的，这也算是麦克阿瑟对我的帮助吧。当我在马尼拉的时候，《时代》杂志决定聘我为拿全薪的职业记者，不止如此，还给我电汇了1,000美元的奖金和东南亚之行的全部开销。在返回中国的途中经停香港时，还发来了一张请柬，只要我愿意，可随时加入在纽约的职业记者的行列。但给我的指令却是回到重庆去，至少要呆到1941年春天过去，待远方的《时代》杂志老板，亨利·卢斯访问他的出生地——中国的时候，作为《时代》杂志的记者在他的前后左右侍候。

我在1941年1月回到重庆的第一周里，还弄不清楚中国的时局。我想任何人都会有这种情况的。自从我搜集名人轶事以来，我认为只有一则被称作新四军事变的故事会使《时代》杂志感兴趣。我有一大堆资料——政府的文件，机密的指令，未发表的笔记和采访记录——在证明我的勤奋程度超过了我所理解的范围。意味深长的是，《时代》杂志对这个新四军事变并不感兴趣。如果我能够把这一则故事同历史的长河贯通，我也许能赢得编辑们的注意。但是我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还不熟悉怎样去做这种贯通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追踪观察了这宗屠杀新四军的事变，象我在一生中做任何事那样的勤奋，但除了公开发表的一两个电报外，别无所获。现在看来，这场大屠杀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悲剧中应该占有位置，因为它是四、五个可以进行选择的伟大转折点之

一。可悟选择的是流血而不是和解。在这里，让我把我对这一事件的偶然发现作一简单介绍。

事变发生在地图上的一点——一个位于扬子江南岸，名叫茂林的村镇里。1941年的1月13日至14日，将近1万名中国共产党人的部队遭到了国民党的扫荡。地图上的确切位置是无关紧要的，对于那种异乎寻常的大规模的行动来说，从北方的满洲到亚热带的华南，究竟是在地图的哪一点上触上了暗礁，实在无关紧要。在这块版图上，自从1927年以来，日本人、中国的共产党人以及中国的国民党人，这三种势力一直在进行角逐。

从1931年的满洲开始，十年来，日本人一直从北方向位于万里长城南侧的那个四分五裂、争吵不休的中国施加压力。到1937年，日本人向中国正式发动了战争，中国所有的党派——共产党、军阀及地方势力，都支持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加入了反抗侵略者的队伍。尽管有这样的团结，到1938年底，日本人还是夺取了中国的三大河流域地区，占领了所有的沿海城市，控制了百分之九十的铁路线。如我在山西所见到的那样，把所有的中国军队都赶进了山川丘岭地区。

但是，随着日本人的胜利，这幅版图上却缀满了日见扩大的补丁碎块，凡是上面标有“占据”二字的地方，共产党人就跟着进去了。只要日本的皇军一进驻农村，共产党就觉得必须组织反抗。战争初期，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还把共产党当作地方或军阀武装中的一个派系来对待。在凡是有忠于国民党的将领指挥的战区中共同对敌的共产党部队还能或多或少

地得到一点中央政府的补给。但共产党是信奉进攻理论的——他们的游击力量在日本防线背后的沦陷区里，以激烈、迅速、令人难以设想的规模发展，所采取的战术大放异彩，突破了所有常规战争的条条框框。他们首先往东发展，从延安出发，经山西省渡过黄河，与阎锡山的地方武装汇合在一起。但在1940年夏天，阎锡山置反对日本人的共同战争于不顾，竟调转头来打共产党。共产党又朝北边的沙漠地带发展，汇合了一批穆斯林将军。他们向东部的发展越来越远，不断争取或吸收中国其他的抵抗力量，到1940年夏天，竟敢在日本人鼻子底下的北京，同日本人在山村里分庭抗礼了。他们往东还发展到太平洋沿岸的山东省，那里是孔夫子的故乡。他们从那里又往南发展。

当他们向南发展时，对于只有初级通讯条件和原始后勤保证的庞大军队来说，一个单一的部队番号已不适用。于是，他们便组建出一支新的部队——新四军，作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中央政府的含糊承认，这是一种伴随日本军队的占领而出现的共生现象。这支新建的部队由山东向南挺进，挺进、挺进，一直挺进到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省境内，挺进到安徽省境内，挺进到扬子江流域，一直挺进到浙江境内，那是蒋介石的家乡，距离他们的大本营所在地延安已超过1,000英里了。

这辉煌的武功——令日本人为之咋舌，让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深惶恐不安。

共产党人在挺进中宣传他们是爱国的军队，向国民政府

申请武器、子弹、军饷、粮秣等补给品。但新四军发展迅猛，总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根本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授权批准。是的，共产党确实是抗日的——但采取的是一条新的办法。虽然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他们也照样可以从农民那里获得大米、衣服、帮助和医疗服务。共产党人需要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民用基地——简而言之，也就是政府。他们需要枪支，而只能象往常所做的那样在战斗中夺取——从日本人手里或日本人雇佣的汉奸手里夺取。在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也从那个大联盟中的军阀部队手里夺取。偶尔也从中央的政府军手里夺取。

这样在发展过程中，共产党的部队就一次又一次地同别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有时怒目相对，有时相互狙击，也有流血的小规模战斗。沦陷区的社会解体了，纪律松弛的部队这个月还是属于某个军阀的，下个月就可能沦为无法无天的土匪。日本人的残忍，中国各种抵抗力量的艰苦，使得这场战争同一切文明习俗失去了共同之处。同其它地方或军阀部队形成对照的是，只有共产党人有信仰，有理想，有政治技巧，能使人民为一种事业结成团体。他们也象别人那样采取暴力，但这种手段要配合一种目的和策略去实施。

到1940年10月，国民党军队、军阀和共产党之间的磨擦已经成为家常便饭。重庆政府便命令整个新四军立即退回到扬子江以北，期限一个月。到11月，事态恶化，国民党第五十三军的长官李寿伟，在同江苏的新四军发生的一次不为人注意的冲突中被杀。为了共同对日，战争的逻辑要求有远

现的中国人，即中国的国共两党摒弃仇恨，在重庆坐下来，为撤离战争地区制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表。在纸面上，他们都同意已获得承认的共产党活动区域应当扩大，从黄河到沿海的华北，整个被日本人占领的广大地区都应当成为共产党活动的舞台，是他们可以发号施令的地方。但严酷的现实是，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共产党必须把新四军从扬子江南，即从安徽、湖北、浙江、江苏等省份中撤出。在1941年1月1日之前撤到江北，然后还要北撤到遥远的黄河以北。

这就面临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日本人在共产党北撤的路线上撒下了军队。在日本人没设防的地方，图谋报复的国民党政府军和将领又配置了部队。就战区撤退时间表及撤退路线所进行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40年12月，现场的共产党部队才勉强同意两方的高级代表所达成的协议。共产党部队要北撤，就意味着数以千计的新兵，他们都是当地农民的子弟，必须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分别，使家乡在日本人的攻击、进攻面前无能为力，或者依赖于对共产党没有好感的中央军来保护。重庆的共产党办事处是坚持这个协定的，但他们的信息往往由简易电台、信使和竹筒信号进行传递，缺乏干脆利落的指挥。这时在现场，中央政府军正压迫撤退中的共产党部队，迫切要进入他们共产党正在离开的地方——实际上是急于为在11月遇害的李寿伟报仇。

在重庆，谈判在蒋介石和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周恩来之间进行。他们都是易动感情，又都是脾气很大的人。在那之前的漫长年月里——大概有15年吧，他们俩人既是朋友，又是

敌人。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都觉得他们应达成某个协定以避免正日益逼近的毫无价值的流血冲突。在1940年的圣诞节，作为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的蒋介石邀请周恩来，一个共产党人与他共同进餐。他们就新四军北撤的条款和细节问题最终达成了协议。根据周恩来自己所讲（我听到的关于这个事件的唯一叙述），他们还就国共两党之间广泛范围内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周描绘了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怨气。蒋介石拿他们当一支军阀部队看待，而不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周说，政治承认象战争中的后勤保障工作那样必不可少。他当面告诉蒋介石，他的国民党政府是不民主的。接着，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抿嘴轻笑，回忆着那一则故事。他说："你知道他怎样回答的吗？蒋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民主？'"他们俩人都不懂得民主为何物，但是都相信，检验他们思想的是谁有力量和能力去运动人民接受他们的利用。在当时情况下，蒋介石还是有力量的。

我回到重庆的那一周，正是中国人在800英里外的长江下游被运动来进行相互残杀的时候。我觉察到这是件麻烦事，我一接触就更加觉察到了。但又象是坠入山西那三百里中条山云山雾海里，只能偶尔在云端瞥见一星半点的微弱光线。我似乎可以捕捉到这场屠杀的回声，虽然只有一点被捂住的回声。重庆所控制的新闻界里见不到关于此事的一个字。我只好向那些不仅骗我也互相欺骗的人们打听。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才了解了这件已经发生的事变的大致轮廓。作为新闻报导已失去价值，除掉留给历史，我再没有什么好讲的

了。

现在，尽我所能，予以重新复原的情节是：大部分新四军在那年12月底以前渡江北上。到来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江南的留守部队只剩下一个军部——这里有他们的指挥人员，他们的医院及他们的政治学校。那时这种学校对于培养共产党部队的重要性就象甲状腺对于人体必不可少一样。当地的国民党司令部（属于第三战区）给这支心怀不满的共产党部队规定了撤退的路线。在他们准备渡江北上的那条路上，日本人的河防部队正荷枪实弹地严阵以待，欲置他们于死地。新四军军长，共产党员叶挺在1月的第二周才决定拒绝接受这条指定的北上路线。他要带领他的指挥部——总共1万来人，多是军官和干部——沿江东下寻找一个他认为日本人设防较弱的地点渡江。他知道这样做同他远在重庆的上司所达成的协定相违背，但如果接受当地的国民党指定的路线则无异于自投罗网。当他们这样行动时，国民党将领指挥部队包围了他们，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战斗。日本人在一旁坐山观虎斗，看到共产党遭到屠杀，可以想见他们是多么开心。叶挺军长被俘入狱，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无一幸免于难，5,000至6,000的普通士兵战死或遭到屠杀，幸存下来的或遭到遣散，或被改编到政府的其它抗日爱国力量中去。

我们在重庆的人对1941年1月14日的那场屠杀全然不知。数天后，才从私下谈话中和地下传单里得知此事。

毛泽东从遥远的延安给重庆的办事处发来了电报，发表了共产党的一份抗议声明。率直的文风看来是出自他自已的

手笔：

“……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毛泽东声明后的一周，亦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周，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私下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了讲话。这个军委会是他的联合政府的前台装饰，其中包括难驾驭的中央政府的将领，地方部队的司令官和参加对日共同作战的老迈的军阀。这场屠杀可能使这些老军阀感到震惊，说不定蒋介石有一天也会这样对待他们的。但蒋还是尽力稳定他们的情绪，以家长式的口吻对他们训话，又冰冷又直率的语调实在令我费解：“该事件并不含糊，问题也并不复杂，事变也并非突然。不服从命令，违抗命令的军人受到惩办理所应当。暴乱者，袭击同志者……部队就要遣散……。”蒋回顾了那些不服从他命令的将军们的下场，接着又发表了一通对战时的中国军阀颇有启迪性的训谕：“韩复渠、李富英，石友三……不服从命令……。第一个被处决了，他不服从政府命令，不坚守鲁东阵地向西逃窜……。李富英也被枪毙了，不让他撤退就是不听，一意孤行。还有石友三……”等等。

最后，蒋介石说："我决心向全国显示铁的纪律不可动摇……。我常把军队比作一个家庭，我对待我手下的军人犹如父亲对待他的孩子。如果他的孩子们听话，作父亲的就感到孩子们给他脸上增了光，如果孩子们捣蛋，就使他丢人……。现在我不再为调动他们（新四军）伤脑筋了；他们把这理解为软弱甚至胆怯……。现在新四军的番号已被取消，问题也就解决了，也不存在其它问题了……。"

几个月来，还有其它一些我追询的问题让我不解。这场屠杀的规模要比我在山西所报导的那场战争大得多。中国人为什么要相互残杀呢?我在运往前线的大米袋子上颠簸前进时，在同年轻的国民党军官在太阳下打瞌睡时，或在将军们的司令部里喝茶时，我都要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都迷惑不解。我觉得报复的意识，即急于为被害的五十三军军长李寿伟将军报仇的意识，同这个事变有关。对他们来说，报仇是痛快的。我想通过重庆的军事部门把有关资料及起因汇总在一起，但是将军们对这个事变开始的日期说得都不一样，没有一个人确实知道这起事变是怎样发生的。在1941年6月，我最终得以在一次拘谨的招待会上，见到了那位最高统帅①。自1937年以来，他对抗战的观点一直在变化，现在他用一句真话对这事件作了概括："日本人实为微恙，共产党确系心腹之患。"

我觉得，要把这一事变弄得水落石出，还得通过周恩来。

① 即蒋介石。

那时我们已成为朋友了。2月1日，也就是事变后的两星期，当他的火气开始冷却时，他以精辟的见解，同我交谈了好几个小时。周恩来具有惊人的意志，既善于叙述又长于综合，对记忆中的日期、言论、传闻、事件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他回顾了中国抗日联合阵线的破裂，从1937年到1940年期间，均有涉及。然后，他以令人叫绝的技巧，把话题转移到1941年1月初那惨绝人寰的十天，时时刻刻日日夜夜都了如指掌。他一边踱步，一边解释着中国政府的性质、中国的军队、电话通讯系统、蒋介石必须平衡才能操纵的各种力量。在对蒋介石作冷静估量时，他竭力使他对那场屠杀的怒气冷却到最低限度。他说他确信蒋介石没有参与指挥或特地命令这场屠杀——但蒋必然会让前线的将领们相信，如果他们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来清洗共产党，他是不会介意的。圣诞节时蒋曾亲自在重庆向周恩来保证，新四军的路线是安全的。直到他们动起手来，蒋还不知道这场事变。其时周恩来自己正在重庆的办事处里收听来自延安的共产党电报（延安同屠杀现场的联系是通过临时电台进行的）。周向这个最高统帅报告了正发生的事变。蒋回答说不可能有这种事，是不会发生这类事情的。但实际上却发生了。

"是蒋介石在向你撒谎吗"？我问道。"不，"周恩来说，"是有人向这个最高统帅撒谎。这个最高统帅也在一定的范围内撒谎。这个最高统帅撒谎是他想加强他在各个派系中的地位，他的胜利便是在利用全国的各种矛盾中实现的。全国的矛盾越大，他的权力也就越盛。但如果这种局面继续

下去，他将是一个失败者。”

谈到前途，周恩来又一次变得冷静，甚至有点冷酷了。所有同中央政府的协议在他看来都面临着结束。现存的9万名新四军不再北撤，他们将滞留在南京、上海周围的沿海地带。他们将自己同日本人战斗下去。“没有政府供给，生存下去是有些困难，”周恩来说，“但我们一定会生存下去的。我们将寻求人民的支持。”在他继续讲话时，我则开始全神贯注于他的思想，也就是共产党思想的出发点：在当时1941年的中国，有两个独立的政府在对日本作战——一个是蒋介石的联合政府，另一个是共产党的政府。战后，他们要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齿轮在转动，事物将朝向它们特定的顶点发展。

在这之前，我日夜渴望能有幸结识周恩来。我以往所报导过的著名人物是用我填充在职业像册里人物素材拼凑复原而成的。但周恩来可不是这种人物。他是我心目中的完人。

现在，我日见衰老和明智，也就愈为我所报导过的人物的友谊和偏爱所困扰，对伟大人物的友谊就象洗心革面的酒鬼对酒精那样地谨防不怠。但是，周恩来，还有约瑟夫·史迪威和约翰·肯尼迪，却是我会见和结识的三大伟人。他们一出场我就几乎全部丧失了自信和判断。在这三个人面前，我有举止不知所措之感，这种情形发生得最多的则是在周恩来的身边。现在，我只能这样评价周恩来这个人物：有着本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任何一个共产党人的精明和残忍。他具有绝对大胆的表演才华，有猫扑耗子的灵巧

缜密，有将他的出路押在唯一行动路线的那种果断——然而他又充满了温情善意，遏制不住的仁慈和纤细周到的礼节。中国革命者在对于温柔亲昵言词的羞于启口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就连北京的老农民也喜欢称周恩来，而且仅限于周恩来一人，是“我们亲爱的领袖”。他有使人民欣喜若狂的本领，有表现仁爱之心的办法，有吸引你与他交心的招术。现在我不能否认，他的仁爱之心那时完全征服了我。

为了解这个人物的闪光人格和魅力，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描绘一下在我们的友谊和欢笑中，我们那种日趋成熟的关系。在我的记忆里，1940年，我们的友谊以那次烤猪宴会为标志达到了高潮。

对周恩来的研究，早在我成为《时代》杂志记者之前就开始了。其时我还隶属于中国新闻部，想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那时我总是提一些具有挑衅性，须迅速引证作答的问题，就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电视辩论会一样。我曾经问周恩来：“阁下，你是个中国共产党人。那么，在你身上，是中国人的气质多于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的气质多于中国人呢？”周答：“中国人的气质多于共产党的。”我问：“阁下，俄国的共产主义已经取消了宗教，如果你们中国共产党人上台执政，宗教是否也将被取消呢？”周答：“中国共产党尊重一切宗教；一切形式的崇拜都将允许存在。”

周恩来具有一般社会活动家所没有的那种处理此类古怪诘问的诀窍——在他的回答中伏下一个诱饵，即在答案里留

一个具有新论据的尾巴。如果提问题的人对此穷追不舍，周恩来会在谈话中一步一步地把对方的话题引导到他所希望的方向上去，再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

周恩来被我所搜集的有关中国军阀政治的传闻轶事逗得乐不可支；有时候，也为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和对他这个修行家的传闻乐上一阵子。那时的周恩来时间宽裕，他那个只有六、七个工作人员的中国共产党的办事处，在重庆是个孤单的小组，而一个具有可塑性而又年轻的美国记者的来访则给予他们一个机会，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那样，向《时代》杂志施加影响的机会。

基于一年来培植的友谊，周恩来邀请我参加专为我举行的宴会了。可以想象，他的工作人员，为争取美国舆论的支持是有一个计划的；还有，他们可以以邀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为名，吃上一顿比平时丰盛得多的饭菜。他们自己平时的菜单上往往就是些面条啦，米饭呀，蔬菜呀，偶尔才有肥厚的炖肉。我们一起来到重庆一家最好的餐馆—冠顺园就餐。吃饭的有周恩来、中共办事处全体人员。而我则是唯一的西方人。

读者还一定记得我离开家乡有多久了吧。我学会了饮酒。我和一个女人经历了第一次已经被抛在脑后的床上性生活。我知道几个月来一直在吃着非犹太食品，总是自欺欺人地吃着羊肉、牛排或鸡。生活习俗是我同家庭的最后维系。我一直恪守犹太人的传统，吃猪肉就是明显地亵渎神灵。周恩来的宴会却打破惯例——第一道菜是中国小吃，冷热都有，第

二道菜是竹笋鸡丝，第三道菜是炒鸭肝。下一道是压台菜——一头清晰无误的幼猪，棕黄色的皮肤，刚出烤箱，烤裂的皮肤还在滋滋渗油呢。“请，请。”周恩来说着。东道主用筷子在猪身上做了一个手势，让我这个客人先从破裂处下筷子吃第一口。我一下子愣住了，一时不知所措，那一霎间使我想起我的过去。我放下筷子，用我的中文尽量说清楚我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任何形式的猪肉都不许入口的。我这一解释不要紧，在场的所有朋友都低下了头，沉默不语，因为我是客人，是他们办错了事。

这时周恩来挪过来了，他又一次举起筷子。一边重复地说着“请，请”，一边用筷子指着小猪，嘻嘻一笑，“特迪，”① 他说（这是根据我现在的回忆，那天晚上没做笔记）；“这是在中国。你再瞧瞧。你看，这看上去象一头猪，但在中国，这不叫猪——这叫烤鸭。”我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我再也抑制不住了。他也笑了，全桌的人都笑了。我于是把筷子插进了小猪，吃下了平生第一口有据可证的猪肉。从那以来，我就破除了不吃猪肉的戒律，同时还希望我的祖先能饶恕我。

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使人相信猪是烤鸭的本领，人人都愿意相信他，因为他懂得别人的习俗和社会环境并给予尊重。

那时的周恩来才四十三岁，尽管在重庆孤军作战，但不

① 特迪系作者的名字西奥多之昵称。

管他认识到与否，他正处在他事业的中途。他只是毛泽东瞭望塔上的侦察兵，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持同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份工作使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并兼国务院总理，负责同全世界的联络工作。但在重庆时期，他的工作是缓冲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同蒋介石政府的紧张关系，尽可能用甜言蜜语向中央政府争得援助来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战争。

他的这一使命是在那个古老而又破旧不堪的大院子里进行的。这个院子被称为曾家岩五十号。这是个破破烂烂的地方。一下雨，泥水齐踝，来访者可以把满是泥水的足迹一直邋遢到接待室里。接待室里只有几把扶椅，一把沙发。沙发上的弹簧断了，包的是农民生产的那种蓝色粗布，坐上去显得又笨重又不舒服。在那以后的五年里，我就是在这间接待室里会见了各种类型的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名，其余的人即将变得有名起来。我在这里会见过董必武，一个红眼睑的老者，是传说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名创始人之一，他在1921年的7月同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了中共的第一次会议。再没有人看来比董必武更温和、虚弱和善良的了。我在这里会见过叶剑英，一个豁达乐观，好笑好闹的人，他已经因为1927年领导了广州暴动而成为一名英雄。他以后担任过红军的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我还在这里会见过林彪。他是个表情严肃的人，红军的战略家，在1946至1949年的内战中打垮了蒋介石。他是毛泽东挑选的继承人，直到1971年因为过早地抢夺那顶乌纱帽而被清洗掉。共产党看来不想把在重庆同政府

联络的职务只托付给一个人，总是有两个人在负责，而其中阅历最深的人物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的个人随员，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后来也都出了名。他最得意的一个人，也是我喜欢的，是一个我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中国女人，名叫龚澎。她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里接受的教育，父亲是个吸食鸦片的军阀。她的一口英语不仅无懈可击，而且富于表情。在被分派到重庆以前，曾在华北抗日游击队里作战，是个真正挎枪的巾帼英雄。她的第一个丈夫在华北山区的游击队里死掉了。来到重庆，她结识並爱上了乔冠华，一个革命的激进记者，后来担任过中国的外交部长。我作为一名关于共产党事务的"上弦工"，曾短期雇用过周恩来身边的另一个叫陈家康的年轻人。革命胜利后，他出任了驻开罗大使，率领北京在中东地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帮助第三世界结盟反对以色列人。还有好几位人物，就象后来属于肯尼迪的那些人一样属于周恩来，几乎是一个政治家庭——这个家庭后来掌管着，直到现在还在微妙地垄断着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周恩来具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罕有的各种证明书。当然，象其他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样，他是以一个真正的战士身分开始其生涯的。他曾是1927年上海起义的领导者，几经艰辛才幸免于难；在以后的1928至1934年期间的内战中，担任过野战指挥官，在战斗中负了伤。不久参加了万里长征。在1934年和1935年的两年中，历经了各种小磨难——他骑在马上，病得几乎死去。那场长征临近结束时，共产党人才在

西北的山区找到栖身之地。他身体力行的勇敢，他的指挥才能，他的创伤，这一切都是无可疑问的。我认识他时，他却不让我看他的伤口，到后来他步入老年后，他受过伤的左臂再不能曲伸自如了，乃至僵硬，一直到他逝世。其他共产党的勇士们往往要为这类英雄之举和身体的损害大吹其牛。

他和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学历上，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物；在气质上，他是富于变化的大师。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官僚家庭，不仅在天津的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读过书，还横渡日本、远涉欧洲留过学；他就是在欧洲加入共产党的。后来回国参加了革命，在二十七岁时，他已是举世皆知的共产党要人了。他成为蒋介石的朋友，担任了国民革命中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这两个人在30年代的内战中分道扬镳——但就是周恩来，以超人的灵活不去算蒋介石进行屠杀的旧账，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劝说劫持蒋介石的军阀释放了他。周恩来可以进行残酷的战斗——但一旦时机来临，他又可以放弃前嫌，这使得他在共产党人中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例如，在1945年，他曾通过朋友恳求美国大使馆允许他飞往美国去拜访富兰克林·罗斯福，向他解释中国革命；但遭到拒绝。还是在1945年，他曾努力争取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又一次遭到美国人的拒绝①。他曾帮助设计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这个会议一度中止了越南战争。但在日内瓦，当他把他的友谊之手伸

① 原文如此。事实上董必武同志作为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大会。

同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时，杜勒斯竟当众使他蒙受羞辱，拒绝去握这主动伸来的手。这也许是代价最高昂的一次外交失礼，任何一国的任何外交官都不曾有过。那以后的许多年里，周恩来竭尽全力地对抗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在最终，他同那个主张中国同苏俄结成永固联盟的长征路上的同志林彪实行了决裂。正是周恩来活跃了毛泽东的思路，再一次接受了他和尼克松共同建造的通往美国的桥梁。如果这座桥梁能承受得起和平时期的检验，那将是周恩来对中美两国人民的最大贡献。

在我和他初识时他远不象后来那样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我们早期的交往中，一见面，他便向我讲一口滔滔不绝的英语。之后，他变得随便多了，一改过去他通常所给人的那种衣冠楚楚的形象，漫步出来迎接我。在以后的约会里，他常常穿着绉巴巴的粗布衣服，胡子也没有刮。他有着一副几乎是地中海型的黑色脸庞和皮肤，一旦他心舒气畅时脸就英气勃发，对曾经同他交谈过的上千个人物的表情都能够一一地摹仿出来。因为我的中文水平在不断提高，他就开始和我用中文交谈，偶尔有龚澎在场担任翻译。对于我正在研究的中国政治中那种比较微妙的关节则由她进行翻译。

周恩来具有小说家处理人物性格的技巧，往往还扮演了超级剧作家的角色。他喜欢讲故事。他在重庆这个前哨阵地上除了发挥瞭望哨的作用外，根本没有别的任何事可作，而他又有对他的见闻进行高谈阔论的本能需要。一个年轻的记者同这样一位伟人邂逅实在是万幸。如果触发了他的激情，或

者他被困扰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他就会编织出一个个充斥疑问和答案的故事，几乎象阿拉伯式的天方夜谭，让你于漫不经心之中能够非常接受他的话。例如：在新四军事变过去几年后，我企图知道处于中国遥远边陲的土耳其斯坦①发生了什么样的宫廷谋杀案。当地军阀盛世才杀害了毛泽东的胞弟（盛世才说，这是对共产党杀害他胞弟的报复）。这个远方的土耳其斯坦的阴谋网里让我不能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是费两个月的时间到达了那块以产西瓜、鲜花和歌舞而闻名的亚洲内陆沙漠绿洲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便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找周恩来攀谈。他对政治问题的兴趣甚浓，就我现在的记忆，他最后的分析（打着手势）似乎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告诉你是我们（共产党）先杀了他（盛世才）的弟弟呢？我们喜欢他的弟弟超过了喜欢他。我们谁都能杀。如果要杀的话，我们要先杀他，而不是他的弟弟。他们懂得这一点，就污蔑我们，说是我们杀害了他的弟弟。"

共产党的情报网渗透到蒋介石的所有政府部门，周恩来不时和我讲一些他听到的特别逗人的蠢事。例如：蒋介石于1943年设计了全国动员法，周恩来特别喜欢讲这个故事：国家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打算在制定这个新的动员法中"精诚"合作，以解决各自的困难。通货膨胀势不可止，军队缺少兵员。他们都同意，周恩来说，征兵法必须适用于各个阶级，不论高层、下层、中层都不例外。每个青年

① 即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都必须去打仗——除非能交得起5,500中国法币(那时只折合250美元)才能豁免一年的兵役。因为全国的适龄青年不少于4,000万人,这两个内阁部长合计了一下,如果至少有3,000万人购买豁免,这样,一年就可以给这位财政部长数以十亿计的钞票,财政预算就好做了,那位军政部长还剩有1,000万人的兵员可供征募,周恩来表演着这场对话中的各个角色,然后大笑起来:"这是愚蠢的,再愚蠢也没有了——不只是愚蠢,他们都当了十年的阁员了,还是那样的缺乏见识。"

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谈话。我始终搞不懂他是在规劝我这个美国记者,並通过我和《时代》杂志,宣传蒋介石的政府是一帮无用之辈,共产党才是未来的潮流呢,还只是简单地对我施加一点影响而已。我从他那里学习了好多东西,最终,他成为了我的实际导师。有一天,他正在解释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疑点,是关于中国的秘密政治的,没等他把话讲完,我就插话说出了答案。这样做,显然是粗鲁的。他却笑了起来,说:现在,我在中国可不再是个毛头小伙子了,已经达到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水平了,迈进了了解中国的门槛。他的这一番褒奖,使我受宠若惊。我不晓得周恩来向外国人讲了多少遍类似这样的话,但我现在得知,他最后一次这样的恭维是给基辛格国务卿的。周告诉他,他也终于进入了理解中国之门。

时至今日,我仍然保留着对周恩来的难以抑制的偏爱之情。尽管我懂得,他可以象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那样为了他的事业而牺牲我,在规劝我接受他们的想法失败时,为了

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更大的荣誉立即对我改变态度。我们的个人私交结束于1943年。那一年他回到延安的共产党大本营，那是他苦心经营的权力所在地。

当然，我又在1944年和1945年两次见到过他。但那些都是在严肃的场合，除去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全被我忘却了。我能记得的同周恩来的最后两次见面，都是在1972年，漫长的岁月逝去后，理查德·尼克松对中国访问的时候。

在那次访问中，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在经过精心装饰，布满美味佳肴的宴会上，乐团奏出了诸如《牧场之家》一类的美国流行音乐来欢迎美国总统。主宾席上坐着周恩来和尼克松，四周是较小一点的座席，坐的是其他贵宾。其它的一排排座席按其重要性由近而远地排列着，距周恩来——尼克松的主宾席越来越远。应尼克松邀请来访的记者被安排在最后一排，也就是这个号称万人大会堂的后尾。当尼克松总统站起来，朝最近一圈座席上的达官显要们轮番敬酒时，我想我可以乘机潜入那个由美国和中国安全人员组成的包围圈，到主宾席上去，周恩来正在尼克松总统夫人的一侧端坐，尼克松总统的座位暂时是空的。

我正迂回在座席之间，突然被我们的美国特工人员还有中国的公安人员给挡住了。但我的决心既然已下定，就不愿意接受这种拒绝而喊叫起来。在这当儿，周恩来和坐在他一侧的尼克松总统夫人都同时看到了我的窘态。也许是他们俩人都为谈话厌烦了吧。因为我並不认为周恩来和尼克松总统夫人会有多少共同话题可谈。他们都同时朝各自的安全人员打

招呼让我过去，而且在我通行的时候朝对方解释为什么这样慷慨。周恩来那时的英语已经衰退了，只能连声说我是“老朋友，老朋友”，还用手指着我。而她呢，还以为我进来是要同她说话呢，也说着同样的话。使我吃惊的是，在事隔25年之后，周恩来还能一眼认出我来。我马上想到可发挥我的翻译作用，把总统夫人的话传译给周恩来，再把周恩来的话传译给总统夫人。我尴尬地在总统的座位上留恋了有二、三分钟的工夫，当尼克松返回，我便避开了。这场同周恩来和尼克松夫人的谈话没什么值得回味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是七天后，周陪同尼克松飞到了杭州。这里是中国的风景区之一，就象美国昔日的旧金山和今日法国的卡尔卡松一样。那是个令人可怕的下午。为了某种象征和方便工作，所有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摄影记者都被有组织地分配在用绳线圈起，树有标桩的方格内，每个记者的观察“领地”也就是二平方英尺。我的位置被安排在通往西湖中心的一座月牙形拱桥的一端，左边是CBS①右边是NBC②电视台记者。尼克松和周恩来在桥上漫步，故意显得漫不经心，随随便便，好象是一对老朋友在农村偶然相遇随便聊天一样。是尼克松首先发现了我，把我向周恩来作了一番介绍，我当时没听到他都说了些什么。但是周恩来却想在此试试他的英语。他说：“噢，那是特迪·怀特。解放以来他再没有来过中国了。”我对这次完全是别人操纵的旅行本来

①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②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就有一肚子气，为了同周恩来取得联系，向他得到重访中国的签证，我整整努力了20年，全都付之东流！所以我这样回敬了他："我没有能再来中国可不是我的过错呀。"对于这句话，周恩来是听懂了，但他已不能再娴熟地驾驭英语，就用中文回敬了我一句俏皮话。我那时的中文也已经衰退了，只好请教那位翻译。那位译员说，刚才周恩来讲的是"也许我们双方都有过错"。

我常想这位译员对周恩来迅速尖锐的反驳，是转译得贴切中肯的，确实体现了我所了解的周恩来的风格。他对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努力既觉得津津有味，又表示感激不止。在过去的日子里，私下里他是愿意认错的，但他公开的、叫得很响的理论却是：我们西方人不懂得中国，所以也不要干涉她的内政。他也许接受了吉卜林①思想的释义："东就是东，西就是西，这两个方向永不会相遇。"但我则更喜欢他讲话的方式："也许我们双方都有过错。"

1972年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周恩来了。但是他仍然和30多年前的他一模一样。他对我多方面的教育——超越了时间、影响、友谊和辛酸——使得1941年的1月，不仅作为一个产生历史性悲剧的时刻，更作为我一生中的转折点，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有一个恰好和周恩来同龄的人物，而且也象周恩来那样深情地相信，中国革命既不可能取消也不可能阻挡，并且坚

① 鲁得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和诗人。

信中国政府由于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而正在解体。但这个人又深情地相信，美国政府的职责不仅要保护它自己的人民，而且要伸出手来去保护整个文明世界。那以后的五年里，我一直同这个人手拉着手行走在这样一个信念里，即美国努力的伸展是无限的，我们正处在美国的世纪里——这个人就是我的最高上司，《时代》、《生活》和《幸运》系列杂志的创始人和编辑，出生在山东曲阜而当时在纽约的亨利·卢斯。在那以前，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但我最初的前程却是他铺平的。

当亨利·卢斯于1941年5月抵达重庆时，才刚满四十三岁，但一眼即可看出，他是个真正的报业大亨，他对此也是清楚的。而且不仅如此，在中国政府的眼里，他是一处取之不竭的天然资源——就象政府希望在战后建立水电站所利用的三峡江水那样。卢斯是中国在美国唯一的一个最有势力的朋友，是大声呼吁、有力劝说美国介入战争的一个人。卢斯一直认为并劝告美国相信，英国和中国的命运也就是美国的命运。法西斯主义威胁到我们的文明也威胁到他们的文明。他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那便是利用他的杂志不遗余力地去传播他这种良心信条。

在中国，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来访者能象卢斯和他的夫人那样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享有盛名的记者也好，外交官也好，亚洲的政要名流也好，甚至就连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殊荣。乘轿车从机场飞奔而来，下榻在孔祥熙的公馆，接着便是数不清的宴请。卢斯意识到他

的重要性，对这一切都欣然领受。他莅临重庆的第二天就欣逢轰炸——他还对此津津乐道呢。他还想多看一点，并请求那个最高统帅允许他到战争前线。他几乎立刻得到照允：为他安排一架专机到西安，又安排一列没有别人乘坐、摆满了餐具的火车载他到两年前我费了五天时间才走到的那个黄河拐弯处。他象一发中国人的炮弹被投掷到日本人占据的黄河对岸。

但他并不是中国政府的俘虏。他的好奇心促使他对一个又一个的事物狼吞虎咽，总想看得多一点。和卢斯的谈话，象有些人回忆的那样，简直象在和一个吸尘器对讲：他可以在第一次的交谈中就把别人所知道的东西榨取得一干二净，只给他们留下空洞的躯壳。第二天一早他提的问题更多，一到晚上，提出的问题便以堆计算，不可胜数了。

卢斯对于他的重返中国之行是满意的。只有现在我才能替他体会到这一点：一个离开中国到寒冷的新英格兰寄宿学校读书的传教士的儿子，还乡时是美国最有势力的舆论制造者和发行人，还有名门出身的妻子作伴，并受到了他父亲曾希望在中国出现的那种“基督政府”的礼遇。

有一天早晨，他让我陪同，并命令我赶走了那些令人窒息的政府官员。当我们一起坐上黄包车溜走时才知道，他想借机实习一下他的中文。他的孩提时期在山东度过，在一处教会大院里长大成人，离开以后就再没讲过中文了。但如今他的舌头发痒了，不时地命令着车夫到这儿到那儿，兴致勃勃地在商店里进进出出，察看商品和物价，以极大的兴趣用

中文同人家讨价还价。还有一个晚上，他谢绝了一个国家级的宴请，命令我把所能找到的燕京大学毕业生都集合在一块，他要宴请他们一次。他的父亲，老亨利·卢斯是本世纪一个伟大的传教士，曾作为一个基督教实业家，资助了这所大学在北京的创建。而卢斯则想知道燕京大学和它的毕业生们自抗战以来有什么变化。他向这些来自燕京的流亡者询问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以中国和美国在现代世界的共同使命相勉。那天晚上以在一家小教堂里共做礼拜而结束。

在卢斯的头脑里，基督耶稣的目标和美国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并无什么不同，双方的目标都是向中国人民敞开怀抱。这种感情的扭曲通过思维影响了他全部的政治生涯。在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里，终于使他成为一个嗓门最高，当然也是影响最大的冷战鼓吹者。他的美国主义，他的爱国主义，他的勿容置疑的忠诚，在20年之后已成为过时的陈腐之物。他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样，也是迄今我所认识的最富于感情但却属于那种昙花一现的旗手之一。他和麦克阿瑟相比尽管腔调不同，但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主导思想和行为基调的辩护士。卢斯的基督教信仰是简单的，他使我想起了著名的贝叶① 大主教奥多。这位大主教曾坚持要奔赴前线同诺曼底公爵共同抵抗入侵诺曼底的敌人。他亲临战场，挥舞着权杖（他的道德顾忌禁止他使用宝剑），满怀着正义的善良之心敲打着敌人的脑袋，以此为基督争取更大的光荣。卢斯是

① 位于法国西北部。

从来不考虑正义或非正义，然而一旦事实俱在时，他还是可以被说服接受新思想的真谛的。他所具备的思想，他的工作人员看来也必须具备。而我，没有疑问，就是后来被卢斯敲打脑袋的人物之一，但在同他的第一次会见时，也象初见周恩来那样，我被他的魅力所折服。

他在那十天的访问中征服了整个重庆。那是他精力最充沛的时候，粗壮、健美的体格散发着青春的活力，浓密的眼眉不时在那顶巴拿马草帽下皱蹙，他象一阵风暴袭击了重庆。我就是在这阵风暴中被卷回了一次美国。在他离开重庆的前两天，他找到了我，用他那高傲的、结结巴巴的语调问我能否收拾一下行装，准备进行一次48小时的旅行。我问他为什么，他咳嗽一声说，让我陪同他回一趟纽约。那时，他根本没问我离开中国是否方便或我个人有什么打算。他已决定要我任《时代》杂志的远东编辑。这时候，已经离开哈佛大学三年的我，就要衣锦还乡了。

我们在香港稍事停留，然后又在马尼拉逗留了两天，至此我才算终于结束了为期两周，作为他的中国问题专家所受到的无休止的咨询和盘问。之后，乘坐历史悠久的泛美航空公司的飞剪号航班，经过五天懒洋洋的飞行才横越了太平洋。每天都要在古老的石岛上降落。它们是关岛、威克岛、中途岛、夏威夷等。每天黄昏飞机落地，他就让我乘坐一台轿车去查看岛上的防务情况以及备战的工作进行得如何。他和我都确信，战争正在逼近。第二天一早又开始了他的盘问。

在回国途中，有几次谈话值得回忆。有一次是关于《时

代》杂志的简短历史，而谈话的高潮是卢斯的哲学，那就是：人民是重要的，名人创造新闻。《时代》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是一个人的头像："乔大叔"坎农①。卢斯说，就连疲劳的商人看了《幸运》杂志，也想对其中的人物探个究竟。

最后一次谈话是教给我工作中的行为准则。临近这次回国的旅行结束，我们交上朋友了。他让我称他"哈里"，同时他称我"特迪"。在进入旧金山的途中，他又打开了话匣子，结结巴巴地说："特迪，你是读了这些杂志里的所有商业材料的，你是否觉得老板的大门总是朝每个人敞开的？"我回答是的。他便接着说："好，那可不是我办杂志的方针。每个人的大门都是朝我敞开的。我只是在大门朝人民敞开时才想见到他们。"

在亚洲呆了将近三年后再回到旧金山，不禁为所见到的景象大吃一惊。我记得进入市区上空时，只见金门大桥上汽车密集。我们的飞机下滑着陆时，我们朝下观望，看到的尽是漫无边际的黄、红、黑色彩各异的小亮点。这是一个多么陌生、富裕的国家啊，它离亚洲是那么远，它只考虑它自己的和平。

我从旧金山直飞波士顿去看望我的亲人。到达波士顿时，我穿一身雪克斯金细呢夏装，头戴一顶黑礼帽。家人都为我的装束发笑，我不禁烦恼起来了。我热爱我的亲人，告诉了他们我被提升的事，他们又都为我高兴起来了。

---

① 即约瑟夫·戈内·坎农（1836—1926），美国政客，议员。

但是波士顿不再是我的家了，那古老的贫民窟已不再是我的归宿。我如果在哪里都行的话，我要选择的地方是亚洲；如果在亚洲不行了，那我就去纽约。所以我就去了纽约。在返回美国的五天里我开始了工作。曼哈顿中区的繁华把我弄得眼花缭乱。这里操纵着美国的新闻界，但控制美国新闻界的思想，却是被我这样的天涯游子从世界各地带回的。若干年后，纽约将成为我的家，我生活在那里的另一个贫民窟里。这个窟里的主人们都是做当今的新闻、名人、故事和历史生意的。我爱上了这门职业。

1941年夏天和秋天的生活是单调的。我平生第一次对这个新贫民窟的大街小巷开始了解——《时代》杂志的编辑室是一部围绕着亨利·卢斯的思想而转动的机器。在那个位于第二十九层大楼的《时代》杂志编辑室里，他体现出来的人格特性要比同他谈话时为多。所有伟大的编辑都属于那种能够将所见到的故事、轶闻和人格重新制作的巨匠。他们能发现这些是如何顺畅流出并且合并入另一个只有他们的智慧才能觉察到的世界模式中去的。但卢斯却坚持说，这个世界只是他的记者和杂志按他对偶然事件的观察所要证实的固定模式。凡被挑选进入他的记者笔下的东西，都是他个人人格的艺术再现。他用他所挑选的镶嵌碎片拼凑了现代的历史。而他的选择又反过来影响了动摇在事实和报导之间的事件，这样的报导后来真让我神魂颠倒，着迷不止。

卢斯从来不乏个人的热情——只有在他准备去做一个绝对独裁者和刽子手的时候是个例外。一到周末，他的太太就

邀请我和名流显要们去他们在格林威治的乡间别墅。我在那里可以见到英国在美的情报官员，约翰·根舍和瓦尔特·杜兰蒂那样的著名作家，百老汇的头头脑脑及洛克菲勒家族的各种代表。一到这场合，卢斯就开始对我枯燥地介绍某某是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情。这种盛大的宴会真使我大开眼界，也使他的夫人尽言尽欢。然而他，却一直板着脸。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一天，当我在为《时代》杂志写一篇关于这个事件的真相报导时，他悄悄地走进我的小卧室。原来他的父亲，那个老传教士刚刚死去。我与他共分悲哀，但他的眼睛里却干巴巴的，对我说："他终于活到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立场的这一天了。"

正是珍珠港这个特殊的事件才把我从写字台上，从那个组织中，从把新闻加工成为故事的业务中解放出来。

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我正在修改一篇关于亚洲紧张局势的旧作，我所持的基本论点是，不管日本人在华盛顿讲些什么，一旦警报拉响，我们将不得不同他们作战。詹姆斯·奥尔德里奇，是我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后来退出了新闻界专写小说。他举起了电话机，又放下，大声喊叫道："基督耶稣啊！日本鬼子轰炸珍珠港了；这是无线电里讲的。"我们赶紧赶到新闻自动收报机室，电讯稿接二连三打印出来：短讯……白宫说日本鬼子袭击珍珠港。

我们回到办公室，从我们在洛克菲勒中心大楼的瞭望窗朝外望去，下面是星期日下午拥挤的曼哈顿中区，大街上尽是川流不息的汽车，父母在领着孩子观看圣诞树和这个伟大

城市的节日景观。我们用纸做了些小飞机，从空中向下面大街上的行人传送信息，上面写的是："我们在战争中"、"我们在同日本作战"、"日本人在轰炸美国"。

大家都激动不已，尤以我为甚。在那第一个钟头里，没有一个人得悉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遭受损失的惨状。但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一场值得称道的战争，美国将不得不参加并赢得胜利。这一直是我唯一的信念，35年来从未有过改变：美国参加这场战争并取得胜利同把这个世界让给那些杀人放火且不以为耻的强盗相比，还是前者要好于后者。按最坏的设想，参与这场战争就是失败了，仍不失为上策。

就我自己而言，我知道我要从写字台上获得解脱了。我要回到亚洲去，我是属于亚洲的。而现在，我不再是一个观光者了。我们，我自己已经介入了战争。这将改变我的视野。

第三章

史迪威：跨上死马的骑师

我离开亚洲已经整整一年了——从1941年夏天到1942年夏天，——再回来时已不是一个观光者而是个身着制服的战地记者了。

这套制服将连累我去某处承担一种义务。我要尽力去辅助的那个人，他穿着美国在亚洲最高军衔的制服。他就是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中将，是时正担任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可不是我过去所报导过的那种平庸之辈。他是个摆弄军事的能手，是个爱国主义者。他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抛进了政治的斗技场上。对那里的问题谁都说不清，道不明；对那里的所有决定谁都无法预测。他的巨大痛苦和悲剧不是那时只有简单阅历的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当我慢慢地了解了这位正人君子后我能觉察到他正处在

政治和战争的结合部。这一教训在经历了两年多的岁月后才见分晓。

我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离开纽约的，先被分配到新加坡工作。但新加坡和东印度群岛迅速陷落，我的船便改航驶向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重访麦克阿瑟之后从那里出发，直达印度，那是亚洲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热点。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封锁着中东的亚历山大港；在远东，日本人刚刚占领了缅甸。印度人，在看到这块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被夹在这两个钳形地理中间时，认识到了这正是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机会。

1942年的夏天，我在印度，经历了两个月的暴力和起义。亲眼看到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最有影响的人，也都被拖入了他们所无法控制的事件中。我访问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是一个口齿伶俐、面目忧郁、信仰宿命论的人——正要去领导这场他既不希望发生也晓得无法阻止的起义。陪同我的是英国陆军元帅，尼赫鲁的顾问，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瓦维尔。他是个五十九岁的干瘪老头，指挥着印度的英军，无精打彩地唠叨着一些关于殖民地和帝国的陈词烂调，他则趋向镇压这一场他不能理解的暴乱。

在我的记忆中，最让人的愿望和意志所承受不了，也是最伤人感情的事件是发生在8月酷暑里的一天——印度的国大党投票通过起义的那天上午。那时我坐在一辆装甲车里，一队背着布朗式轻机枪的英国兵也坐在装甲车里，列队通过旧德里一条最繁华的大街：昌迪尼肖克。装甲车里的士兵全是从格拉斯哥贫民窟征来的苏格兰人，清一色的工党成员，尽

管满嘴发出臭味儿但仍可称得上是为人热诚、待人可亲的好小伙子。他们既憎恨前头的英国军官，也憎恨他们前面的中东雇佣军，但是那天上午他们实在是别无选择。大街上到处是造反的人群，被打得满是血污的学生挥动着绿黄相间的印度议会的旗帜，一面高呼着“永远自由”；他们还从房顶上朝我们扔石头。我的心是偏向起义者的，但是我懂得，那些年轻的苏格兰士兵也懂得，在这个时刻如果怀有异志，日本人则会攻占印度，英国的统治就会一朝覆亡，战火就会永不止息——而眼下，如果抗议的人群占了上风，他们就会用手指甲把我们掰成两半儿。但印度学生手里没有枪，这些身背布朗轻机枪的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就站在房顶上，有条不紊地朝印度人开枪射击，一具具尸体扑倒在大街上。只有几分钟的工夫，我们的车队就使昌迪尼肖克大街恢复了平静，尽管事件是悲惨的，但干得却是漂亮的，我对此也是赞同的。对于我，中国一直牵挂着我的心，我的任务是赶回那里进行报导工作。如果印度陷入革命者、叛变者或日本人之手，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便失去了通路，为同中国保持联系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将付之东流。

这样，在返回中国的途中，我就不可避免地会见了“充沛的乔大叔”史迪威，主管中华民国防务的人。

在这以前，我一直是以一个观光者的身份出现，去接近我所报导的著名人物，尽量去套取他们喜欢的格言，他们的轶事、见识或能表现他们所操纵场面的事实等。但是，史迪威可不是这种人。他是我贴近观察到的第一个建功立业的

美国人，——也就是那种必须在别人的生活中创造事业的领袖人物。史迪威即将在一场他所厌恶的闹剧中受到暗算；他在这场闹剧中的表演是十分出色的——但只是个军人而已。没有人向他解释这是一场政治和革命的闹剧，在他已经做了与他的身份不相符的事情时，尽管为时已晚，也还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他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而就我在以后两年中对他的观察，他一直洋洋自得于这个认识——以他的领导能力去做制定政策的工作绰绰有余。在这项政策中指挥部队只是他职责的较小部分。

我记得我第一次采访他是在德里。他从中国飞到印度来察看八月起义是否破坏了他的CBI①战略后方基地。不几天，就发现英国军队完全能够平息骚乱，他才抽出时间接见我。

他的办公室设在帝国饭店的一个大套间里。我被引进去时，他正叼着一支雪茄烟，怒气冲冲地看着我。史迪威那年五十九岁——瘦小的身材，服装很入时但显得很难看，脸上青筋突出，皱皱巴巴的但却充满了朝气。对于一个陌生人，俨然是一副凛不可犯的面孔。我连忙说明我的来意：我正在赶回中国的途中；他是该战区的司令官；我要写一点关于这场战争的报导。他是否可以就我正要写的形势或他打算要做的事情作一简要介绍？他乘我忐忑不安时迅速打量了我一下，放下雪茄，决定了他要和我说的话题，讲了起来：

“中国的问题很简单，同我们结盟的是一个无知、文盲

① CBI即印度中央情报局。

再加上愚昧的狗日的乡巴佬。”

我一下子梗塞住了。我以前从没有听人那样描绘过蒋介石，甚至连周恩来都没有过。而史迪威继续对蒋介石发泄出阵阵的怒火。

那时我对他还不了解，对以后所了解的关于他的荣誉、善良和坦率那时也一无所知。但是他的痛苦，我现在忆及，远不止是那个月才产生的，而是他终生的饮恨。历史使他因中国而遭殃。史迪威是一个杰出的指挥军官，步兵战术家，美国陆军1941年和1942年演习时的明星，乔治·马歇尔的爱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朦胧岁月里，在美国的陆军受到无休止的思潮干扰时，史迪威已成为美国陆军中的中国专家了——学习汉语，直到能说能读，和军阀的部队一齐行军，在中日战争的前几年里担任美国驻北京的武官。

这种奇特的经历使他成为眼下这个可诅咒的司令官。珍珠港事件后两周，史迪威第一个被物色去指挥对德国军队的作战，由他去领头实施在北非登陆的格姆内斯特计划，这是最终打进欧洲的第一步。如果史迪威果真实施了这个计划，那么，他的名字也就会与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布拉德利以及巴顿等人一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伟大的美国军人之一被载入西点军校的校史。而那时中国的蒋介石经常恼怒发牢骚，一个劲儿地要美国援助，对于战争初期他的中国在美国的战略排列中地位低下义愤填膺。这样，在华盛顿惯常随便做出的影响别人命运的政治决定中，便有安抚蒋介石这一项；答应选派一名杰出的美国军人去协助他——除去史迪威这个

穿军装的中国专家还能有谁呢？那个在北非的登陆计划是近一年之后的事，而当时呢，缅甸在受到攻击，中国岌岌可危，于是史迪威反而被他过去的经历，被他在和平时期所练就的特长坑害了。

在他到达亚洲时，恰遇缅甸的陷落，英国军队和中国军队在日本的攻击下望风而逃。在美国没投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史迪威被放到了士气已化为零的中国军队的指挥位置上。他是个美国人，却手握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甚至有处死少校以下军官的权力，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个权力是多么有限。中国在缅甸前线的军需供应官是个叫俞飞鹏的将军，在战争紧急的时候，那几台仅有的中国军车不是被用来输送撤退的军队，而是去运他所攫取来的值钱的东西，运到被封锁的中国内地去出售。史迪威想就地枪决这个俞飞鹏，但旋被告知说，这可不行，俞是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表亲。最后，防线全面崩溃，史迪威本人步行十三天，跋涉了140英里才通过莽莽山林到达了印度。待平静下来后，他在第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宣布我们挨了一顿好揍。我们丢失了缅甸，脸面也丢得净光。我想我们应找出原因，打回去再夺回来。"

我在1942年8月第一次会见史迪威之日，也正是他在寻找原因之时，他开始领悟到这是可怕的命中注定。他的最大职责是要把中国军队训练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使中国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作战力量。其后，他的战略职责便是：用这支现代化的军队去切断日本军队占领的缅甸防线，从而打破对中国的封锁；到最后，再组建一支更为强大的中国军队，加入太

平洋联盟，实施对日本的总体反攻。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一个世纪以来，许许多多传教士、顾问、教师等西方人一直想改造这个中央王国，但充其量只是对它有点干扰而已，而史迪威则不过是这个长队列里的最后一名队员。在史迪威第一次同我见面时，他开始领悟到的就是：全部战争的最高水准是受制于政治的；在中国，没有政治的变革便不会出现有战斗力的军队。

史迪威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个支配他头脑的既成的政治观念：象英国、俄国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是大国之一；中国的"政府"也应赋予如其它盟国同样的尊严、尊重和支持。这种大联盟的观念确实抚慰但也确实把中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引上了歧途。但是当总统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要对全部现实负责。处于疾病和痛苦中的罗斯福懂得作为一个总统要分清轻重缓急，而对这个吵吵嚷嚷的世界对他施加的压力，在对待诸如战争的战略问题、国内政治问题和国会问题或邱吉尔、戴高乐、斯大林和铁托等人的问题的同时，罗斯福在思想里是把中国放在一个很低下的位置上的。是军事问题则交给军人去处理，——没有人在战斗之外去考虑什么政治和政策问题。30年后，当许许多多的将军们一个个奔赴越南战场时，又一次面临他们必须参加的亚洲战争而缺乏政治或政策的基本常识的局面——从而也使他们变得两眼漆黑，成了不幸的失败者。然而史迪威是第一个去着手接受这份政治和政策差事儿的美国战区司令官，这个差事虽有战争使命作其伪装。正如史迪威很快领悟到的那样，进行战争不可没有

政治。

对史迪威使命的正式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协定中的两项原则的理解是不相同的。美国方面的史迪威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中国方面的蒋介石是联合战区的“总司令”。按照蒋介石的理解，只要告诉史迪威一声他需要什么，史迪威就马上向国内申请要什么就是了。史迪威就象个银行里的现钞出纳员，蒋介石想要枪、炮、飞机、汽油、武器、军需品，他的美国参谋长就得向华盛顿申报这些需要，转眼之间，它们就纷纷而来了。在过去的30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报导过美国的那些令人灰心丧气的盟国，他们摸透了美国人的宽宏大量和美国人的美德，都没有例外地觉得他们比美国人还懂得怎样去支配美国的财富，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象蒋介石那样的贪婪——根本不把站在他面前的满口说着“不行”的美国人放在眼里。在这起史迪威事件中，蒋是以个人的恶意否定了史迪威，也就是否定了美国人民、美国新闻界、美国政府所寻求的正义企图。

对史迪威个人，这场冲突由于蒋介石夫人的介入而加剧。她是个既漂亮又刻薄又易动感情的女人，从赞美诗到最深奥难懂的淫妇语言都能用美国话讲出口的女管家。在她的身上，美国人的气质要多于中国的。蒋夫人总是穿一身极漂亮的绿绸礼服，既有在校女大学生那种小猫似的羞怯，又有宿舍管家婆子那样的小器和颐指气使。她走起路来抖得衣裙窸窣作响，犹如皇后驾到一样。她担任丈夫和史迪威之间的翻译，当事情僵持不下时，她就把两人的手都拉到自己的手中。据

史迪威日记中所载，蒋夫人在一次供应会议上的表现颇具代表性。这次会议发生在他去我们首次见面的德里之前。那天下午，蒋夫人在电话里把史迪威狠训了一顿，说他“故意破坏”中国人对四引擎轰炸机的要求和数百架次的运输；然后凭借她手中的权力，趾高气扬地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中国空军的两名高级将领：周至柔和毛邦初；还有史迪威麾下的两名美国将军：陈纳德和比塞尔。当着史迪威的面，她打开了她的订货清单。下面是史迪威日记中的记载：

“毛邦初，你要多少飞机呀？”她问。“二百架，还要每月百分之二十的副件。”“陈纳德，你要多少呀？”“三百架，也同样要百分之二十的副件。”“那好吧，”蒋夫人说，“我们现在就告诉华盛顿方面，由宋子文施加压力，那你史迪威将军就得忙乎一点，也得向他们通告一下啦。”当史迪威讲了炸弹、弹药和汽油库存量有限之后，她竟回答道：“我们要谈的不是这个。你的职责就是要得到这些。”然后，当其他人都离去时，她就象个管家婆子答应给确实表现好的孩子一点买零食的小钱那样，又补充说：“我们希望看到你确实象个将军的样子！”对此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评论道：“他们是一帮混蛋。”

起初史迪威认为他的使命与后来的认识是迥然不同的。他的使命应纯粹是军事性的。这种观念是乔治·马歇尔给他灌输的而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从全局看待这场大战，是马歇尔的最高指导思想。解救欧洲和英格兰与俄国是第一优先，其次才是太平洋地区，那里的海军和麦克阿瑟的陆军会

慢慢地封锁日本并使之孤立无援的。第三步是在海军肃清海上之敌后，美军再在中国登陆，在一支训练有素组织有方的中国军队配合下，完成在大陆和本土封锁日本的计划。中国是潜力最大的人力盟邦，但这种人力首先要训练，其次要装备，再次才是投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史迪威的职责便是为战争组建中国军队——把他们锻造成大陆上的一块铁砧，使用美国陆军这把铁锤，把日本人碎尸万段。

这个使命是单纯的，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最明显的，莫过于缺乏有效的政治。但事情尚不止于此——史迪威是如何被错误地引进到这种政治里，才是他倒霉的关键。如果中国士兵不能打仗，他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将军们偷士兵的薪饷；士兵们吃不饱肚子；士兵们有病；士兵们营养不良。要使他们再进入临战状态，那就意味着要揭发出：是谁偷了他们的薪饷？为什么不能撤换或枪毙那些不称职的将军？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危急关头使用共产党的部队？归根到底，两党都是抗日的嘛。为什么蒋介石不让他最精锐的20万部队去抗日而用来封锁中国共产党？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史迪威对此冥想了两年半的时间，依然对这些"为什么"不得其解。最终，问题总是出于政府。一支军队是一个社会及其信仰的外在表现，每支军队都在反映出派它出去打仗的那个政府的面貌。年复一年，渐渐使史迪威看明白了，中国那个得到美国承认的政府并没有发挥政府的职能。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得出一个令人畏惧的结论：如果要使中国政府变得对美国有用的话，就必须更换，——即使不

能这样，它的国家首领也必须靠边站。

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当我随同史迪威在1942年秋天飞回中国时，我发现史迪威又卷入了另一场争斗。同他结仇的是我的老朋友，曾一起在卫理公会聚餐会上同桌吃饭的陈纳德中校，现在已晋升为准将了。他担任飞虎队队长，指挥着在中国的美国特遣航空部队。

这完全是一场美国式的争斗，它的阴影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和美国军事理论的影响——因为它是围绕着战争的装备和目的而产生的那种争斗。

陈纳德准将也象史迪威那样是一个富有性格的人物，也许有着更为复杂的性格。史迪威是个道地的新英格兰人，自奉严谨，寡于词令。他忠于职守，不管是马歇尔还是美国要他做的事他概不推辞。陈纳德是南方人，在德克萨斯出生长大，一看他的姓氏便知道他是法国人的后裔。他的皮肤发黑，几乎是黝黑黝黑的；他的脸被一条条上下垂直的纹理切割得皱巴巴的。陈纳德操一口十足的南方口音，当他轻松时，如进行经常邀我参加的扑克游戏时，他就露出了一口浓重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的土话，在我这只在波士顿长大的耳朵听来，简直是莫明其妙。

除去军服，陈纳德和史迪威也许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的痛苦。只是史迪威会咆哮如雷，而陈纳德则闷在心里。对于处在和平时期的美国陆军将面临的事情，这两个人都忧虑重重。这支陆军在1939年底还不足174，000人，仅是

作为美国自卫的战略力量。但这支外表薄弱却很强壮的美国陆军，在20和30年代里孕育出了数以十计的军事天才，他们著名的名字后来几乎可与拿破仑的元帅名册等量齐观。在那些紧缩部队的日子里，所有的军官，不管是陆军的还是空军的，都必须是技术娴熟的匠人，这样才能节省人力和物力。其中一些人，如艾森豪威尔，布拉德利，史迪威，克莱，加文——把献身于祖国和荣誉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象巴顿和陈纳德——主要是出于对这门职业的爱好，迷恋于部队的装备。陈纳德的擅长是空军，也象他的上司比利·米切尔那样，总是想突破预算，但他们在长期同官僚们就证明空军在战争中是无所不能的争执中总是输掉。这就是陈纳德的苦恼所在。他于1936年退休后，就怀揣他的一技之长到了中国，受命组建蒋介石的空军。他的得意之作便是组织了美国志愿航空队，把猪嘴状的P—40飞机喷上了“飞虎”的航徽，并在缅甸战役中闻名于世。当史迪威在1942年早春受命来华时，陈纳德已经是饮誉世界的著名人物了。

史迪威和陈纳德相互看不起，但他们的仇恨又不仅仅是个人方面的。他们的斗争源出于对战争的不同观念，这种歧见直到今天仍在把整个美国的防务和战争计划分为两派。这种歧见也就是陆战和空战之争。

我并没有把这场争斗当回事。但《时代》杂志在1943年初指示我写一篇关于陈纳德野外演习的报导，通过报导演绎成故事，再把他的头像作为封面，这样他将被装扮成一名真正的美国战争英雄。而那时，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争斗已到了

不可置之不理的地步。

把这些事抛在一边，我以一个重庆时期老朋友的身份，开始询问陈纳德：他和史迪威的势不两立是从哪里开始的又是怎样开始的呢？“那个我开的窑子，”他转弯抹角地说。“给我惹了麻烦”（我的笔记记录了他的原话）。“小伙子们到那里去，有的玩得干净，有的弄得埋汰。”从这个故事开始我才弄清他同史迪威的首次冲突——是为了一家窑子！陈纳德在1942年早期的战略——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多么微不足道！——所依赖的打击力量还不到80架飞机。有时有一半的飞机因为偶然的苟合而不能起飞——地面和机上的工作人员都住院治疗在昆明有名的拐把胡同（音译—译注）感染上的梅毒。这种病也象他的飞机被击落那样减少了他的战斗力。这令他不能容忍。因为他不能把年轻的美国子弟关进笼子里，他既要承认他们的性欲，又要保护他们的健康以保证飞机上天，于是陈纳德派出美国航空队的一架专机，载着医务人员，飞过著名的驼峰口（喜马拉雅山山嘴）到了印度，那里有十二名未传染上梅毒的印度妓女正在接受检查。她们经过消毒后，作为中国特遣航空队的补充服务人员，被美国专机运回到我们的前沿基地里。这样，我们的地勤和空勤人员可以在那里同她们尽情作乐而无传染梅毒之忧了。我从没有听到过这则新闻。令人难堪的是，史迪威并没有批准这件事，当他一听到这件事肺都气炸了。史迪威是战区司令官，又是个清教徒。他知道日本军队有随军妓院，普鲁士军队有随军妓院，法国军队也有这玩意儿。而美国军队可不许

有这东西。老天爷呀，美国军队怎么也不该用专机把妓女送过驼峰口呀，根本就不该为美国军人搞这玩意儿的。陈纳德只是想保证他的飞机都能上天，在空中为所欲为，用炸弹去传送他的信息。而史迪威仍恪守奥利弗·克伦威尔①的道德观——清白，绝对的清白，什么受贿、通奸、说谎、偷盗等，凡是违反十诫的行为都与他绝缘。虽然那些日子许多为美军服务的小伙子都有这种需要——但陈纳德还是关闭了他的妓院。

这个故事既有趣又平常，但却引发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这两个人本来是应该摒弃歧见的，因为他们二人都是美国决定论者。但这二人脸谱上的颜色差别甚大，而且这种甚为重要的差别有无限扩大之势；这种战争和力量观念的不同始终贯穿在美国的地理政治学战略中。

陈纳德是空军决定论者。他相信空中力量能够消灭日本，后来证明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尽管他从未参加过对日本燃烧着的城市的大破坏，但他懂得从空中袭击日本会收到空前的效果。他也懂得用他那几架位于中国西南高原上的飞机去攻击日本暴露的后方基地也会收到空前的效果。在1942年和1943年这两年里，他是唯一到达日本的美国司令官，除了美国的潜艇司令官们——他们可以达到日本的内海交通线。对陈纳德来说，中国只是一座发射台，他们的飞机可以从设在这座发射台上的基地起飞，象精钢刀一样刺入日本。在他的

①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将军，清教徒政治家。

战争观念中，他的飞机是外科医生，中国是它施展器械的手术台。

没有人再比蒋介石对陈纳德的战争观赞不绝口的了。陈纳德带给中国人的信息是朴实的：让华盛顿给我足够的飞机好了，我要消灭掉日本，你们中国人可以睡大觉去。这样，陈纳德和中国人就在华盛顿的白宫里结成了宫廷盟友，去推翻陈纳德的挂名上司、战区司令官史迪威的战略。

史迪威在理论上同陈纳德的分歧在于他对陈纳德空中战略会导致什么的不同估价。史迪威的理论是：如果陈纳德的空军确实能象所希望的那样给日本人以重创，日本人就会报复的。如果陈纳德痛击了日本的内海交通线，日本人就会用袭击华东的美国空军基地的办法来保护他们的内脏。防守这些基地的中国部队是不堪一击的。

史迪威也象陈纳德一样，对他主张激发中国地面力量的作战价值坚持到底，说一不二。这样看来，史迪威首先要建立、装备、训练一支能同日本人作战的中国陆军是绝对必要的。但这样做对陈纳德说来，他的战略不仅变成了无谓的冒险，而且是愚蠢的了。他，陈纳德，那时是独一无二的盟军将军，天赐良机于他去刺进日本人最易受攻击的内脏，这样的时机必须利用。

这两位将军之间的争吵，也就象英国（蒙哥马利）和美国（布拉德利和巴顿）在1944年秋天就纠缠不清的供应工作而发生的争吵一样。军人之间的争吵往往是从计算给养开始的，只是后来才逐步升级到精神和政治方面，但在中国，对给养的计算却是格外的怪诞。

从1942年春天开始到1945年春天为止，所有给被围困中的中国的给养，不论是给美国军队或中国军队的，都通过驼峰口进入中国。当一架飞机飞到驼峰口上空，那真是高度浪漫——一架架封闭的飞行物，体积不大的C—47式后来是C—46式飞机，正把日本飞机堵截在充满云雾的高山中。一群美国小伙子，身上长着疥疮，手抓着痒，疾病、虐疾缠身，不时还在紧张之中说着笑话，使人感到有一种“驼峰口式的幸福”（“这就是西藏咧”他们会指着白雪皑皑的地物标志说）。

但是在战争的明细账上，他们只是空运部队的货运员，但他们运货的宗旨却引起了记账人的争吵。驼峰口的空运开始于1942年的4月，正是日本人占领缅甸，封锁大陆交通线之后。从每月80吨的运输水平上升到秋天之前的每月300吨，到1943年初，由于增加了人力和飞机，运输量就激增到每月3,000吨了。每月2,000吨至3,000吨的货，在陈纳德——史迪威大争吵的时候，算不了什么。中国有5亿人口，至少有400万也可能是这个数字两倍的军队，反正没有人搞得清楚；战争工业在无休止的需求；仅通货膨胀一项就需要以百吨计算的纸币在美国印刷好再空运到中国来。所以蒋介石就要为他自己揽去全部的吨位。而陈纳德也需要甚至比这个数目还大的吨位以保证他的飞机上天。而史迪威，则需要比这还要多的吨位，为实现乔治·马歇尔的战略而训练和装备一支中国陆军。“用一只麻雀粪去给一块十英亩的地施肥”常被史迪威用来形容他这个挂名的货物分配者而对各方要货人时的

处境。在1943年2月，穿梭于喜马拉雅山走廊里的老式货机，运来了3,500吨的给养。曾答应给陈纳德的空军850吨，但他实际上仅得到330吨。“夜里我躺下睡不着，梦里还想着汽油，”他曾这样告诉我。“我的胃疼又犯了。过去十天我用去了四万加仑汽油，而我只进来了一万七千加仑。”没办法满足陈纳德的胃口，也没办法满足蒋介石和史迪威的胃口。

到了1943年5月，罗斯福不得不对这个三边争吵进行调停了。陈纳德和史迪威都被召到华盛顿，由最高的美国军方进行仲裁。这场史迪威和以蒋介石作后台的陈纳德之间的争吵，看来并不复杂——不就是一个吨位问题嘛。对一个政治问题作出一个技术结论总是有诱惑力的。英国人，中国人和罗斯福的宫廷显要们都一致承认陈纳德的办法最简便可行。于是，罗斯福就决定，每月1万吨的供给必须立刻运往驼峰口；有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他又决定7月份须空运7,000吨，到年底渐增到每月1万吨。陈纳德保证说，给他足够的吨位，他就能在圣诞节前把50万吨的日本商船葬身海底。这个数字占日本总拥有量的百分之十。这样一来，驼峰口供给的4,500吨就答应给了他的空军，剩下的吨位再让蒋介石和史迪威去争吵吧。在宫廷政治游戏中，史迪威是没有取胜希望的。“我的要点（对罗斯福）”史迪威在他5月会议后的日记中写道，“是中国正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建立一支能占领和坚守空军基地的地面力量，打开从外部世界进入中国的交通线，才是实质性的第一步……它们（陈纳德的飞机）是能给日本鬼子一些伤害，但同时也削弱了地面上的努力，

可能使这种努力招致失败。敲掉日本的几架破飞机有个鬼用呢？”

但陈纳德却我行我素，到战争结束时，宣称他已将200万吨的日本船只送到太平洋底。没有疑问，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个辉煌战绩，但我心里一直在想，如果史迪威也照他的方式行事，共产党也许不能赢得中国，——或者就是他们赢得了，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盟友，在最低限度里，也不会把我们当做敌人。

回首往事，我是这样评价陈纳德的战略的——象柯蒂斯·莱梅和亨利·阿诺德①的战略一样——植根于美国的那种令人生畏却僵死呆板的实力战略。空中力量是个颇具诱惑力的概念：猛扑过去，狠狠打击；打击目标由经济学家去确定。从空中施行打击既干净利落又合乎逻辑，就象一场足球赛那样，球门和得分在球场上一目了然。美国空军的这种理论在美国占压倒优势的状态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直到越南战争才遭到灭顶之灾。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期，我也置身于空军崇拜者之列，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出自于同陈纳德的友谊。诚然，他早期待我亲如家人。那时我在重庆孑然一身，他也在那里自我放逐。只要我张口要求参加轰炸，借机撰写一篇有趣的故事，他就会帮忙让我搭乘执行任何任务的飞机。但是他那叽哩咕噜的说

① 柯蒂斯·莱梅（1906——　），美国将军，曾任美国空军参谋长。亨利·阿诺德（1886——1950），美国将军，曾任美国空军司令。

话方式，非一般人可把他说服。如果要实现全面的胜利那就必须全面毁灭敌人的城市和生产基地；飞机就是达此目的工具，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德国。“在战争中除了消灭敌人，”陈纳德会问道，“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吗？”陈纳德热爱这些工具。

那时我既说不出是史迪威在什么方面说服了我——现在我也讲不明白，我是何时倒向他们争吵中的史迪威这一方的。也许我的转变萌发于我心中产生的疑问。如果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敌人，那么，除了去防卫人人都要防卫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抵抗运动相持状态的维护难道不是既依赖政治又依赖军事吗？难道政府不比直接的战机更重要吗？倘使你用进攻的策略丢失了你防卫的阵地，事情将会怎么样呢？

在1943年春天，我心中酝酿着很多未定形的问题，尽管他们已开始交锋了。我既不是一个观光者也不是一个哈佛大学的历史学者，我是穿制服的兵。我自己的两个兄弟（一个在太平洋，一个在欧洲）实际上都在战斗，都是我报导的这场战争中的马前卒。就是作为一个记者，我也正在被迫地采取立场，象大多数记者那样，清醒地或不清醒地从事工作。我现在清楚，我那时转向史迪威方面反对陈纳德，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史迪威的压力。那时候，我开始相信中国政府已完全丧失了统治能力。中国不仅是个供我们试验武器的发射台，它是一个实在的国家。它的本身和内部是辽阔的，神秘的，残酷的，在我们使用它的领土作为消灭日本的发射台

的同时，同它的正在变化中的人民交朋友的目的是必要的。经过事后漫长的领悟，我现在才算看清了史迪威的用心。他企图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去处理一件使命，一件不是身穿军服的将军们所能完成的使命。

是河南的大灾荒才使我从赞同陈纳德的立场上转变，转而赞成史迪威的意见。甚至就在那时，它就使我知道史迪威的使命是多么无望，他将见到他怎样的下场。然而灾荒直接给我的教育还远不止这些。它教我懂得了混乱和秩序，生存和死亡。在我心灵的烙印中，最深刻的莫过于河南的灾荒，直到今天仍栩栩如生。

这场灾荒发生在1943年冬天。

河南省，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着的3,200万农民，种植着小麦、玉米、谷子、大豆和棉花。河南既不象山区的山西那样落后，也比不上西方化的省份如沿海的江苏那么富裕。它是一块土质优良的大平原，颇类似美国衣阿华州那一望无垠的土地，但它的土质却不是衣阿华大草原上的那种黑色沃土，而是覆盖着清一色的黄沙。有了雨水滋润，年景还是好的，如果不下雨，则颗粒无收，农民就要饿死。1942年全年没有下雨，一直到1943年，据我们在重庆听到，河南的农民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中国，灾荒也象地震、飓风或朝代的更迭，来来往往史不绝书。人们往往用灾荒来确定家族的历史。但灾荒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河南1943年的那场乍听起来好象是编的故事一样的灾荒将成为现代历史上最悲惨的

一页。

所以，在1943年的2月末，我又一次飞赴华北（同我的朋友哈里森·富曼一道前往，他是《伦敦时报》的），并获准从宝鸡到西安沿陇海铁路旅行。又从西安到达潼关①。这是一处隘口，黄河在此流过，铁路也在此通过。日本人的炮兵驻扎在黄河北岸，零星地朝南岸的铁路线打炮射击，封锁这个进入河南的必经要道。

火车站就设在隘口上，我们在此过了一夜。尿臭、屎臭、尸体的臭味汇合在一起，因为在我们四周几英亩的空地上挤满了农民。他们蜷曲成一团，躺在寒冷的土地上，在等待下一列火车载他们往东边驶去，到后方去讨饭。有的人用毯子裹着身子，有的身子底下就放个垫子。很多人头上都缠条毛巾御寒，偶尔才见到戴皮帽的人，帽耳朵耷拉着。他们逃出来时都穿着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老式的结婚服装，红红绿绿的，上面沾满了污迹和一片片闪光的斑点。他们逃难时把所能带出来的好东西都带在身边——黑色的水壶，铺盖卷，还有不知是那个朝代的落地座钟。凡是能卖掉的东西都被换成了纸币或在食品摊上换成食品吃掉了。这些食品无非是些米饭或在木炭火上烤熟的肉之类。火盆在风箱的鼓吹下发出蓝色的火苗。婴儿在哭叫，却没有人理会，甚至连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女人怀抱中的孩子也没人注意。士兵在驱赶着这些乌合之众——好象他们是畜牲——士兵们还要做的

① 原文为gap，就书中的描写及查核有关资料，当确定为潼关。

一件事就是吓走哄抢食物或夜间抢登火车的人。

第二天一早，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台带把手的机车。日本人只往火车上打炮。一夜要有三列装难民的火车通过潼关，对于我们的只有两个士兵操纵的小泵车这样小的目标，在白天，日本人是不会打炮的。我们也用士兵的垫毯把身子裹起来，坐在敞开的小泵车上，迎着寒风，走了30英里。那天我象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又象一个检阅他部队的将军，而我检阅的却是一场灾难。

当然，那里到处都有血迹，但这血迹还不是一场灾荒的标志。血污是从难民火车上扔下的垃圾堆里渗出的。有的难民从露天的平板车上掉下去摔死了；有的难民趴在有盖的货车顶上，夜里天冷，手指头冻麻木了，火车一动，就摔下来死掉了。我看到了一个人，倒在路轨一旁，还没断气，抽泣着，一条腿被火车从胫骨处轧断，断开的胫骨象是白色的玉米秆。他肯定是掉到火车轮子底下了。我看到的另外一个人也没断气，臀部血肉模糊。我强迫开车的士兵把车停下来，但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给这个人吃点磺胺喝点水，给点钱，答应给他找个医生治疗。

鲜血，我要说，并不是我的主要伤痛。我的主要伤痛在于我对所看到的一切变得麻木了。在一场大饥荒中，杀死人的是大自然而不是某个人，人在临死的时候并没有在尸体上留下什么伤痕，敌人就是大自然本身——而只有政府才可与大自然抗争。开始我对这一点是并不懂得的。

整整一天，我们都在铁轨上奔波，我所看到的都是一眼

望不到头的队伍——由沉闷地行进着的家庭或集团所组成。他们在寒风中行进，由于饥饿、寒冷和劳累一倒下就永远地倒下了。队伍中有一种独轮车，家具在上面堆得高高的，父亲在后边推着，母亲在前边拉着，孩子在一边走着。"在有的独轮车的两个把手中间挂个吊床，婴儿躺在里边，睁着冻得发青的眼睛。有的父亲们象印地安人那样，把装婴儿的口袋挎在脖子上，老年妇女都用裹过的小脚走路，一瘸一拐的。有的青年人把母亲背在肩上。在艰难行进的队伍中没有人在铁轨两旁停下来的。如果孩子们朝父亲或母亲哭了起来，相互传抱一下，也就不哭了。有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有的则象哈克·费恩①那样用扁担挑着他们的全部家当。整个行程中，我没有发现有武装人员追赶他们。

我一到河南省的省会洛阳②，就被那里的景象惊呆了。我们到火车站时，天已黑下来了，难民们象无用的杂物一样被装入闷罐车厢里，这样一来，他们就动弹不得了，有的人站在车厢顶上，嘴里还骂咧咧的。有的父亲用手举着孩子，象个小包裹似的在空中摇摇晃晃。难民们要趁着黑夜好通过关口。我们出了火车站，便立刻又进入一个由尿和尸体发出的臭气充斥的世界，通过一条条已荒废的街道来到天主教堂。

教堂的主人是托马斯·梅根主教。他是美国衣阿华州的埃尔多拉人，健康的体魄，矮胖的身材，笑容可掬。他是一

① 即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② 原文如此。实际上当时河南的战时省会在鲁山县。

个虔诚的美国天主教徒。在以后的两周里，我才知道，他不仅为人善良，而且注重实际。他成了我了解基督教的牵线人。我后来弄明白了基督教唯一的推理依据。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所传布的福音是富于进取性的，但埋藏在福音中的却是善良的谕示。眼下，在这个死亡的世界里，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天主教还是新教，传教士们在传布上帝之爱的圣职中结成了伙伴。梅根是爱尔兰派的美国天主教徒，还有两名意大利派的天主教徒，弗拉特内里神父和丹尼里博士在郑州为他担任联络工作。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在欧洲相互残杀，但在河南他们却在博爱中团结在一起。在郑州，意大利天主教徒吸收了阿什福斯先生。阿什福斯先生是个美国原教旨主义者，其时，他们都正面对着凄凉的景象进行着没有希望的奋斗。外面救济物资到来，要通过教会去分发。旅途中，只要我们一住下，就发现他们已被包围起来，人群围着教堂的院子，孩子和女人坐在教堂门口，每天早晨都有婴儿被丢弃在教堂的门槛下，等待着临时孤儿院来收养。传教士们只在必要的时候才离开院子，因为一个在大街上走路的白人不啻是希望的唯一化身，会受到绝望的男人、脆弱的女人和儿童们猝不及防的攻击。有的人卑躬屈膝地跪倒在地上，磕着响头，乞讨点食物，边哭边说："可怜可怜吧"，恳求着一点活命的粮食。那几个被上帝派到这个饥荒之地的基督教徒是唯一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活下去。

他们的高尚人格是无疑的，但于事无补也是无疑的。自从凯撒和基督把他们的信条传给了西方的文明世界，政府一

直建立在秩序和慈悲的基础之上。基督教希望普渡众生，但如果政府不能提供秩序，他们也只能是枉费心机。

我同梅根骑在马上，迎着二、三月的寒风朝郑州出发了。他认为这样我们可看到人死时的惨状。他走在前头，小声地祈祷，每天早晨教我用拉丁语念天主教的主祷文。在一个见不到人迹的村子里，有个小天主教堂也废弃了。被眼前的惨状所征服，我也跪了下去为众生祷告，并未觉得是对我自己信仰的亵渎。一路上，为了给我提神，梅根就教我唱丧礼上的安灵弥撒曲："让他们安息吧"，他唱一句，我也学一句，唱对了就教我下一句："啊，主啊"，如此往复。不久，我们就可以一起唱主祷文了，他骑马走在前头，我骑马跟在后边，为我们所见到的死者致哀。

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也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二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张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有的因为灾荒，还有的则因为遭到抢劫。一堆一堆的春肥扔在那里，无人理睬。在这样的村子里听到一个声音或见到一个人影是令人胆寒的：或是一个老头独自一人在街头踯躅，或是两个妇

女在相对着嚎叫，没有人来看一眼。若是平时会有一群人来围观并叱骂她们的——怎么啦，难道她们还在为死亡争吵？沿途看到的另一景象，就是人们在揭树皮，有用菜刀的，有用镰刀的，还有用剔肉刀的。那个爱树的军阀吴佩孚当年所栽种的榆树皮统统被揭下来了，把揭下的榆树皮磨成粉末再食用。这样，树就死了，再被砍倒当柴禾烧。全中国的森林也许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在一场灾荒中，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磨碎当饭吃的，吸收之后，被人体转换成热量。迄今为止，在想象里不能吃的东西往往要冒着死亡的风险才可获得验证。榆树皮还有橡子、谷壳、树根或水藻经过干燥后，磨成面是可以吃的。农民把一切还活着的东西都弄干磨碎，烤成锅贴吃。郑州的意大利天主教堂的医生让我看一个医嘱，是治疗肠梗阻和人体消化系统疾病的，真叫人作呕。这些不能作手术的农民被送到他们的医院里就医。棉花籽做的饼，显然是不能消化的，却成了最富于营养的食物，吃了肠子就梗塞，后果不堪设想。

汤恩伯将军开办的省政府中心孤儿院的臭味至今仍在玷污着我的记忆。汤恩伯是个能干的将军。在1937至1939的两年中，也就是在抗战的前两年，他憎恨敌人，忠于职守，打过一些漂亮仗。他所管辖的这个战区由两个部分组成：灾荒区和日本占领区。我认为，汤恩伯不失为一个好人。他命令所有的军官都要在营房里收留一名灾区孤儿；所有的士兵都要从每月的配给中扣下一磅粮食分拨给受饿的人们。他还建立了孤儿院，正是我应邀去访问之地。我所闻过的臭味再没

有比这里更令人不堪忍受的了。就连陪同我的军官也被熏得挺不住了，用手帕直捂鼻子，请求我予以原谅。这里都是些被遗弃的婴儿，四个被塞进一张小床上，塞不进小床的就往草席上一放。我忘记了都喂他们些什么。婴儿们都泡在自己的呕吐物和大便堆里，直到死掉，才被清理出去。

这些都是我看到的事情，更令我毛骨悚然的，是听到的关于吃人肉的故事。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砍死另一个人当饭吃，也没尝过人肉是什么味儿，但看来人们吃人们自己的肉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一般的辩解是，肉是从死人身上割下来的，我们所报导的一些例子即属于这种情况。在一个村子里，发现有一个母亲正把她两岁的孩子煮了吃肉。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父亲被指控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吃肉，他的托词是这两个儿子都已经死掉了。最可怕的一例是军队报告的：有些农民专门收留那些食不饱腹的孩子；有个八岁的男孩被骗到一个农民家就不见踪影了。经过调查，在农民的小草棚里发现孩子的骨头被装在一只大瓦罐里。问题只在于这个孩子是饿死后被吃掉的还是杀死后被吃掉的。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滞留了两个小时，最后也无法判断此事的真相，也许人们都不讲实话，只好策马赶路。

最让我心寒的，是当我回忆这些往事，阅读每天晚上写下的旅途日记时，所产生的那种不断增加的麻木感。开始我感到害怕，当然，让人感到悲哀的场面实在太多了。不久，我就渐渐变得冷酷了。也许在一个村子里的街头会发生严重的事情，有一群乞丐正躺在那里等着你呢。好危险呀，你如果一停下

来，马就会被他们摔倒在地，宰了吃掉，你自己即使幸存下来也只能挨饿步行了。所以，我一看见人群，就狠狠抽打我的马急驰而过，有时用手驱赶一下人群，有时扔出一把花生或干柿饼，为争取行路安全，有时朝空中抛出点中国纸币把乞丐们引走。当我竭力去搜索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时，发觉在我的笔记里分析和统计的成份太多，形象的东西则显得贫乏。

郑州是这场饥荒的中心，也是意大利天主教会所在地。我们进入郑州市里时，天正下着大雪。雪是粉末状的，覆盖在睡在教堂院子里的正遭受饥饿打击的人们身上。第二天，当我们在市里徒步进行考察时，雪又继续下了一天。战前的郑州有12万人口，眼下已锐减到大约3万人了。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至180之间。还活着的人都骨瘦如柴，蜷缩在麻袋片里在大街上游荡，有的啼饥号寒，有的默默无言地蹒跚而行。区分生者和死者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有一次我见到一辆独轮车在雪地上滚动，上面的人体随着车子的颠簸也一晃一晃的，好一会儿我才认识到，原来那人的手和腿的摇摆全是机械动作。那是一具死尸，正被运送到垃圾站去。我们在街沟里发现一个男人，弗应特内里神父推推他，看他是否还有气。这个人在雪堆里动弹一下，嘴里不知在嘀咕些什么。我们往他手里塞点钱；他的手指头起初伸不直，不久也能张开了。我们扶着他站了起来，他全身摇摇晃晃的，缠住了我们。恰巧有个抱着哭叫婴儿的女人从旁边路过，我们上前给她点钱请求协助我们——帮助把这个人送到教堂院子

里去，他可以躺在院子里，或许还有救。她上前去扶他，孩子却掉了下来，再抱起孩子，扶着这个男人踉踉跄跄地朝教堂走去。我们才乘机往赈济站方向走去，教会的人正在那里发放食物。食物装在麻袋里，是晒干的米糠，哀求的人须持适当的票证一天才可得到六盎司的份额。很明显，所剩的米糠不多，不够排队的人领，所以，我们在一场可以预见的骚动爆发以前，赶紧溜走了。

从那时起，我就尽量抑制感情，深入思考，想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所发生的事情逐渐明朗化了。在一系列的原因中，任何一个都会引起道德上的愤怒。第一个原因是战争。如果日本人不发动战争，中国人也就不会切开黄河的护堤以阻挡日本人，黄河也就不会改道，华北的生态也许不会发生如此变化，再不然还可以从富裕地区调进粮食。除了这场战争，还有干旱，这是大自然的罪过。在1942年，雨水没有光顾过，土地就不能正常地生产出小麦和谷子，在这一点上，人也是不能辞其咎的——中国政府是干什么的？不管他们为此是采取了什么行动或没采取什么行动，在如此无政府状态下还要假充政府——我发现我的愤慨也就是产生在这一点上。尽管灾荒是老天爷带来的，但在光绪皇帝在位的1893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由于政府的努力，死亡还是被避免了。但眼下的这场死亡却是人为的。

一夜又一夜，在经过与当地的官员交谈之后，我就象今天美国的政治民意测验专家写下他们的笔记一样，记下了我

的笔记。唯一的结论是：中国“政府”是让这些人民去死的，或者说是置之不理，要把人民饿死的。政府正在进行反对日本人的战争；为战争征集的赋税是严酷的。因为政府的纸币没有信用，它的军队用来维持自己的征税就用粮食和实物质替。（“如果人民死了，”一个军官告诉我，“土地还是中国的。如果军队挨饿，日本人就要来占领土地了。”）军队在河南的作为，就是征收比土地本身的生产还要多的粮食。他们把农村的粮食搜刮得一干二净；他们从粮食过剩的地区运来的不是粮食；他们对人民要吃饭的要求是充耳不闻的。

在技术上，我开始搜集充实备忘录的统计资料，每到一个地方，只要能找到愿意和我交谈的农民我就了解每亩小麦的产量。一亩相当于六分之一英亩，我问农民每亩能收获多少磅粮食。八磅？十二磅？二十磅？但我发现军队征收的粮食通常同全部的收获相等，在有些情况下还要高于实际的收获。在这样的地区农民被迫卖掉牲畜、农具、家具等用现金来抵付差额。还有的农民被征招来为军队饲养军马。尽管我被告知说农民好骗当官的，从不说实话，然而，一个农村地方官却对我说：“给军马弄点饲料，也确实困难。我知道，他们自己还吃麦秆呢。”其次还要为本地的政府民事官员征集粮食。每个官员每天征收的定额是四磅半粮食来养活他的家庭，为数不算少；而部队里的士兵，一天可得到两磅的粮食。凡是兵员缺额的部队，他们仓库里积存的粮食都是满满的，多得吃不完——军官们就把粮食卖掉，钱入自己的腰包。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就是从这样的黑市上买到粮食赈济受饿的

人们。

有天夜里，我坐在一个部队的司令部里，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了，有几个农村官员要求进来看我们这些外国人。屋里取暖用的是木炭火盆，照明用的是蜡烛。这些官员手里拿着纸，要我们转呈给重庆的蒋介石——上面记载的净是些有关本地的物产和新交纳的赋税之类。他们这个县有15万人口，有11万人家里已经无颗米下锅了，据他们推测一天约有700人在饿死。我问其中的一人有没有土地。回答是肯定的。多少亩？二十亩。去年秋天收获多少粮食？每亩十五磅。他交的税？每亩十三磅。在一旁的司令官发火了，朝这个地方官喊叫起来，地方官就递给他一份写给我们的请愿书，军官把它装入口袋里了。这个军官又要我们那一份。我说不行。他说行。这样难堪了有一分钟，我们还是把那份请愿书交给他了。因为他如果把我们赶到外面，茫茫黑夜，无路可走。而且我们如果拒绝给他，我们一离开，他就要拿这些地方官来出气。

经过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地统计，汇总在一起，向我们显示出，在这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里，仅还有800万人活着。在边缘地区，还有人在死去。依据我们自己所见及当地官员提供的数字推断起来，大约有200至300万难民乘车逃离，还有相同数目的人已经饿死。我们计算了一下，我们是在3月到达的，如果新种的庄稼生长正常的话，到5、6月才见收获，那么还将有200至300万的人要饿死。在灾区的最后一周里，我对各种数据进行了集中处理，我的最大的估

计是约有500万人饿死或正在饿死——占正常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由这些庞大的数字组成的统计资料，不久就忘记了。我最深刻的记忆不是我所搜集的数据，甚至也不是我们在勘查实际灾情时的麻木，而是我们所目睹的一副惨状。那是一个晚上，我们正在赶路，见到两个人躺在野地里在哭诉。这是一对夫妇，手抱着手，缠结在一起，以对方的体温获取温暖。很明显，他们就要死去了，我无法予以阻挡。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爱情。如果一个没有希望的生命在悲剧中结束时，有他的妻子守护在一起，在麻木的世界中互慰，在僵硬的土地上相濡，在风雪中互相拥抱，承担相互的义务，这就是爱情啊！

我所见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无政府就是无秩序可言。远在重庆的政府在10月才决定豁免河南的公粮税。这个决定不是无知便是伪善，因为当地已经完成了1942年秋粮的征税。到如此程度，中央政府连看都不来看，又决定豁免第二年一季的粮食征收。重庆政府给河南灾区拨出20亿中国法币作救济款，但只运去其中的8亿，都是面值100元的钞票。政府的银行，竟然对它们自己的钱打折扣，一张100元的大票只能兑换回83元的小票——1元的，5元的和10元的。

有些部队的大官把部队多余的粮食向难民出售，从而发了横财。也有些部队的司令官只给他们部队一半的给养，象汤恩伯，为孩子们在部队建立了孤儿院。有的地方官还从给农民的那点施舍中扣除税收，一些地方官对此不无羞耻地流下了眼泪。对这个空有其名的政府所说的应帮助农民之类的话，

根本没有有效的措施去予以实施。

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丧失了任何信仰，甚至就连中国式的那种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信仰也在丧失。恻隐之心，同类之感，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统被扫荡殆尽。父母出卖他们的儿女，一个九岁的男孩可换来400法币，四岁的男孩是200法币。身强力壮的男人逃离家乡去当兵，因为那里可以吃饱饭。妓院的老鸨从外地赶来收买女孩子。

吃饭是唯一的理想，饥饿是至高的指令。食物成了流通货币，贪婪就象一根大棒。春天一到投机商人就带着成袋的粮食和纸币来收买土地，价格很低，二、三十磅小麦就可以换到一亩土地。如果在现场付现钱，相当于十六磅至十八磅小麦的钱就可以成交了。

对于各个地方的军官、地方官和长官，人们仍然承认他们的唯一原因，是他们还在无意义的试图做一些好事。在郑州，有一个地方官给一个难民家一块补丁那么大的布，上面打着红印戳，持有它可以自由通过铁路线往东方去——如果他们能达到火车站的话。因为他没有把吃的东西连同这个通行证一块恩赐给这家人。甚至他们中间最好的人在这点上也是残忍的。灾区的边缘地带有一所训练青年军官的学校。有几个军官也对普遍存在的野蛮行为动了心，干起了抢劫荒村的勾当。这一下子可触怒了他们的长官胡宗南。他命令把其中的三个年轻的抢劫犯活埋在沙堆里。事情才算平息。

从我的笔记里很容易再塑造一个野兽般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体并不是野兽，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种文化所哺

育出来的人民，就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其一生中也经历过节日庆典、有条不紊的文化仪式。如果他们自己的民族里没有秩序，他们就会从破坏者那里接受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象他们在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那边，帮助日本人去打败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或许会象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投靠正在取胜的共产党。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可能是残忍的，但是再残忍也抵不上河南的灾荒呀。如果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可以指望什么仁政的话，那么，在我成长中受到的那种仁慈和自由思想的熏陶与这种理想是不相干的。

我是乘坐一台老式的绿色邮车从北方返回的，又一次沿着我在1939年抵达山西时的路线——而且又一次领略了内地和平气氛中的明媚春光。怒放的苹果花是白色的，樱桃花是粉红的，桃花有着玫瑰的深红。在四川，大麦已经成熟，待开镰收割，绿油油的小麦正在抽穗，低地里的稻田正待开渠引水，准备插秧。河南和死亡的人民只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地区，可是这里的人民被隔绝在这场大恐怖之外，对此一无所知。

在重庆，没有一个人对河南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总体的了解。那时，一层又一层的河南地方官掩盖着事情的真相，报告一层又一层地传递到重庆已变得相当柔和，甚至蒋介石也不了解，除了因为那里食物短缺而拨去了20亿元纸币一事外，还有什么更多的事情。

当我试图向蒋介石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我的

怒火。我四处奔走贼叫，简直象发了疯似的：“人民在死，人民在死亡线上。”如果能终止河南的全面无政府状态，我可以进行无休止的贼叫，让美国的新闻界意外地震动一下。我急不可耐地要把从河南灾区收集的素材发出去，并且从回洛阳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就开始了。按照规定，这样的新闻稿件应先送交重庆，让我在新闻部的朋友们进行审查。如果这样，毫无疑问，一定会被他们扣压。我这批从洛阳发往纽约的文稿，是通过在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转发的。不知道是这个系统出了毛病，还是洛阳电报局素不相识的电报报务员受到良心的驱使，不理睬官方的规定，竟使这份文稿没受审查，直接到达了纽约。于是这个故事就哄动了，在《时代》杂志和它发行的地方哄动开了——该杂志，是全美国对中国事业最热心的。蒋介石夫人那时正在美国，这个故事使她大为恼火。她要我的上司卢斯把我解雇，但遭到卢斯的拒绝，因为我为他增了光。我们之间的争吵是以后的事。

在重庆，一夜之间，我立刻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既有官员们指责我逃避了新闻审查，也有人指责我同电报局的共产党同谋把我的文稿偷发出去。我通过军队的情报人员向史迪威作了报告，也报告了美国大使馆。还报告了中国的国防部长①（他坦诚地告诉我，我既没有说谎，别人也没朝我说谎）。我又向中国没有权力的立法院院长寻求声援，他说此事只有蒋介石能起作用。四川省长，一个很和善的人也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当时国民党政府没有设国防部长一职。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才恢复国防部，部长是白崇禧。

和我讲了同样的话。已故圣徒孙逸仙博士的遗孀出身于名门，是蒋夫人的姐姐。由于孙夫人的坚持，花了五天的时间我才同蒋介石联系上。这个独裁者决定接见我。孙夫人是个体态优雅纤弱的女人，但她的意志却被她所经历的革命磨砺得十分坚强。她劝我鼓起勇气，在她所安排的这次会见中无保留地畅所欲言。“我被告知，”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他（蒋介石）在经过冗长乏味的巡视旅行后，疲倦不堪，需要休息一、二天。但我坚持说事关千百万人民的性命……我建议你就象对我那样坦率和无顾忌地汇报实情。如果老头子一定要离开，请不要为此烦恼……总而言之于事情无补。”

蒋介石在他那隐蔽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细长的身板笔直，服装整洁，伸出一只僵直的手表示欢迎，然后就坐在一只后背隆起的靠椅上，带着明显不耐烦的神情听我汇报，因为这是他那爱管闲事的大姨姐安排的，不做不行啊。我谈到饿死人的事，其次是税收，再其次是敲诈勒索。他否认农民还在纳税；他已命令把贫苦地区的赋税都豁免了嘛。我引用一些农民的实例。他对一个助手说：“看外国人说了。”显然，他对正在发生的情况并不摸底。我趁机把人吃人的事也和他讲了。他说，在中国，不可能有这种同类相食的事。我说，我在路上看到狗在吃人。他说，这也不可能。我和他争论起来了。我意识到我须拿出真凭实据，就招呼哈里森·福曼和我一齐来谒见。因为他持有关于灾荒情况的照片。在我同这个最高统帅交谈时，福曼一直气冲冲地呆在接待室里。在最高统帅对狗吃人的事矢口否认时，福曼才被批准进来。他的

照片清晰地显示了狗在扒出来的死尸旁馋涎欲滴的情景。这个最高统帅的脚踝开始轻轻地痉挛起来，是一种神经质的颤动。他问这幅照片是在何处拍摄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掏出他的小印戳，拿起毛笔，记下笔录。他询问官员们的名字，还想要更多的名字，要我们为他提供一份详尽报告，不要把人的名字遗漏了。就象向他本人陈述一项声明似的，他只是无精打彩地说他已告诉军队为人民节约粮食了。他还向我们道谢，并夸奖我说"比我派出去的任何一个调查员"都能干。从我领进去到被领出来只有20分钟的时间。

我了解到，正面的情况开始变化，我猜测，这是以那个倒霉的洛阳电报局为起点而开始的，是它才使河南饿死人的惨剧在美国披露。生命得到了拯救——是被美国新闻界的力量拯救的。几个月后，通过缓慢的邮政系统我收到梅根神父的一封信。为显示这种力量，我摘录如下部分：

"你们回去之后，电话就开始响个不断（梅根神父写道）。从陕西开来的货车装的全是粮食，以后就不断开来。在洛阳，粮食简直到了卸不完的地步。第一批到达的四个车皮的粮食可以说是最少的一次。省政府忙了起来，开设的粥棚遍布全省。他们是想做事的，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也拿出了他们过多存粮的一部分，帮了很大的忙。全国到处都在为灾民募捐，钱纷纷涌进河南。

前面所说的四点都是我亲眼所见到的，也是切中时弊的四点。同时也证实了我以前的判断，即这场灾

荒是人为的，整个过程的任何时候当局都有控制的能力，如果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和意志。你的来访及对他们的规劝获得了成功，使他们从昏迷状态中猛醒过来，使他们忠于职守，局面也就打开了。总而言之，威力归功于《时代》和《生活》杂志，归功于《幸运万岁》杂志。平静了！奇迹！你将被河南人长期铭记。有的人以愉快的心情把你记忆，也有人在咬牙切齿，他们是有理由这样做的。”

一直到战后，我都不想再见到蒋介石，除非是在接见场合。我深信不疑的是，他不光是对我们无用——正如史迪威所说——他对自己的人民也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比较重要的。

现在的历史已经把蒋介石抛弃。在1927至1947的20年中，我们美国人把他塑造成为亚洲历史上一个在歧途徘徊的人物。此时我总想停下来把他作为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弄懂的亚洲政治人物多写上几页。在有些美国人看来，他是个赤诚的卫理公会的执事，一个东方的麦尔斯·斯坦迪司①式的人物，无私的民族英雄。有的美国人则认为他是个天良丧尽的法西斯匪徒，打家劫舍的军阀头子。在我看来这两种人他都不是。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同旧世界决裂过速，被抛进了一个他不了解的新世界里的那种人物。

① 麦尔斯·斯坦迪司（1584—1656），英国殖民主义者，美国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地区的开发者，并首次在那里定居。

在我撰写蒋介石故事的全部年代里，在所有同他会见、交谈的场合里，我从未产生过一次理解他的奢望。他是个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在我进行中国事务报导的岁月里，那时的道德观禁止人们用种族的字眼来报导世界。今天我们可以谈世界兄弟大家庭了，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行为和理解方面的差别却是实际存在的。忽略这个差别是危险的，忽视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理解，在进入他们的世界时就会陷入盲目。尽管它表面上的尊严被瘟疫、灾荒、侵略和残忍行为荡涤殆尽，尽管古老的文化被崭新的革命理想所窒息，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里边，一直隐藏着一种过分的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遗传所致，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

蒋介石则具体体现了这种梗着脖颈的中国人的傲气。

他的傲气是蒋介石反映在人们心灵上的第一个气质。修长的身材，不管站立或坐下总是打着刻板的手势，不管身披黑色的斗篷或穿着卡其布制服总是一尘不染；他有着中国人那一种薄薄的嘴唇，脑袋剃得精光，保持着一副严肃矜持的风度——但他发脾气的时候除外。在那种情况下他会大声叫骂，摔茶杯扔盘子，撕碎纸张，不可收拾。

蒋的傲气不光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还具有种族（不是种族主义）的性质。在他的教导中（他也和毛泽东一样把自己既当作民族领袖又当作民族的导师）他总是习惯于用“民族”而不是“民国”来表示他的中国人民。

他与他的人民共同分享了一个世纪来的耻辱，而且亲身

尝受过这种耻辱，这就磨砺了他的人格中非常尖刻刁钻的各个方面。“九岁父丧，”他曾写道，“时家道维艰实不堪言。吾家孤苦无援，遂一时为受辱施虐之的。”他于1887年出生在浙江省一个农民家庭，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目击了那个古老的清帝国王朝的终结，也一定听到过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和外国军队的血腥镇压，并看到了一切秩序的解体。他参加了军队，成了一名见习军官；到一个后来他憎恨的国家——日本，去学习军事战术。后来，他又被民族革命者送到列宁的俄国考察苏联的制度，特别是军队。他后来对这个国家更为愤恨。他对一切外国人都怀疑，都不相信。中国人的独立和团结是他的全部政治，而他的政治基础就是他的个人意志——不可动摇，坚持不懈，为之献身。

但是他也知道，外国了解的许多东西中国人不了解。蒋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看法，把外部世界看作夷狄野蛮之邦。但这种野蛮人却具有奇技淫巧，他想把这一套都学过来。所以他一直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外国顾问班子。从1926年开始，先是俄国顾问米克海尔·鲍罗廷。接着是普鲁士人，福尔肯豪森和西克特将军，为他组建了陆军部队。然后是澳大利亚人W·H·唐纳德，教他学外交礼仪。再接着便是大批的美国顾问充斥在他的政府里，诸如土地改革、土豆栽培、母牛的人工授精、婴儿的护理、汽车的保养、炮兵战术和航空技术各方面应有尽有。在他所有的美国顾问中，他最得意的是陈纳德——航空技术大师。如果说他对外国人还有偏爱的话，那就是美国的传教士了——因为他在他的第二个夫人，著名

的宋氏家族里最小的姊妹美龄的影响下成为了美国卫理公会的教徒。也许因为卫理公会教徒最清楚通向上帝之路。

在蒋混乱的思想深处，他最想做的事情，也许是用西方的习俗和西方的准确性使中国的传统重放光彩。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内阁部长去找他，穿的是中国官僚传统的长袍子。蒋介石一见就火冒三丈，对他破口大骂一顿。这位部长这样年轻，蒋介石说，怎么能穿长袍子呢。他必须穿裤子，扎领带，穿甲克和衬衫，象现代中国必须现代化一样。他的主张是要给建立在谨小慎微之上的旧传统穿上现代的服装。有一次，我去采访一所参谋学院的毕业典礼，他要在会上讲话。毕业生都穿着军服，桔黄的丝绸肩带飘扬在胸前。军乐一奏，检阅开始，中年的军官们打起哆嗦来，咔嗒一声来个普鲁士式的立正，接着敬礼、后退、正步，直到稍息。然后，蒋介石让他们全神贯注地听了半个小时的训谕。首先读一段孙逸仙的著作，这个独裁者象个教师似的照本宣科，一字一句地解释起来。他正在领导他们通过战争走向中国的新光荣和一个现代化的世界。

史迪威把类似这样的场面描绘得维妙维肖，使我相形见绌。在史迪威的日记里，我后来发现一篇注释，现在应全部复原。"毕业典礼在（中国）陆军大学举行，"史迪威写道，"当花生米（史迪威日记中蒋介石的代号）登上讲台，乐队队长喊起了一、二、三，但很遗憾，这支乐队奏到二就卡住了。花生米大怒，命令停止演奏，把队长骂得狗血喷头，'从一或三开始演奏都可以，就是不准从二开始。'不久有一个

发言的人从裤子口袋里掏出笔记本，花生米见了又一阵大怒，把他臭骂一顿并告诫他说，在外国，你可以把手帕之类放在裤子口袋里，但放文件可不行。文件是放在上衣的下口袋里，如属机密，要放在上衣的上口袋里。不一会又有一个人在队列里绊了一跤，把花生米都气疯了，高声尖叫他该拉出去'枪毙'，而且以他最高的嗓门连喊了数声。”史迪威几乎不掩饰他对蒋的愤慨与鄙夷，当然他称蒋是“花生米”只是在私下里。

蒋介石对西方的万物都着魔入迷。有一次，他正坐在一架飞越驼峰口的美国飞机上，突然对降落伞和救生衣兴趣盎然，那是为VIP机舱里的贵宾提供的，一人一份。一位美国军官看到了，吓得毛骨悚然，原来蒋介石出于好奇，打开了降落伞的包裹，抖开了它的封口，解开了救生衣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他是想弄明白。但万一飞机失事，那就会缺一个降落伞，那么，这架飞机上就要有一个美国飞行员与飞机同归于尽了，因为蒋介石的宝贵生命可不能丧失呀。

但他又是真诚的，真诚地热爱中国，真正地为他的国家——和卫理公会的道德做出奉献。在1944年夏天，当整个华东都在日本人的最后一次大侵犯中陷落时，蒋介石在他的花园里召集了一次不得发表的茶话会，参加座谈的有不少外国记者和他的高级内阁成员。现在我还保存着他讲话的官方记录副本，对此，我们外国记者要受新闻审查，禁止发往国外的。“……前不久，”蒋介石说，“在重庆流传着关于我私生活的流言蜚语……你们听到这些严重诬蔑性的东西……没有告诉

我……什么流言蜚语？有人说我去年秘密占有了一个女人。还有人说我和一个护士有暧昧关系，那个护士又生下了一个小孩……”他继续讲。他否认了这些流言。他翻看着他的工作日志；他宣称“我们革命的前途”正在被这样的流言蜚语所“伤害”，因为他认为，为别人树立榜样是他的道德责任。时值蒋夫人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优雅地站起来说：“我想要说的是，诸位，对于他的正直我既没有作过一丝一毫的迁就，也没有产生过一分一秒的怀疑。”

我认为他讲的是真话，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种僵硬的道德观深锁在蒋介石思想深处的一角里，同时在其它角落里还隐藏着野兽式的背叛、军阀的残忍和对现代社会所需要东西的无知，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他个人的背叛行为，是勿容置疑的。我初到中国时也曾相信他是一个民族英雄。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事变，正象我所积累的笔记似的，这位英雄首次给我的印象并不可爱，以后更是可憎。他曾遭遇过劫持，我是知道的。那是在1936年底，张学良少帅率领的满洲的中国军队干的。周恩来搭救了蒋，蒋答应饶恕这个少帅。以后，把满怀信任的张学良带回南京，这个独裁者就把他投入监狱，判了终身监禁。进入牢笼后，他就耽迷于鸦片，自毁于女色，最终在监禁中迁徙到台湾。这还算说得过去。后来，我又得悉，蒋处决了一大批玩忽职守的军官。这也可以原谅。我又得知，有个名叫李济深的桂系将军，在日本人入侵之前去看蒋介石，呈送民族合作共同抗敌之策，只因为话不投机，在共同进餐后蒋就把

他投入大牢。他也照此款待过另一位将军——张发奎——答应了这个将军的请求，不再处死一个玩忽职守的部下。但是张发奎离开重庆，回到他的司令部，就知道了这个部下在他刚离开重庆时已被处死。我曾同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交谈过。战前，马曾被蒋邀请到他的官邸，给这个独裁者单独讲授经济学——就象他邀请传教士给他讲授神学或普鲁士人给他讲授步兵战术那样。马认为，他同蒋的关系是亲密的。但在抗战中，在讲授他的大学课程时，马开始谴责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蒋又一次请马吃饭讨论经济问题。饭后，当马正要坐进这个独裁者的汽车回家时，前排座上的两个持枪的大汉告诉他，他被捕了——自那时起，他两年都不能回家。

蒋介石一发怒就全身痉挛，时而发生打人乃至杀人的事。他知道他的政府实施的征兵制度弊端丛生。有一天在午后散步的路上，他看到一群农民被绳索捆绑着，穿成一串，送到军队去。这种情景在中国我们见得多了。他被这些被抓的壮丁告诉他的事情激怒了，他让他们停下来。挥起他手中的拐杖，为这种残酷的行为，他把那个征兵官员的脑袋和双肩猛敲了一阵子。

蒋介石也想做好事。当河南的灾荒引起他的关注时，他想做好事。当美国人就征兵制度中的残酷行为提出抗议时，他想做好事。在1945年春末，他对他所制定的这个制度中的过分行为也感到吃惊时，下令立即枪决了那个全国征募署署长，因为这个制度太腐败了。蒋相信任何问题用喊叫一声

"让他脑袋搬家"或"枪毙"即可获得解决，他可能是一长串此类暴君中的最后一名小兄弟了。

现在，我倒觉得蒋是个可怜的人了。他爱他的两个儿子，他的妻子和他的国家——最爱的是他的国家。但是他并不懂得怎样去做一名好的统治者或一个好的父亲；在他想做好事时，一个偶然因素便可以使他归于失败。看到他拙劣的表演和怒气，便使我想起了查理玛因①的故事和传说——夜里，那个年迈的国王想在床上消磨时光，在烛光下拿着一个卷轴，反反复复地端详，上上下下的打量，想弄懂牧师教他去读的那些经文的涵义。他没能掌握住那个牧师所教的诀窍，竟变得怒气冲天！蒋介石朝他的目标曾作过一次又一次的拙劣努力。在20年代，由于肃清了扬子江流域里的老军阀并在那里建立了国民政府而达到了他的伟大；在抗日战争的前两年里，他组织了抗日联合政府，宁愿他的城市化为焦土也不让它们沦于日本人之手。那时的他已迈进了英雄的境界。打那以后，战局稳定了，战争使他变得冷酷。在美国参战之后，也许是因为美国的参战，他的上天诏谕也随之告罄。根据中国的传统，只有掌握上天诏谕的人才能确保他们王朝的一统江山，一旦这个诏谕被神秘地召回，该王朝也就面临分崩离析。象有一种个人神秘感向蒋袭来似的，待他慢慢认识到他的上天诏谕突然消逝时，他的命令已达不到总统府大门之外了。他便进入狂怒的痉挛之中。随着他内心痛苦的增长，他

① 查理玛因（742—814），法兰克人的国王，在查理一世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受封为查理玛因国王。

对美国的痛苦也在增长，因为美国是承担义务把他从日本人和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的国家——但它并不愿意这样做。

在1944年初的时候，诏谕被召回的迹象便日见分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一直把一本袖珍诗选带在身边。读着艾略特①的《风夜狂想》一诗，其中有三句与我正看到的景象不谋而合，常在我的心头萦绕："工厂院子里有一个废弃的弹簧，锈迹斑斑，力量全无，徒具其形，坚挺，卷缩，待一朝断崩。"

你不管到那里采访，你就会发现重庆的内内外外——政府机构、办公室、医院、军队、大学、省政府——各个组织内部空空，"徒具其形"，或已经"断崩"。

这个断崩在无声无息地进行。但是，你可以接触到，感觉到它的存在。你只要掏出你口袋里的中国纸币，看看通货膨胀的情形就成了。诚然，是中国人发明了纸张——就象他们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和木板印刷一样。当帝王们被说服把纸和印刷术结合在一起制造金钱时，他们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张钞票。在纸张问世之前，中国人试验出了各种样式的货币：铜钱、石钱、贝钱、皮钱及丝绸织品。到了宋朝(960—1126)才终于把纸币当作金钱发行使用。没有人能控制得住它们的生产，从而使宋朝在通货膨胀的内向爆炸中垮台。继宋朝之后的蒙古王朝也把纸币视同儿戏，最让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中国惊讶不已的奇迹莫过于这种纸币了。这个王朝也

① T.S.艾略特（1888—1965），生于美国，英语诗人、批评家、散文家。

在无用纸币的暴风骤雨中消亡。从那以后，当一个政府濒临覆亡时，便制造出铺天盖地的通货膨胀。几乎没有例外。从宋王朝到法国革命，从美国的南部联邦到魏玛共和国，通货膨胀一直伴随着死神降临时的格格声。这是因为纸币本身什么也不是，它的价值来自于发行它的那个政府的信用和力量。蒋介石中国的消费指数，记录了它的政府走向毁灭的轨道。

现在，我记不起来我是在什么时候才把通货膨胀视作一种威胁的。起初，只是觉得怪好玩去观望一下。看到美国大兵掏出一张中国纸币，划上火去点雪茄烟，嘴里还说着“我一直在梦想来这么一下子”，真觉得好玩；看到一个中国小姑娘把蓝色的两角钱纸币剪开做成纸娃娃，我也觉得好玩。不过在开始，也就是我在1939年首次抵达重庆时，还是觉得带着纸币，比带满口袋沉重的铜钱方便多了。

后来人们都认识到，每个人口袋里的铜钱再也不会增多了。不久便发生了重庆的作家和剧作家闹矛盾的事。剧作家的收入是从剧院每周的票房分红中而来，因为他们就在现场，收入随戏票涨价而增加，所以剧作家是和通货膨胀共沉浮的。而作家就不同了，等数月后作品发表出来才能有稿费，所以他们要求用大米支付报酬；一千字十七磅大米便是他们的标准。到最后，通货膨胀就被社会接受了。进行黑市货币交易的人不再偷偷摸摸地潜入我住的新闻招待所了。在1944年，他们大摇大摆地进来，背上背个竹筐，竹筐里——是一捆又一捆的中国银行的法币，用来交换美国的美元。

加速崩溃的轨迹也可从统计资料中去追溯。抗战开始的

1937年，中国货币稳定，中国钱3元兑换1美元。1939年，官方抬高了汇率，变成了6兑1。物价受到抑制，也只增加1倍。到1940年春天，物价又上涨1倍，到那年的晚秋又上涨1倍。到1941年6月，也就是卢斯带我从中国返美时，物价比抗战爆发时上升了16倍；到我1942年秋天从美国返回时，它们上涨了32倍；到那年冬天，又翻了一番，它们竟达到战前的64倍之多。

中国的麻烦，一个美国顾问对此直接了当地说，不仅仅是那个最高统帅不懂得经济，连他的财政部长也不知道经济为何物。蒋的财政部长是个优柔寡断，又矮又胖的人，自称是孔夫子的直系嫡传。但孔祥熙不仅仅是孔夫子的第七十五代直系嫡传，又娶了宋霭龄，也就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姐为妻。孔祥熙对经济学的理解，只停留在上海滩上铜钱和银号的货币兑换水平上。我同他有过几次会晤，至今还记得的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谈话，印象最为深刻。"通货膨胀"，这位孔博士说，"什么通货膨胀！你们美国记者谈起我们的通货膨胀就没完没了。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如果人民想化两千元钱买一支钢笔（那时囤积的紧俏货），那是他们的事，与通货膨胀无关。他们愿意嘛！如此而已。他们愿意化这个钱嘛。"他对政府的忠告也就是类似这些的见解。我记得有一位在美国受过训练的中国工程师，其时正在中国的军工部任职，他吞吞吐吐的告诉了我和这位财政部长参加一次会议时的一些情景。兵工厂发现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上不管买原铜还是买生铁都不可行，这个

国家的钢铁生产已下降到年产1万吨——而且钢铁价格也不合理。孔部长想出了一条妙计，如果军工厂生产卷烟机，它们赚的钱就会非常可观，因为当时对卷烟的需求量实在很大——生产卷烟机所赚的钱，他们不就可以为军工厂购买原料了嘛！

同中国人打交道的美国人渐渐对每个中国官员都产生了一种讨厌和猜疑之心。美国参战时，官方的兑换比率上升到20元法币对1美元。但由于中国法币的贬值，实际的兑换率是100比1，到1944年初是300比1，实际物价则超过了这个公布的比率。官方只不过是用这纯属虚假的比率来欺骗美国人，从而使人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在美国空军基地建个厕所，以20比1的官方兑换率，要花20万中国法币，美国人要掏出1万美元，要是在美国国内建造一个同样的厕所，建筑费也就是500美元。到1944年，美国人和中国人关于兑换比率的磨擦，其实质也就是怎样应付美国军队对日益腐败的政府、对通货膨胀的风潮产生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要导致美国人和中国人发生冲突的危险地步。

对那种情况并非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有人被一个负责的中国人告知说，你必须懂得，在战争时期的中国有两种预算，一种是纸币预算，另一种是粮食预算，这两种预算完全是两码事。纸币预算象一张非正常情况下的财政图解表，尽管反映的是一种病态，但至少是可以让人看明白的。那么粮食的预算情况，我在河南见到的即是，军队在各自的战区里根据需要征收粮食。

但在这两种为人承认的预算之外，还有第三种预算——那个最高统帅的个人预算，既庞大又无法计算。这个最高统帅可随意给一家政府银行开一张个人支票：10亿法币给一个爱将，因为他的部队缺少给养；6亿给一个省长，因为当地正面临危机；朝这里扔去十几个亿，往那里又抛去上百个亿。甚至就在财政部或内阁里，都没人晓得多么巨大的纸币输血才能维持这个最高统帅私人政府支票的面子。在那里，人们都对几笔巨款不知所终迷惑不解，但明白事理的中国官员，尽量去控制事态，不使之扩大。终于，他们懂得了，这种纸币也和战场上的子弹一样必不可少，因此又为分享驼峰口的吨位大动干戈，以抢运大捆大捆的纸钞。

通货膨胀是中产阶级挣不脱甩不掉的流行瘟疫。它是一种潜在威胁，缺乏组织能力的政府总是使有计划，想自救，有深思熟虑的人大失所望。对于那些天天老老实实工作上班的人来说在赛跑似的通货膨胀中日子非常难熬。按期还债是愚蠢的，快借钱快花掉才是明智的。每个人都不信任另外的人。我记得我把在美国军队中所能乞讨得来的药——磺胺、奎宁、止痛片、阿托品等，都给了我的朋友，但事后就发现，有些声称有病的人并非真正有病，他们把这些药拿到市场上公开出售换得了一大把纸币。所以，我也信不着那些再向我讨要美国药品、工具和人工制品的那些人了。

在1943年，我开始注意到大都市成都的物价。自抗战爆发以来，当地的物价指数上升了174倍，工人的工资上升了104倍，而那所著名的大学的教授们的工资只上升了19倍！通货膨

胀就意味着这些学者必须挨饿或乞讨。有些具有同样社会背景的政府官员们则还有第三种选择——盗窃或行贿受贿。没有一个官员能保持长期的诚实，除非他们的大米、布匹和食油的配给受到了上司的特殊关照，并且还有一些救济品予以补充。盗窃是比较容易的。蒋介石的通常对策是：枪毙牟取暴利的商人，处决贪污的官员，抑制物价的上升。在1944年，这个首都的一家最敢于讲话的报纸《大公报》以满意的口吻报导过这样的处决："近来政治方面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迹象，"一篇社论的开头这样写道。但紧接着又悲观地警告说"政府应关心一个大前提——官员的工资应当照发以保持他们的诚实……如果政府的官员疾苦不堪忍受，如果他们的工资低得难以养家糊口，贪污之类案子的发生倒值得让大家同情了。"

西方所谓的"Le trahison des clercs"，意即舍弃知识分子，被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革命的先声。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发现有学问的人去辅助它，它也就不能辅助它的人民。在中国，通货膨胀使得有学问的人，诚实的人，正派的人不可能服务于他们的政府，光是不堪忍受的个人花费——或自我贪污就令他们厌恶。他们要寻找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共产党。通货膨胀使生活到了不合理的地步。

在我的记忆中，大崩溃时的一些片断要比统计资料或物价指数生动得多。

例如：1943年，在闭塞的甘肃省，首次发生了抗税暴动。当地的农民拿着草叉和刀枪反抗征收粮食税的人，他们以后受到政府飞机的猛烈袭击。接着又在宁夏省发生一起暴动。

还有一起披露报端的暴动发生在云南。

例如：兵工厂在倒闭。经济部长告诉我，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中国钢铁制造业能正常开工，因为政府对兵工厂的预算无法满足政府自己所制定的钢材价格！另一个例子，重庆上游50英里处那个庞大的煤矿也倒闭了——不能开工的原因是无法接受政府制定的煤炭价格！

再例如：人们熟悉的面值200元的中国法币，一年中，我一直认为它等于1个美元，但在1944年初这样的一张法币，被一张崭新的面值500元的绿色纸币所取代了。通货膨胀的狂潮冲击着每一个人，我自己也不能幸免。我也开始囤积一些饭锅、绫罗绸缎和刺绣。到1945年，我也学会了在背包里塞满钱出去做货币交易。坐在黄包车里，两膝夹住背包。到了一家商店，我就递上长方形的一迭钞票，象一个人的拳头那么大——店员们并不打开包去查钱验数，只是查查多少捆就行了。尽管我的工资是用美元在纽约支付的，但是我置身于中国，与我的银行户头远隔重洋，我也感到恐惧了。我所领教的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也和我所经历过的失业和经济衰退同样可怕。大灾荒给河南农民带来了灾难，通货膨胀也让城市和大学里的中产阶级尝到了。它扫荡了所有的忠诚，否定了所有的努力，人们不顾一切地去活命。

不可逆转的颓势对关心重庆政府的外界力量——从共产党到日本人或美国军队都无法隐瞒。

在1943年夏天，共产党中断了同蒋的摇摇欲坠的政府进行任何严肃谈判的尝试。周恩来在重庆的办事处里又增派了

林彪将军，他后来成了共产党的最高统帅；也许是毛泽东认为林比周更能强硬地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但可强硬施压之处已所剩无几了。所以，在1943年夏天，以回延安协商为借口，从蒋处哄骗到手几辆卡车，周和林把他们的文件夹、箱子、铺盖卷及所有物件装了满满几卡车，摇摇晃晃地驶出了那个古老的曾家岩大院。他们从蒋那里得到了安全保护，但他们的党中央并不放心，直到传来他们已安全通过西安，正在驶往延安的途中才松口气。再一次见到他们二位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那是在延安。他们在那里厉兵秣马，准备去打垮这个他们没放在眼里的政府。

颓势也使日本人和共产党一样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从而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1944年初春，日本人发动了所谓的“一号攻势”。日本人那时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掉。但是他们想通过这一最后行动使他们自己也坐在谈判桌上——或者象东方的参孙① 那样，用他们的失败来撞塌中国的屋梁。他们打过黄河，深入河南境内，深知那场灾荒已使忠诚化为乌有；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农民都纷纷倒向他们那一边。然后他们从南方调集力量横扫在华东的美国空军基地，那是陈纳德设置的。诚如史迪威所预言，陈纳德对日本人的惩罚过重，蒋介石不能给陈纳德的空军基地提供地面保护。

在我看来，这个崩溃之势也同样隐瞒不过美国政府。那年的整个夏天，我一直在华东战区亲历了这场灾难。有时从

---

① 参孙，力大无比的希伯来士师，故事见基督教《圣经·士师记》。

我们自己的空军基地里撤退，有时同中国的步兵部队一起行军。

一进入这年秋天，我完全赞成了史迪威的观点：美国的政策必须旨在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政府和军队，如果真要战斗的话，要末把中国的事彻底放弃不管。如果我们担当不起放弃中国的责任，我们则要采取行动。那时我这个在战地的记者，并不知道，史迪威已经说服了美国政府。他的立场是正确的，但眼下已为时过晚，美国的政策已发生了变化。

美国的亚洲政策过去一直是传教士的目的和商人的贪婪的混合物。在中国，虽然传教士的目的在重量上已远远超过了商人的贪婪，但为保卫中国的民族利益，我们却招致了日本人的袭击。

当这种袭击在1941年到来时，华盛顿政策的制造者还把蒋介石看作一个可贵的同盟者，伟大的亚洲人力库主人，控制着无数简易机场的君主，对日本的空中战争最终必须在中国的这些机场上发动和实施。保卫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犹如英国于1939年对波兰主权的保卫——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这场战争也许可以避免，也许不可避免。

三年后，也就是在1944年，美国对中国的官方态度发生了全面的变化。

军事地图告诉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到1944年夏天，这幅地图让美国领导人看起来喜不自禁：一道道的蓝色箭头是表示美国装甲师越过法国扑向德国，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登陆，美国海军正袭击日本的领海水域，

B—29轰炸机开始对日本木纸结构的城市进行袭击。只有中国的军事地图令人沮丧，日本人渡过黄河，沿扬子江攻进南方，占领了衡阳，无情地横扫美国在华东的空军基地，那是花了几十亿元的投资和很多心血才建成的。说到空军的补给，蒋介石对驼峰口的申报量如此之多，陈纳德对美国空运能力的消耗如此之大，以致使美国在欧洲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巴顿和蒙哥马利之间的争吵。如果欧洲有足够的空军补给能力向双方提供物资，任何一方都可能在1944年秋天完成对德国的作战。美国为支持蒋而花费的代价是巨大的，然而蒋还是唠叨不休地说他受到了欺骗，华东的陷落不应归于他的无能而应归于美国的小器和史迪威的阴谋。

这个故事的另一部分是美国军事人员的密件快信讲出来的。一个团接一个团地，一个站接一个站地都在反应中国人无能、贪污、腐败。不仅仅是史迪威，而是所有的个人都在报告这一类的事情。来自各方面正增加的美国军队和顾问团的报告，都可以用德国的鲁登道夫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对奥地利军队的视察后所说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是在和一具死尸结盟。”在抗战初期，马歇尔曾应罗斯福的特别请求，告诫史迪威不要把蒋介石“作为一个部落酋长”来对待。眼下，罗斯福的善意，也受到曲解。到1944年夏天，他知道他必须采取行动了。

如果蒋不能有效的动员中国进行反对日本人的战争，那

---

① 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

么一定有别的人能够。当然罗斯福不能命令蒋从中国元首的位置上下台。但是，他可以叫他靠边站——在1944年7月6日，通过电报，罗斯福催促蒋介石把所有的中国军队都交给那个蒋介石最厌恶的美国人——约瑟夫·史迪威来指挥。这是一件棘手的事，蒋介石进退维谷。一个月后，罗斯福又给蒋介石拍来电报，说他正派两位美国名人，一个是唐纳德·奈尔逊，前军工署署长，另一个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前陆军部长，来加速一项提议的谈判，这个提议将把蒋介石降到一个没有权力的名义首脑地位。

从历史文件里可以看出，事件的进度，正在加快。当日本人打到华东时，重庆一片惊慌失措。到1944年9月12日，蒋原则上同意史迪威出任中国地面力量总司令的提名。第二天史迪威在他的重庆司令部里接见了两名共产党密使。9月14日，史迪威飞往华东，察看那里朝不保夕的美国空军基地，去同陈纳德和张发奎协商对策。

史迪威于9月15日赶回重庆。一天前，他下达命令炸毁美国在桂林的庞大空军基地，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这同陈纳德——蒋介石一年前的战略相仿。他向蒋报告了华东中国部队指挥的混乱情况和日本人在缅甸北部的另一个攻势。蒋和史迪威在应付这些战略威胁的做法上产生了分歧，蒋要史迪威的美、英、中联军停止为打通缅甸公路所作的进攻，把部队空运到危急中的华东前线去解围。史迪威则要蒋介石动用他个人的20万反共储备军来应付华东的局面。他们相互僵持不下。史迪威用无线电向五角大楼的马歇尔将军报告，说

华东的局势"没有希望"，桂林将成为"一个老鼠夹子"，这个最高统帅"不听劝说，只是重复一大堆他自己发明的歪理谬论。"

然而，马歇尔将军当时并不在华盛顿，也没收到史迪威的电报。他那时在魁北克，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邱吉尔参加就彻底进行这场战争而举行的英美盟军第八次参谋长联席会议。史迪威的战争电报和对蒋介石反应的简洁描述被转到马歇尔那里，再转到罗斯福手中。

可怜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在总统大选中指导着全球性的战争，在投票日前的六周里须解决亚洲的全部问题！美国人出于对中国人的轻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一直把蒋介石看作一个部落酋长。史迪威也是如此；罗斯福最倚重的军人，支持史迪威的马歇尔也是如此。蒋和中国在华盛顿的朋友们不是大肆许愿，就是向白宫哼叨不休，足以使任何一位总统心烦。

既然如此，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4年9月18日作了答复：在邱吉尔、英国人、美国人和联合参谋部的全力支持下，直接给蒋介石回电。

罗斯福一定疲倦不堪。他给蒋的电文比任何一位美国国家元首给一个友邦或盟国的国家元首的电文都直率——即有赫德森河流域人那种妙不可言的势利风格，又有地主对马伕、女仆或迷途孩子的呵斥语气。这是一封600字的电报，命令蒋介石立即把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负责，全文如下：

"在研读了关于中国局势的最后一批报告后，我的参谋长

们和我本人都确信，您正面对着一场我所害怕的，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出现的灾难……如果您不向您在缅北的部队增派人力，如果您不能向萨尔温江的武装力量提供支援，又不能把这些部队撤回来，我们将失去开辟通往中国的大陆交通线的一切时机……关于这一点，您自己必须做好准备去接受这个后果并承担您的个人责任。近几个月来，我反反复复地敦促您采取激烈行动去迎击这个正在朝中国和您日益逼近的灾难。但现在您并没有把史迪威将军放在指挥中国武装力量的位置上，我们正面临丧失在华东的那块重要地区。那里情况紧迫，灾难性的后果实不堪设想。我在本电里以彻底的坦率表达了我的思想，因为所出现的事件对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很清楚，您和我们为拯救中国的全部努力即将被进一步的拖延毁于一旦。罗斯福（签字）”

目前是罗斯福自己把蒋介石当作一个部落酋长来看待了。此外，他还指示，此电不要通过国务院发给蒋介石，因为与国务院打交道的是中国外交部，他们会习惯性地把美国总统给他们那个最高独裁者的电文降温。罗斯福命令，此电直接发给史迪威——特别指示由史迪威亲自转交电文。

恐怕再也挑不出比史迪威更面无表情的送信人了。他那时是美国的四星上将，受了那个口是心非、虚情假意的蒋介石长时期的窝囊气。9月19日下午5点半，史迪威到了那个最高统帅在黄山的乡间别墅①。这个最高统帅正在会见军委

① 蒋介石的黄山别墅在重庆南郊。

会的头头和美国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他是就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的细节问题来进行谈判的。

史迪威在走廊里停下来，把总统的电文内容告诉了赫尔利。赫尔利吓坏了，他相信，那天下午，再过几分钟的时间他就会得到这个最高统帅移交指挥权的许可证或印绶了。但史迪威持有亲自转交这封电文的总统命令。他们几个人在一起饮了几分钟茶水，然后，史迪威宣布，美国总统有一封给最高统帅的个人电报。直到那时，独揽美国的支持和承认，一直是蒋介石对付他的群臣和隶属军阀的最大资本。眼下，面对他的僚属，他要蒙辱含羞了。他迅速读完了电报的中文译本，然后说，“我懂得了。”宣布闭会。

史迪威的日记记下了那天晚上的情景，“我把这支红辣椒做成的鱼叉递给花生米，只见他长叹一声，颓然倒下。这把鱼叉正刺在这个无用家伙的太阳穴上。这是致命的一击。但他既没有生气，也没有讲话，连眼睛也没有眨一眨。他只是对我说了一句‘我懂得了’，就默不作声地坐下，一只腿轻轻地摇曳着。现在我们再也不受这个‘部落酋长’的辱骂了。我回到家，放眼朝嘉陵江对岸望去，万家灯火使重庆一片光明。”

史迪威在向西点军校的学员和美国的将军们授课时，是谨小慎微的君子和礼仪周全的大师。在所有与中国人交往的仪式上，他总是彬彬有礼。但在私下，他总有一种孩子般的幼稚，总好表现出马克·吐温笔下的那种康涅狄格州的新英格兰人抑制不住的激动。同他共享这种激动的只有他的太太。

三天后，他在一封给史迪威太太的信中，写下了几行打油诗表达了他的胜利喜悦：

“我为报仇等了很久——
我的机会终于造就。
我盯住花生米
一脚把他踢进阴沟。
这把老鱼叉正整装待发，
目标和时机一点不差，
我握住叉柄
朝他身上穿刺了一下又一下。
这个小杂种战战栗栗，
闷着头一言不发。
他的脸青筋突出一阵抽搐
挣扎着讲不出话。”

这首诗还有好几节，这里没必要全部照录了。

虽然，史迪威对他在这个最高统帅的宫廷里所引发的地震一无所知，但是，这正是他所期望的。长期以来，他对蒋介石践踏别人尊严的事见得太多了，知道这个独裁者是如何随便杀人的。他自己这一回也变得感情麻木了——忘记了蒋介石的个人尊严是如何重要。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里，任何领袖人物最可宝贵的胜利标志便是尊严。

由于他把蒋介石的心理状态置于脑后，一无所知，所以，当一周以后，也就是在罗斯福收到蒋介石电报的9月25日，

史迪威获悉后大吃一惊。在这个电报里，这个中国的最高统帅最终拿出了杀手锏：要么由他，要么由史迪威来指导中国的事物，蒋对罗斯福说，但不能由两人共管。因为他蒋介石，是中国的首脑，那么，美国人史迪威就必须滚蛋。“对我来说很明显，”蒋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写道，“是史迪威将军没有同我合作的诚意，而且他认为他是事实上被指派来指挥我的。如果您愿意把您自己放在我的位置上，我相信你会明白我今后怎么能指挥得动史迪威将军，那么在借重史迪威将军的危急关头，又怎样能实施我的指挥。如果不顾情面和资格，我只会任命史迪威将军做一个野战军司令，我明知这会招致不可避免的灾难。”

确实，蒋介石是会导致灾难的。蒋介石的个人灾难倒是中国的福气——但无论何人都不能希望任何政治领袖会接受阉割，尽管于他的国家是大有好处的。蒋介石感觉不到这种必要，并进行了抗拒。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的这个僵局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从1944年9月24日至同年10月18日——而最终，是政治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后果。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这里所讲的前面几页的几乎全部故事。我是根据文件、档案、信件和职业历史学家35年来所发表出来的学术论文来撰写这些故事的。互相关联的几个有益的历史画面比我在1944年夏天进行实地报导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更容易被理解。事件和决定之间的联系是历史学家驰骋的天地。但是，真实的联系须待数年后当事人完全从事件中解脱出来，才会变得清晰无误。所以，对于那些使我从那个

夏天里铺天盖地的迷魂阵中清醒过来的历史学家们，我一直是感谢不尽的。

在1944年，我一直从事着记者的职业。一个年轻的记者在战争中最容易接受的劝告，就是尽可能的去靠近枪炮的轰鸣。距离战斗的现场越近，对战争的场面越感到紧张，他写出的稿件也就越有用处。如果他只是蹲在司令部里纸上谈兵，那么，他就必须接受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描绘得比他生动得多的那个现场实景。

我在1944年夏天所见到的，就是事件中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时我冒着7月的酷暑，步行朝前线进军，一直抵达衡阳上方的山上，观看中国的第六十二军，进行的反击战。为进行这场“大规模的反击”，它建立了老式的75毫米山炮炮群，每门炮有20发炮弹。我观看他们开火：当他们毫无目标地放完了20发炮弹，反击战就宣告结束。只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炮弹都倾泻在铁路上了，这是蒋介石在华东控制在手的唯一铁路。但是在独山，蒋还有4万吨的军火囤积着。蒋一直保留着这些军火作“应急”之用，后来还是被美国人销毁了，以防落入日本人之手。

美国空军为华东的这条铁路线提供了空中掩护。有一个情景看了后真让我丧胆：在我们的空军掩护下，军用火车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停了下来，司机下车抽大烟去了。这列车上的美国军官让我去做点工作，因为我会说中国话。我同意了，大步向前，找到那个司机，把他训斥一顿，硬把他推进司机室，火车才开动。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美国人并没有被

同意用地面配合的方法支援这个特殊的前线。而当我们挽救了军阀薛岳即将崩溃的防线时，蒋介石竟抗议我们的援助！我知道蒋偏爱美国的空中支援，那是陈纳德的方式，讨厌美国的地面支援，那是史迪威的方式。但那年夏天让我搞不懂的是，蒋对空中支持的要求竟到了过分不现实的地步，他要求控制我们的B—29轰炸机，那是后来把日本夷为平地的战略空军力量！这种要求，我后来得知，遭到罗斯福的断然拒绝，但他还是答应把蒋介石的头衔由中国战区盟军司令提升到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我知道，在保卫华东的战斗中，空中和地面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我懂得这一点还是在我意志麻痹的时候。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和一个营的中国部队蹲在排水沟里，挥汗如雨，叫苦不迭，这时美国的P—40飞机朝我们俯冲过来了，开火扫射，来回俯冲——我知道这个中队的飞行员并不是想杀害我，而是不清楚哪里是前线，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在据守。我知道，蒋犯了好一阵杀人狂的毛病。他先是在长沙处决了一个指挥炮兵部队的将军，以后又处决了中国第九十三军的军长。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对史迪威阴谋反对他的猜疑已到了多么深的程度，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蒋最终会再次解开这个疙瘩的。

在野外，什么事情也理不出头绪。当陈纳德和史迪威在桂林与张发奎将军会晤时，我就坐在外边的房间里。当时对此一无所知，若干年后才知道，张发奎那时正表示要同蒋介石实行决裂，只接受美国人，也就是史迪威的命令。我只知道史迪威那天下达了被陈纳德执行了的命令：炸毁桂林的

飞机场。紧接着在那天夜里，到处爆响着疯狂、壮观的惊雷，到处是奔驰唐突的火焰，机场跑道上的石头发生着无节制的爆炸，那是我记忆中的一个火光最亮，火势最旺最红的夜晚。

不久我就从这场战事中脱身，住进了昆明的医院，置身在这个故事之外了。在《时代》杂志的版面上，华东的溃败是不能与欧洲的伟大胜利并驾齐驱的，巴黎已获得解放，前锋部队已到达莱茵河地区。所以，我在医院里拖延着，等待着另一名战地记者来到中国，与我共同经营《时代》在重庆的记者站——她就是安纳利·雅各比，我的老朋友梅尔维尔·雅各比的遗孀。在同她相见的几天中，我立刻坠入了爱河。她的到来，使我立即离昆明飞返重庆，我觉得我应使用我在前线获得的时间稍事休息，品尝一下罗曼蒂克的生活。

但是后来的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刚飞到重庆，雅各比和我都被卷入到一场飓风眼中。我是《时代》杂志记者站的首席，是他们在亚洲大陆上的资深战地记者，她是来报导重庆和中国的政治事务的。但这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在9月的最后一周和10月的第一周里，政治与战争被隔离开了——或出于蒋回击共产党人渗透的企望，或是赫尔利为逢迎史迪威的目的而作的外交手腕。我们都被蒙蔽在重庆城史迪威危机的迷雾里。尽管现在的历史学家们能够既理智又清晰地看待此事，但那时我们俩人谁都没有，甚至连史迪威本人也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甚了解，浑浑噩噩。

那年9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深入刺探了这个发生在重庆

的秘密故事的内幕，时值罗斯福、蒋介石和史迪威三角僵局的高潮。

它使我花费了几天的时间才认识到，眼下这个丑陋的故事正越出流言的范畴，而载入历史。从前我回到重庆总象进入到一个流言蜚语的世界，重庆就是用它们来调剂气氛的。10月里前几天的流言形形色色。蒋介石和一个护士睡觉的传闻已因他果断的否认而中止。但是，蒋是否真正用手杖打了秦作人的脑袋然后把秦锁在一间新兵训练的营房里？秦是征募总署署长，新兵训练的营房里条件很差，新兵不堪忍受。对此，一个内阁部长颇为懊丧地告诉我说是真的。"但是，"他又补充说，"这是20年里最高统帅第一次动手打了一名高官。"难道目前的中国只剩下1万辆卡车能开动使用吗？不，不是的，那个交通部长告诉我：中国有6,000辆汽车能使用——3,000辆在军队服役，另3,000辆遍布全国各地。薛岳将军是否如有一些人所说，在同日本人暗通款曲？最高统帅本人是否如另一些人所说在同敌占区的日本人往来以对抗美国的压力？淋巴腺鼠疫已在福建发生，它是否在往内地蔓延？它能否会受到阻止？阎锡山和共产党在山西省又打起来了，能否采取什么措施来制止这场厮杀？如减少美国给双方的援助等等。

那是重庆的一个酷热难忍的秋天，身上又潮又痒，谣言到处流传，产生后再被添枝加叶。它们只能在一个没有开放的通讯系统的社会里得以横行无阻，而那里的忧虑和高压政策把谣言哺育到狂热的程度。然而在回到重庆之后，掸去所有谣言的浮尘，我开始觉得某些重大事件的真实性是不可

辩驳的：我们美国人正在被迫进行着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日本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他们真的扫荡了我们在大陆上的基地。很明显，我们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作出选择以确保我们的这块大陆据点。

在我回到重庆的第一周里，听到的第一个谣言，是说史迪威亲自去延安拜访了共产党！我马上就了解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实是当时美国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途经重庆，支持了史迪威的应允许美国军队在共产党华北的首都延安设立观察站的要求。这个观察站的名字叫迪克西使团，任务是联络，已经在9月底开始工作了。（直到后来，我才从历史学家那里获悉，华莱士一面支持史迪威反对蒋介石，建立了同共产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支持蒋介石反对史迪威，督促罗斯福撤换在中国的史迪威。）史迪威本人也确实在重庆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

美军司令部并不是对所有正发生着的事情完全了如指掌的。但是，逐渐地，我从司令部里的朋友那里了解到那个被史迪威认为已经稳操胜券的盟军计划，那就是：以稳扎稳打的速度，组建30个中国步兵师，由美国人指挥，由他实行装备，使之现代化，再由他亲自调遣。那时候，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把所剩下的美援分拨给蒋介石一部分——同时也分拨给所有抗日的其它中国部队一份。总而言之，史迪威要取消蒋介石独吞美援的特权——同时，勿庸讳言，也要把美援的一部分拨给受忌恨的共产党分享。除此之外，史迪威还提议，直接飞往延安，使共产党的部队也置于他个人的统

帅之下。对史迪威来说，只要抗日，不论是谁，都是美国事业的朋友。

蒋的情报机构肯定把史迪威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活动报告了蒋，它也一定汇报了象张发奎那样的离心分子想直接同美国人结盟的事。对蒋来说，前景是清楚的。日本正处在被美国的歼灭之中。那么中国的前途，现在就取决于他和毛泽东之间的争斗了。不需要美国人对这场争斗指手划脚，除非帮助他——所以，史迪威必须滚蛋。

那时，我正在前线，对那种封闭式的战争不是现在的美国士兵、记者或军官们在他们被派驻的卫戍之地，阅读美国政治教程时所能想象出来的。回到重庆，我进入了一个政治世界。再没有什么比重新打开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之门这件事情更令人吃惊了，这个谈判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恢复的。目前，共产党也同国民党一样寸步不让；他们不仅想得到对他们政治独立的完全承认，而且想得到对他们控制地区的承认。眼下这个地区已扩大到被日本人征服的后方了，而且还有发展的趋势。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王世杰。他在声明中断言，国民党政府没有理由软弱到去答应什么承诺。国民党政府只要进行为期一年的彻底准备，就足可以为人民建立有效的政府。这是同共产党进行竞争的唯一途径，至于别的——他只是耸耸肩膀而已！

回到重庆后两周，我也没弄清楚那些不胫而走的流言蜚语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史迪威还在其位吗？蒋介石还在其位吗？罗斯福站在哪一方？美国是要计划同共产党结盟吗？蒋介

石是否威胁要投靠日本人？

在10月16日早晨，那是个星期一，我和《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应邀去采访史迪威。

直到现在，我才懂得，这次邀请与史迪威的传统做法有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在气氛冷峻的司令部里，他坐在写字台后边。司令部设在一所能看到嘉陵江风光的平顶别墅里。看上去，他突然变得虚弱不堪，讲起话来郁郁沉思，满面愁容，骂不绝口。我记得他不时往胳膊上乱抓乱挠，那是因为他在穿过缅甸的丛林时感染上了疥疮。他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不是在向我们发泄怒气，而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他的观点。他说，必须有人知道真相。我们暂时还不能发表他所讲的一个字。但几天中，可以进出他的司令部，读到华盛顿方面发给他这个战区司令的"仅限阅读"级的电报。当一切事情都水落石出时，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把这个事件告诉给美国人民，取得他们的理解。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美国的新闻界是政治诉讼的最高法庭——这样一来这个人可能要违背军事保密誓约和对乔治·马歇尔的个人忠诚，而把他的事件交付给未来的舆论法庭。他想要我们知道的是，用历史学家的术语说，"事件的本来面目"。

再过几天，史迪威就要被解除指挥大权了。须臾之间，我发现他象一个被剥去军衔的老兵，一夜之间枯萎了。他依然佩戴着四星上将的肩章，这是那个时期罕见的荣誉。他的命令仍从黄河之滨下达到中国大陆、缅甸的丛林、以至远在印度甚至卡拉奇的坚毅的美国军队。这个广袤的大陆面积已

经超过了美国本土。在这几天里，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去指挥出击、退却、厮杀。但目前，显然，他的意志已经垮下来了。

他想让我们知道的是，从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一天起，"这个不学无术的狗娘养的就不想再跟日本人作战了。"他连续列举了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这次战争中的每个重大失误都可直接追溯到蒋介石身上。"史迪威下达的命令，被蒋介石顶了回去；用电话传达蒋让前线部队进行攻击或退却的命令，蒋介石说根本就不知道。说谎，盗窃，囤积，把所有的作战物资都囤积起来，供应为数不多的几支政治上可靠的部队，去进行未来的反对共产党的内战。接着，史迪威讲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喜爱；当这些军队和人民吃饱了，训练好了，又有正直的人去领导他们，他们是多么可爱啊。他想做的一切就是帮助这些人民。然后他以惊人的朴实，向我们讲了他那时的要求：具有调动、替换、部署、指挥在中国的任何部队的义务，以及"奖、惩、升、降"的职权。那么以后呢，就是扩大他的职责：我们曾希望在1944年秋天就结束欧洲的战争。但由于德国人的坚持，没有获得突破。或许要六个月，可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下一年了。与此同时在攻进日本之前，我们不能再让日本人向中国转移抵抗基地，不让他们从本土转移到大陆上，因为华东的抵抗前线已经崩溃。为了把日本人赶回老家去这个中美两国共同的目的，中国人必须学会抵抗，学会组织和指挥军队。史迪威等得不耐烦了。"我们不希望被说成只会在前途面前说三道四，"他曾在日

尼中写道："如果我们想去创造前途，我们就必须朝前途迈进。"象一个历史演员那样，他所进行的那次迈进为时过晚，迈进速度又太快。

执行这场使命的漫长旅行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我那时所崇拜的人，现在看来是一个政治上的幼童：这个人按照西点军校古老的荣誉准则，追求办事的效率，当去实现美国希望他们达到的目的时，却置身于一个以另外一种方式办事的世界，一个性格上过于自负，方式又陈旧得无以复加的正人君子。史迪威发现了变革事物的必要性。但随之又发现，要变革中国，远非一个美国人的历史经验所能胜任的。他一步一步所追求的，就是撤换一个于我们的战争目的无所作为的亚洲领导人，再配备一个能以美国的方式实行有效领导的政府。然而，政治不允许这样做，尽管那时美国势力还处于顶峰。美国将被迫面临同亚洲所选择的领导人打交道的问题——要不就从这些领导人中脱身出来。

我又去了几次史迪威的司令部，通常是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一起去的。在那一周的周四周五周六我们都在那里的地下室里，阅读我们过去所不能读得到的电报，得以观察远方的罗斯福。他是我的另一尊政治上帝。他正慢慢的接受政治现实的优势，以便取代史迪威的军事现实。周四，没有作官方的公开宣布，罗斯福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命令他立即回国。周五，中国的一个小官员来到司令部，史迪威正在收拾行装。那个小官员以那个最高统帅的名义，向史迪威授予一枚给外国人的最高装饰品：青天白日大勋章。史迪威告诉

助手转告那个官员把它放下。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和最高统帅共同饮了茶，第二天他就要动身了。

他在周六下午离开。只有他的几个参谋人员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为他提着行李和公事包，史迪威则手握他的战利品，一把日本武士军刀；那刀同他那矮小的身材相比，显得太长了。在机场上，前来送行的是宋子文，他即将担任中国的行政院长了。宋子文是史迪威主张中国政府应当改组的主要受益人。一辆游览轿车在阴暗的天穹下，冒着蒙蒙细雨，泥水四溅地开了过来。从车里走出了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用优美的姿态和对等的礼仪，赶来为这个曾一度要把他解职的美国人送行。史迪威接受了他们的致意，转过来对他的个人助手说："我们在这儿还等个鬼呀？"然后钻进了机舱。阿特金森也和他一起钻了进去，象所有《纽约时报》的人的传统作法那样，他要第一个在最有分量地方对这一事件进行报导。我偷偷递给阿特金森一迭避开了新闻检查的文稿，由他转交《时代》杂志。所以当史迪威的飞机在跑道上起飞时，我成了留下来和他挥手告别的最后一人。他离开了中国。

只是几年前我才正确地认识史迪威。他来自的那个传统一下子都突然消逝了——这种传统是：美国人强烈地认为，我们美国人是善良的人民。不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相信作为美国人，'带来的只能是美德。为史迪威所不能想象的是，对美国有好处的东西怎么会对别的民族造成坏处或过错。可是，在那以后的许多年里，美国的大使们，将军们，和官员们，一个个象无恶不做的间谍似的，一次又一次地想改革政治，

改换政府，一次又一次而去帮助扶植或清洗外国的大小元首。这是我们实行太晚并且到现在尚未入门的一个外交课题。史迪威是为了坚持我们的利益，要求对一个大国元首进行政治清洗的第一个美国人。这种政策的傲慢的姿态使我困惑不解。然而，反过来说，在史迪威事件中，我了解到他是绝对正确的。如果蒋介石在那时被拉下了马，那么，对中国、对美国、乃至对于世界，都是一件大好事。那时如能这样，那么对于建立一个有较多的人道，较少的敌对，既象继蒋之后的那个政府讲究实效，又比它富于宽容的一个政权，多少还是有些希望的。

几年过去了。到了1946年，在我纽约的家中，史迪威来访时，叙述了他离职前的情景。“蒋介石，”他说，“是个想用暴力同理想进行搏斗的人。可他并不懂得这个理想，他也不懂得怎样去使用暴力。”

在那个周六下午，在那个下着蒙蒙细雨的重庆机场，他是不能说这番话的。我也不能给予系统的概述、报导。在这起史迪威事件的危机中，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方能见分晓。据我所知，甚至就在那时候，使蒋介石最为惊恐不安的，既不是日本人在1944年的胜利，也不是史迪威暴躁的指挥作风，而是史迪威欲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努力。这些革命者在北方，即所谓的延安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

所以，我觉得，在蒋斩断美国人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微弱联系之前，我应到一趟北方。我知道，象所有的战地记者都知

道的那样，延安人并不仅仅是被远方的美国自由派所描绘的土地改革者，相反，他们是一种日益膨胀的势力，正迫使美国的决策机构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他们可以使人们为事业去牺牲，可以让日本人週缩，可以实行统治。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可供借鉴，也有很多的东西可供学习。

第四章

延安：革命探密

我在重庆机场满是泥泞的跑道边上向史迪威挥手告别时，是1944年10月21日，一个周六的下午。

目前，我知道我必须加快速度了。

随着史迪威的离职，再过一周或十天，一位新任命的美国指挥官就要到达中国了。美国大使馆里一片混乱，没有人发号施令。中国人，在轻率地赶走史迪威后也受到了冲击。他们虽然还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处罚我或中止我的活动——但很快，他们肯定会这么做的。那天夜里，史迪威的参谋人员仍然控制着美军司令部。我知道，一架美国邮政飞机第二天就要起飞，到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去。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我的朋友们会带我到那里去的。他们这样做了。第二天下午，淫雨霏霏，我们飞往延安的飞机起飞了。

我们沐浴着阳光，在黄土高原的上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飞行——先是四川的山峦从我们的脚下向南一晃而过，接着是长方形的西安城墙从我们的机翼边急速闪过。再接着便是黄褐色的山丘。其中有被削去山头的土山，有一块块褐色和黄色的土地在干燥的秋天里横卧在山坡上。最后看见的一座孤零零的刺向蓝天的黄色宝塔，以及荷枪的哨兵，构成了延安的地物标志。地面上，有三条小溪从沙地上流过，在一个冲沟处交汇，使河床渐渐拓宽。我们的飞机在这块冲沟的上方盘旋。顺着机翼的一端朝远处望去，面对着我们的那个山坡上——开凿着数以百计的窑洞入口，都是椭圆形的，象一幅蜂窝的全景图，乍看象是匪巢。飞机在四周都是小块菜地的简易机场上反弹落地。我来到了延安。

时间，以其神奇的力量，使一切伟大的事件都获得澄清，使一切久远的事件去掉了繁文缛节，暴露了历史和决策的本来轨迹。我是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到延安去的，去撰写一部关于政治和势力集团的报导。我在延安逗留了三周，那里正发生的事情是非同寻常的。一场革命正初具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准备宣布它的出世；共产党领导人经过全国的筛选，正从地下状态云集延安，筹备其自1928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情还不仅如此。在那几周里，由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离异以及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分歧而造成的直接灾难性后果，中国的共产党人正准备拟出一份完整的，也许是永久性的与美国结盟——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他们所希望，我们中的有些人也希望的方案，並准备把它坚持

到未来的年月。如果这种延安气氛继续下来的话，或许就没有朝鲜战争，也没有越南战争了。

那几周是美国的战争目的和中国革命共处的蜜月时期。蜜月的代理人，即联姻的牵线人，是美国一个年轻的外交官：小约翰 巴顿·戴维斯。他在中国出生，父母都是传教士，刚刚三十六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一个轻巧自如，举止潇洒，善于词令的外交界正上升的新星。他自己要单枪匹马地进行历史的探索。我希望对我亲密的老朋友约翰·戴维斯没有伤害地说，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也象那时的我一样对美国的政治天真烂漫；但他因为那年秋天在延安抒情诗般的日子，饱受的羞辱和谪贬之苦远远超过了我。

戴维斯和我都是在那个星期日下午乘同一架飞机飞抵延安的。我的旅行是为了报导。对于他的目的，他没有说明。我们的友谊是亲密的，但在那个年代里，象戴维斯那样的外交官对象我这样的新闻界朋友是严守机密的，我也不敢冒昧打搅。我们在延安机场分手后，他下榻在美国军事观察站，即迪克西使团里，我住在共产党的民用宾馆里，相距仅一英里。在他逗留的两周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见面，既有友爱又有嬉戏，同时都在那个山城里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现在已成为传说的追求。但只有到了若干年后，所有的文件都被公开发表，他也写出了他的辉煌回忆录《手牵龙尾》，我才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才完全明白了那时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这样的情况，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叫“天高皇帝远”。那一周，天，实在是高；皇帝，根本就没有。没有人指使约

翰·戴维斯去主持美国同中国革命的这场联系，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重庆都没有人指使他去。从技术上讲，戴维斯是国务院的政治官员，是隶属于军事长官史迪威的政治顾问。但那个周末，既没有史迪威，也没有美国的军事长官在场。所以，戴维斯是在进行他自己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对美国有用吗？他们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

戴维斯在抵达的那天深夜就和毛泽东、周恩来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晤。如果我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沿海登陆，共产党能否给我们诸如切断铁路，动员农民之类的支持？这是一个合理的探询，但却是在一个混乱的时刻进行的。共产党对蒋介石和美国在史迪威问题上闹翻的事一清二楚，对国民党军队腐朽和溃败的情形甚至比谁都清楚。他们正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他们所有的那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有的从地下状态，有的从游击抵抗区，有的靠徒步行军，纷纷回到延安，准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6年以来的第一次！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都长期居住延安，但林彪、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都是刚刚到达——他们是征服未来中国的著名元帅，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功臣。而戴维斯，来这里是要探讨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还有结盟的可能性！在那个大好时机里，戴维斯本来不应该出场。我也不应该。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革命，正历经磨难，由胚胎进入定形。我是唯一的新闻工作者，受着老朋友周恩来和老相识叶剑英的庇护，也受到了我和戴维斯抵达的事件而引起的虚假重要性的掩饰。此行的伟大目标是探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

之间的结盟，我是作为该目标的一部分，受到接待的。

在延安的那几周，充满了欢声笑语，令人惬意。我们这些人因为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幻想至今仍受着批判，但现在能为那几周的生活要求原谅了。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与现在不同，我们并没有受到欺骗。友谊的酒杯觥觥交错，朱德和周恩来可以不经报告，安步当车，象朋友那样到美国观察站走访，一聊天就消磨几个小时。他们的同志们：搞地下工作的人，伤痕斑斑、历经战斗的老战士，散漫的司令官们，虽然外表看不出来确是凶猛顽强、运筹帷幄的游击队指挥员，都纷纷来到这里参加那次伟大的代表大会。这是一段亲善的时期——人们豁达开朗，热情信任。20年以后，他们就互相清洗起来，残杀起来了。以后，他们就率领部队去杀伐美国人了。但那时他们之间相互信任，渴望与我们交朋友却是真实的。我不能想象，这里就是象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时的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尼宫①一样的地方。当然，美国人，只有极少的例外能象约翰·李德②那样不受欢迎。延安，处在那个过渡时期，把我们作为同盟者和朋友进行拥抱。

我住的宾馆也是一套窑洞。每天早晨，我被军号的声音唤醒，银铃般的音质在山峦里回旋激荡。早饭是黑面做成的小面包——切成片烤黄后再佐上鸡蛋。我散步出来走到山背上，俯视着这块谷地，发现长着长毛的骆驼队正从北方的沙漠走近，脖子上的铃铛发出丁咚丁咚的响声。还有成群结

① 俄国十月革命的指挥部所在地。
② 约翰·李德（1851—1920），美国记者兼诗人。

队的骡子和骑马人。车老板的鞭子发出爆竹般的声音，人群在集市上川流不息。人民是健康的，有的穿着棕黄色的粗毛线织成的毛衣，有的穿着厚厚的蓝棉袄。共产党在那个时期，还认为士兵、官员、学生，都应该吃饱饭——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工作，才能以朝气蓬勃的步伐前进，才能与国民党僵化的官员和瘦弱的士兵形成对比。

一切都是健康的。但我又注意到在奢侈品中并不体现完全的平均主义。以牛奶为例：只供给医院里的病号和伤员，此外，牛奶还供应高级官员的家庭和孩子。我提出了这个问题：谁家的孩子可得到牛奶供给？

这一下子把他们窘住了。我不再往下追问了，因为他们是我的东道主呀。

我可以不受监护地到处走动。皮货市场也和制革厂一样有股臭味儿。我还到果树园和菜园里，在大路上留连忘返。就在我这样溜达中，慢慢弄清楚了两个权力中心的所在地，外观很粗糙，一眼就能看出。搞清楚后，我可以随意去采访他们，因为我被认为是一个朋友。党的大本营和军队的大本营是两个隐密的原子核，又是相互影响的两个系统。党的大本营距我的住处只有三英里——两座灰色的砖瓦建筑物，一座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一座是供开会用的大礼堂。在那里，我做得最多的是进行政治考察。军队的大本营是在另一座灰色的砖瓦建筑里，周围有一群较小的黄色的土坯建筑。还有一个叫梨园的花园，美国的迪克西观察站就设在那里。但据我来看，花园里边的无花果树要比梨树为多。我知道我进行

军事交谈的能力要比政治交谈的能力强，因为我的中文能消化掉平淡的、技术性的军事词汇。与此同时，他们政治中的微妙关节既是崭新的又是革命的，西方的语言还没有发明出恰当的术语进行转译。然而，终有一天，这座山城的语言会变成遍布全世界的革命的陈词滥调，并在60年代煽动起美国街头上的要求变革者。

一切事物都让人感到乐不可支，甚至就是现在，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矫揉造作之处。以朱德为例，他长着扁平的鼻子，身体粗壮，已五十八岁了。他是中国的红军之父，也是红军总司令。他到美国人那里串门，尝一尝西餐，喝点茶，聊好大一会儿才离去，好象时间不存在似的。有一天，在他的司令部里，我们一谈就是两个小时，他坚持留我吃午饭。我们刚坐下，他的总参谋长叶剑英进来了，和我们共同进餐。他刚和约翰·戴维斯进行完一轮谈判。一如往常在一起聚会之后，我们走进阳光充沛的梨园，用文字游戏逗乐。我们试着看谁能在一句话里使用"所谓"一词的次数最多——如："所谓"的重庆政府在"所谓"的蒋总统领导之下，正想把"所谓"的国民军从"所谓"的前线解脱出来，等等。我们都哈哈大笑不止，吃着冰冷的雪梨，从容不迫地饮着茶。

这两个中国人所指挥的军队基地遍布在从亚热带的海南岛到寒冷北方戈壁沙漠的广袤地域。但在我所游历过的地区内，从未见过象在这几周里所见到的延安人，看起来那么豁达那么乐观。我现在看到的中国领导人的脸色都是那么阴沉，如他们站在天安门检阅台上的照片所显示的那样坚挺、严厉，

我真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回忆起年青时代开玩笑和一块跳舞的日子。也许在他们懂得他们正在变化之前，权力就已经使他们发生了蜕变。那时，他们明白了，政权就意味着以严酷地相互清洗和相互残杀作为昂贵的代价。

在那些日子里，无疑他们是同志——呈现出一种自然、轻松的友谊和平等关系，但自他们掌握国家政权以来却抹掉了这种平等。午饭后，周恩来就邀年轻的翻译陈家康在一间大饭厅里同他打乒乓球，有时在有外国客人在场的情况下也这么玩。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相互取笑，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们曾长期共事，在长征中艰苦跋涉，患难与共，那时他们是兄弟。在那史诗般的10年里，他们赶跑了蒋，击败了日本人。眼下他们从反对侵略者的各个战场上回来了，都在为战时的重逢而欣喜不已，欢笑的浪花，充满信心的自鸣得意，在他们会面时此起彼伏。他们是第一流的统帅人材，是他们把一群衣服褴褛的游击队改造成为一支60万人的有组织的队伍，加上民兵为依托，已经超过100万人了。林彪即将去征服满洲和华北，彭德怀以后率领中国军队去朝鲜与麦克阿瑟抗衡。但他们后来都受到了清洗，林彪还遭到杀害（原文如此——译注）。

体现这种同志关系最好的时刻，是在党的大本营礼堂里举行的周六之夜的舞会。几把中国式的管弦乐器拉起来，腰鼓敲起来，口琴和纸糊的马梳就奏出悦耳的音乐，党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在地板上转起了快活的舞步。那时我也参加过这种舞会，一边跳，一边产生了思古之幽情，想起了我小时候

听到的老式的犹太人婚礼。对于约翰·戴维斯来说，这更象他青年时候所见到的教堂联谊会。朱德不跳舞，坐在桌子边喝茶，格嘣格嘣地嗑瓜子。但朱德夫人却象一个老祖母，要求和年轻人作舞伴。叶剑英把他三岁的女儿妞妞领来了。她和其他的小孩子们在一串椅子里跑进跑出捉迷藏，身为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也着迷地迈起了舞步。他的面部表情颇具有一些墨西哥人的特色，留着一副毛笔状的小胡子，操纵着他的舞伴在地板上跳着，根本不顾音乐节拍，一直迈着那种既象自由流畅的探戈又象优雅大方的华尔兹舞步。林彪喜欢跳狐步舞。美国士兵们也离开了他们在山上的观察岗位，应邀前来助兴。他们对跳舞一窍不通。有个美国人对一个中国姑娘做了个不礼貌的动作，紧接着便发生了周恩来走访美国观察站司令戴维·巴雷特上校的事，正式提出了抗议。周解释说，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允许的，除非那个美国士兵是真心实意地爱上了那个中国姑娘。

我之所以能回忆起那些乐曲，是因为在今天，它们看来象是一个处于低格调的文化溪流中一个旋律过渡点。五年前，在山西的山沟里，我听到过共产党的战士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歌词是中文的，曲子是“前进，基督的战士们”。目前是1944年的延安，他们的领导人跳舞所踩的曲子是从《扬基歌》和《进军佐治亚》两首曲子衍化而来的。38年后的1972年，当我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理查德·尼克松举行的招待会时，那支有才华的第一流的乐团，以革命的胜利喜悦，为他演奏的乐曲是《美丽的亚美利加》。但在1944年的中国，美

国的民间乐曲在中国流传甚广是有案可查的。当鼓点在那个周六之夜的舞会上咚咚咚地猛敲起来时，当那些戴着帽子，穿着厚棉袄的男男女女们踩在泥土地板上翩翩起舞时——我们也在这兄弟般的气氛中扬起双臂，直到深夜。

描述重大事件的历史文献都具有平凡的风格。以中国共产主义的圣经，《毛泽东选集》为例，其中有一篇伟大的讲话就是毛泽东在1944年10月30日的延安作出的。看那题目就够吓人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现在读这个经过修改已成为一篇国家级的文件，并不能给人以毛泽东其人那天讲话时的切身感受。这位主席那天下午步入会场，与会的是当地的官员。他们一起进入会议厅颇有点象一个美国政客参加威斯康辛州克诺沙市的医疗和社会保健人员的集会。毛走起路来甩开双臂；穿一身灰色的斜纹毛料制服，钮扣一直扣到脖子底下。一会儿，他出现在讲台上开始发表讲话了。进入正题之前先闲聊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几页笔记，以反问的方式进入论题，让听众思考，对所提出的问题找出答案。在进入严肃的说教部分之前，他使当地的保健官员听众都已专注于他的论述。他是个导师，他的主题是要求使用巫医、草医以及针灸专家，总之是全中国的自然药源，去解救军队和人民，因为军队和人民被剥夺了接受西方医药科学教育的机会。

我还记得这场说教中的两件事。第一便是惊人的随和，讲台上的毛颇有演员的气质。就我所见到过的美国的游历演说家行列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才能和毛相媲美。毛不时地

模仿，打手势，来回踱步，用双手卡腰，当讲到重要之处，么发出短促刺耳的声音，音量也慢慢放低了。他所讲的话我连一半也听不懂——但作为一个在其全盛时期的演员，他还是扣人心弦的。第二就是记得周恩来同其他领导人坐在聆听这场医疗说教的人们的最前排。周手里拿着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也许是在向毛表示他的忠诚吧，也许是在为其他人树立一个认真听讲的好榜样，他把小笔记本在空中拿得很高，前面就是毛，用这有点哗众的动作，写下这篇伟大说教的笔记，让这位主席和全体与会者看看他对这个伟大导师的敬意。

时机以及牵线人约翰·戴维斯的出现确定了当时的气氛。

时机的掌握就是共产党人对1944年一系列事件的洞察。他们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厄运。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解体，日本人在所有的省份里如入无人之境；而共产党人却尾追着日本人，组织抵抗运动。不管什么地方陷入日本人之手，共产党就感到是他们采取行动，进行组织的机会——组织发展之快超过了共产党的预想。六个月里，蒋丧失了25万军队，面共产党的兵员每个星期都在增长。眼下，他们已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了不少于16块的政治——军事基地，每块都称作“解放区”。其中有些解放区已控制了好几块长200英里宽100英里的地盘。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对这些解放区望而却步。解放区里的唯一政府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头等政治大事就是怎样把这些“解放

区”联成一片，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真正控制着9,000万人民并提供了保护的政府。正象他们所关注的，那个蒋介石的所谓“政府”已把它在华东的军队消耗完毕，而眼下只能在中国的西部，在美国的特别关照下苟延残喘。瞧，为了这一点，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跑到延安来了，在探讨共产党分享美国友谊的诚意。所以，当这些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延安云集的时候，更为重要的军事长官们也随之而来，共商召开16年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考虑成立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此外，史迪威去职的事件也促使他们考虑这个正在诞生中的新政府是否应当同美国进行大量的交往。

一个记者是不会放过他自己处于优越地位时的机会的。延安共产党的政治局里有13名委员，这是众所周知的。每个委员都有特色，每个委员都急于接受美国的拥抱，每个委员都豁达大度，乐于提供消息。这13人中我会晤了不少于11名，也许，可能是全部。那时同共产党领导人的会晤，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是在不慌不忙，悠闲的气氛中度过四个小时。我曾粗略地考察过那些共产党之父的人品及社会背景，这被后来的研究证实並不是很精确的。他们的名字，在西方的拼写文字看来，是一卷充满单音节词的挂轴，其中占压倒多数的是知识分子。他们中有8人是在20年代初直接从大学或中学加入革命的，这其中有毛、周和刘少奇（党魁，以后被清洗），只有4人出身于农民或工人阶级——朱德、彭德怀、陈云和邓发。博古既是个大学生又当过工人，既有大学生的文雅又能讲出工人的俚语行话，是个很富于幽默感的人。

新的代表大会后，这个政治局发生一些变化，增补了较多的军事领导人——这些未来的元帅们中的大多数也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背景，有的还是学者出身。

我在延安探索历史的时候，亲身了解到的事实之一就是：革命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並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但知果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理想和困扰普通百姓的东西结合起来，编织武器，就能把普通百姓引诱或罗致到一起成为一种革命动力。如果他们再聪明一点，向工人们和家庭们讲明道理，使这些朴实的人民认识到正束缚或正毁灭他们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他们就能动员起人民去改变现实，去杀戮，去猎取，去牺牲，变得残忍，同时知识分子又总能给予纯朴的杀人者和恐怖主义者以道德上的赦免。

政治局里的所有高层人物都愿意和我交谈。所有的人——除周恩来和毛泽东外——显然，都相信我是一个半官方的和态度友好的美国政府的报导工具。

政治局里的将军们都承认他们对现代炮兵运用的无知；对航空技术一窍不通；他们自己的参谋工作处于原始阶段；他们的通讯联络网也是初级的，依赖于从沦陷区割来的电线，或是用从日本人占领的城市里走私来的零件装配的无线电报机。但他们的情报工作却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准确地掌握日本师团的战斗序列；敌人的通讯网络；占领区的发射频率等。他们的情报工作可达到日本各级陆军将佐的书房，可依能力、出身、劣迹和合作态度对蒋的将军们分门别类。每次军事谈话所获的信息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能帮助你们，蒋石介却

不能。

这些谈话都有惊人的相同之处，没有矛盾，不论哪个将军讲的都是一个模式。在战争时期，他们就军事安排、计划、调动等对我吐露的坦率程度令我吃惊。一个人的谈话可以对全部军事谈话起到以一概全作用的是彭德怀。他是个身材矮小的人，光头，脸上已有了皱纹，他的眼睛总是斜着看人。从1926年起他就投入了战斗，现在已晋升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没有任何勉强，他对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的战争学。开始，好象我是火星上的来客一样，向我解释了一通游击战的理论；从那个理论谈到党在战争中所实行的军事战术的含义——同人民进行全面合作，这样才能使军队分散、消失在农村，融合在人民之中，然后再集中起来。接着，他描述了他的军事力量和他们的竞技能力——从广州城外短暂明快的游击作战谈到日本人占领下的海南岛上处于半组织状态，设备比较复杂的基地；一直谈到新四军在华中的正式成立。最后才谈到“解放区”政府在华北的成立。在华北，他一次可以调集一支12,000人的队伍投入战斗。12,000人是他调动的力量限度，照他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不能在一次集中时养活超过这个数目的军队，不论时间多长都不行。由此而引发了参谋队伍的结构，指挥能力的训练，在延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责等等。

彭回忆起他历史上20年前的红军时期（原文如此——译注），还记得留在国民党占领区里埋藏枪支和武器的地窖。在谈到反对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因地制宜

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时，他不时提起那年夏天"我们"是如何"以不多的伤亡"消灭掉六十一军两个团的（蒋介石的部队）。然后他把话题转到1944年10月的现在。他说，光八路军就有40万正规军，一直分布到华北地区的沿海地带，这些正规军可以通过家庭向它们所在的村镇里号召起超过100万人的武装民兵。"用这些力量，"彭说，"我们足以能协助美军在华北的登陆。"由此便谈起了他的破坏战术，他可以使黄河以北的任何一条铁路化为乌有，只要我们希望的话。他说，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共产党使日本人在华北的所有铁路交通瘫痪，程度之严重，使日本人费了三至六个月的时间才得以修复。眼下，在1944年，他们能干得更漂亮了。如果我们美国人想在上海和山东半岛之间的任何一点登陆的话，只要有充足的事前关照，彭说："我们能保证100万的正规军和民兵在现场给你们以支援。"每个共产党的司令员都在作着这个相同的保证，对戴维斯和巴雷特则使用了更为明确的措词。我作为一名美国记者，是乐于接受这个联盟的。

这些军事性的谈话发生在1944年10月末，在我看来，这些谈话是关键性的。但我的眼光仅局限于对中国战事的推想。在太平洋上，战争呈现出一种更令人陶醉的特色。10月20日是"攻击日"，是雷伊特湾之战①的开始之日；四天之后，这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上战争，就以美国人的辉煌胜利而结束。11月1日，麦克阿瑟率领101,365人在菲律宾海岸登陆

① 菲律宾列岛之一。面积约为3085平方英里。

——日本人庞大的舰队遭到歼灭，从此在历史上绝迹。在华盛顿看来，很明显，到11月中旬，再没有必要去寻求中国的支持以消灭日本，中国下降到一个三级战区的水准上也是安全的。在那个月里，在华盛顿，没有一个美国人需要理睬是决定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或者是二者都不要这个令人棘手的问题。那个悬系着亚洲的前途以及美国同亚洲的关系的政治决定——未被认识到是一场悲剧。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象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

我必须再一次抛开那些费了我几个小时又几个小时所作的谈话笔记，对一个又一个的会见进行跳跃式的回忆，经过一番剪辑，删去曲解的成份，以得到一个理想的关于思想的清单。

我应当从处于底层的两个较小的活跃分子，高、南二人开始我的故事。他们都是延安根据地政府里的负责人。“根据地”对于我合乎逻辑的理解——是一个往战争前线供应武器、后勤、给养和支持的安全之地。我把根据地望文生意地同那时被美国人称为“ZI”的“内部地带”一词联系起来。“内部地带”是指底特律、匹兹堡、纽约等地，我们的动力制造和训练场集中之地。在延安，情况则不是这样。高祖力和南汉宸坦率地告诉我，延安根据地运往前线的物资等于零，所

有的战区都是自我维持。延安输出的是人——即能够传播思想的干部。当然，延安也是有问题的，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属于实验中的问题——以财政和货币为例来说吧；自从1941年因为新四军事变同蒋介石决裂以来，就迫使共产党建立了财政部门。那年1月，当毛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发表后一周，即正式通知蒋介石，延安决定印刷它自己的纸币。货币的发行是主权的基本属性。由于不懂得这一点，共产党也遇到了建立国家的最重要的难题之一：财政、货币、储备。而到1944年，他们正培训干部输送到各解放区以接管财政和经济工作。

延安是一个正处于实验阶段的"自力更生"型的政府。没有人在美国的大学里接受过政治学的基础教育，他们就自己学会怎样去挑选合适的人选去管理另一部分人——或临时去学大量实施管理所需要的技艺。在一个山村里，怎样才能用纸印刷成书籍、传单和货币呢？他们正在靠自己学习掌握。那时候，点灯用的油都是传统地从果仁里榨出来的，一点燃，这些劣质油就在家庭自制的灯上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怎么办呢？怎么使这些油纯净些呢？怎样使铁融化制造枪支呢？怎样护理伤病员呢？总之，一句话，没有知识，怎样去进行革命，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府呢？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使这些人们在这块根据地上循环往复地接受教育，教会他们用新的方法思考。那时的延安地区居住着4万人。1万2千人是当地的农民和商人，其余的就是党的人了——积极分子，领导人，官员，占压倒多数的还是学生。学生们的年龄都在十八

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有的是逃离敌占区的城市或国统区的学校刚到达延安的青少年，有的是中等年纪，头发灰白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在接受文化课的补习，学习怎样用书面下达战斗命令。

延安是一个学校社会——医生的，护士的，指挥员的，政治委员的，党的积极分子的，各类学校应有尽有。政治局的成员人人都分工负责某个领域的思想训练。

刘少奇是俄国人所称作的那种奥尔格伯罗①的头子，控制着党的训练和组织。以后，在1959年，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地位在毛的最高的党主席之下。他在1966年受到了无情的清洗。我对后来的清洗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在同刘少奇的交谈中就可以发现，他具有一个伟大的施政者——或一个伟大的机械师的头脑。他的生活世界是党的内部事务。他干燥乏味地向我讲起了党的细胞组织，从农村的支部到铁路支部，从县支部到区支部，各级支部是如何活动的。刘少奇的思想纯正，但缺乏诗情。

邓发不是个知识分子，对他的访问颇值得回忆。他是政治局里少数几个可信的无产阶级出身的委员之一。年轻时是个码头工人的组织者，在一艘英国轮船上做过厨师，是一个无私奉献的革命者。象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一样，这个在孤独的生活中刻苦读书的海员，他的思想象目不识丁的人那样纯洁无瑕。他对理想的追求，就象库克船长②所经过的夏

① 原文Orgburo，意为组织部门。

② 詹姆斯·库克（1728—1779），英国航海探险家。

斐夷岛上的花柳病对当地居民的感染那样顽固和致命。邓发负责群众的组织工作，他的专长是口号。他热爱口号，解释着这条标语上的口号为何奏效，为什么另一条不行，怎样使它们具有批判性。对民众来说，思想应该是明白、简单、易懂的——这是正确的。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是一个明白、简单的好例子。这是一幅巨大的抗战标语，意思是，穷人要为革命的抵抗事业奉献力量、一切乃至生命；富裕的地主有钱，就要把钱拿出来，否则就后果自负。共产党从地主和富人那里敲榨钱财的作法是残忍的，可能比野兽还无情。但是我又不无乐趣地注意到，那时他们还觉得，富人的最高所得税不应当超过百分之三十五。邓发讲话时带有职业的热情，讲一些你怎样通过标语口号向妇女、向农民、向工人、向群众灌输理想的经验。我觉得他简直可以做一名麦迪逊大道①上的大广告商了。他想用他的标语使两千年的历史翻转过来；口号便是他的武器。

再说彭真。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是直接从中学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曾被当地军阀判过六年徒刑，到1935年才获释。这样，他可能是政治局里唯一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委员。但在从1937年到1941年的四年中，他参加了反对日本人的激烈战斗。他于1942年从前线回到延安的"抗大"，眼下正掌管着这座培养共产主义精英的最高学府——这是一所集西点军校、麻省工学院、利温沃斯参谋学院和哈佛大学于一身的

① 麦迪逊大道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美国广告业集中之地。

综合性大学。彭真顿时产生了一种让我神魂颠倒的魅力。

彭真非常简单地认为，历史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东西不能靠传统传下来而要由你去配制、化合、重新排列和包装，就象你根据公式用矿物质制做火药那样。他对历史怀有一种崇敬感。每一个胜利的中国王朝都要为它的前一代王朝编修正史，这样才有了二十四史的出现。但是它们都不是单纯的编年史，可能很多是骗人的名堂。彭真感到，党需要它自己的一部新编中国历史，没有理论，你是不能追溯社会之源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懂得中国历史，他说，也没有称得上是中国人的历史。也没有人懂得什么是中国经济。当卡尔·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彭真说，他使用的是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但在中国就不存在这类事情。他接着说，党连自己的一部革命历史都没有——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份文件供学生学习，再加上苏联共产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彭真并不想掩饰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无知，如对列宁的《两种策略》①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和其它著作知之甚少。他认为《资本论》太生硬难懂，其结果是他的学生们——被推荐上来准备担任更高一级职务，正面临考试的党和军队的积极分子们——正在编写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经济教科书。他们结成大则50人，小则12人的班组，

---

① 此书的全称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写成。

从文件、新闻报导、文章学起，经常交换各自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从他们的所看所感出发，他们创立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学说。遇到他们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时，这些班组便诉诸中央委员会或毛泽东本人，去征求合适的理论或指导。

彭真感到惋惜的是，他这所崭新大学的3,000名学生只能学习两年即被派去担任更高一级的职务。他解释道，他的主要任务表现在一句短语里，那就是"改造思想"。他说，这些来自前线的人们，不论是半文盲状态的营级指挥员，还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一番洗涤，都必须在理论上进行一番改造。开始，他认为这项工作可以在三个月内完成，但目前认识到，进行这种"思想改造"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然后再继续去学习军事、经济、卫生和行政管理。他的翻译和我共同寻找一个比"改造思想"好听一点的字眼，最终还是那位翻译提出了"提高觉悟水准"一词。这是我首次听到这个词，以后经过岁月的流逝，它越出了中国的国界，在60年代，进入了美国的社会，一时成为风气。

彭真对待他自己的历史是非常严肃的——理论上象一个学者那样严密推理，军事上象一个战士那样壮怀激烈，政治上则象一个党的工作者。他在1945年辞去了那所大学的领导职务与林彪一起参加对满洲的角逐并取得胜利，1951年出任北京市长，其后，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清洗。他的最后归宿是被遣送回到他的故乡山西。他所以免受更多的

侮辱，是因为他象其他在延安时期的人一样，早期就承认了毛泽东的上帝地位。如果他要撰写一本关于他自己探索历史的回忆录的话，它们或许能给那场他为之献身的革命以最出色的解释，但最终也不会让毛泽东感到满意。

毛泽东的上帝地位在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承认，只是不那么称呼而已。他只是一个“主席”，但却象耶稣那样，他去布道，别人在一旁聆听他的教诲。对他的崇敬是他在多年内获得的。是他在战场上获得的——他涉过江河，越过高山，率领过步兵冲锋；也是用他的不幸获得的——那是使他深感痛苦的事。他的第一个妻子和妹妹都遭受到了国民党的枪杀，两个弟弟也都牺牲了；大弟弟是在1943年，也就是我同他会见的前一年被新疆的省长勒死的。对他的崇敬也是用他的榜样获得的——他亲自锄他的一块烟草地，因为他是一个接连不断地抽烟的人。但归根到底，这种崇敬还是来自他作为导师的权威。他是一个别人都错时独有他自己保持正确的人。他最早同俄国共产党实行了决裂，那是1927年的事。以后，他欢迎并饶恕了象周恩来那样的只是简单地照搬斯大林的理论，搞无产阶级城市暴动的人。好象在毛泽东的胸膛里藏着一本用希伯来秘密哲学符号写成的历史书，只有他才能把它译解。他向同志们和领导人宣讲这本书，告诉他们中国在走向何方，他怎样把他们带到那里去，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必须做些什么。没有人对毛泽东提出过异议，他的精神力量是神圣的。他曾做过图书管理员，他读过的书尽管零乱，但数量却是巨大的。特别是他的意志，他个人的意志，和坚持不懈地

要看到这意志的实施，在20世纪，也许除了列宁之外，是最令人生畏的了。

有天早晨7点钟我就被弄醒了，并被告知说，如果我想见见这位主席，我应当马上同他一齐吃早饭。毛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他个人的窑洞里接见了我。这是一所修得相当整齐的窑洞，泥土地扫得干干净净，书桌上一尘不染。他在青年时期是个不修边幅的人，30年前在他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宿舍房间里，他后来讲起这段生活时说，脏乱、喧闹使同房间里的同学们不堪忍受。但后来，他对洁净的习惯竟达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并把此作为教义强使他所建立的中国的大街小巷都不留一点污迹。

这个人最让我着迷的不是他的相貌，而是他的风度所产生的力量。高大的身材，向后斜分的发型，上嘴唇上散乱几根虚弱的胡子，下嘴巴上长着一颗小痣，不管怎么说，他算不上美男子。他一讲话，发出的声音是干脆的、柔和的，既不同于讲台上的姿态，也没有规劝的企图。他对于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所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是个诲人不倦的圣人。当他走起路来时，一拖一拉的，轻松自如，有点象熊的步法。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平静地坐着，让他的才智从那懒散的躯体中产生出来。

我开始对他以一个国家元首的标准提出问题。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想团结中国的各派力量，这样才能共同协助我们反对日本人，我就问他改善同国民党的关系还有没有希望，“解开疙瘩”还有没有可能。回答是直率的：“没有法子解

开疙瘩。”谈判能否会有一点好处呢？只有一点十分渺茫的希望，他说：谈判只是国民党用来欺骗美国人的工具，“……国民党希望美国去击败日本人，他们再调转他们自己的枪口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不停地讲着。他目前不会袭击蒋介石的政府，但如果受到攻击，他会进行反抗的。蒋介石，毛说，指责共产党是“红色俄国的走狗”，使土地、女人都成为公有财产。在过去的四年中，蒋对他的党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对运动，但是他们党都生存下来了。只要蒋还在反对日本的前线上保留一部分军队，“我们就不会提出推翻他的政府的口号。”是的，由于他在各地区的领袖们的压力，他们正在考虑把所有的游击根据地和解放区连结起来，成立一个新的“人民政治参政会”，但是“尚未就此议做出决定”。至于美国，他并不反对美国向蒋的军队提供有限的供给，但我们如果用现代化的武器为蒋装备10个或20个师，蒋就会利用他们来打他了。美国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两方都不供给，如果美国人一定要供给，那么，他的要求是，应根据在反对日本人斗争中的实际作用，向双方都提供相应的供给配额。

持续了约一个小时的正式采访就这样结束了。因为他是在做一次国是声明，我答应把记录交给他过目获得许可。待到记录还给我时，竟被剪辑得没有发表的价值了。

然后我们都站了起来，进行了随便的交谈。他在我的记忆中得分最多之处是他的镇定，既不象蒋介石让膝关节不停地摇曳，也不象蒋对一个问题感到紧张时全身抽搐。没有人

持着电话记录进入，也没人在他谈话时插话打岔，这倒象在蒋的暗室和白宫里的椭圆形办公室中的情形。这里是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库。他，毛泽东，显然既不是行政官员也不是管理人材，而是个圣人，他思考问题时是一定不可打扰他的。当他同我踱踏时还说着话。那不是一场对话，我是一名学生，他正在开导我。他的个人性格是威严的，不允许同他相悖或争论。但同时又是让人畏惧的。当正式的问题都提完之后，我问到他们一旦获胜时，在大城市里的政策如何。大城市同他组织抵抗的农村情况是不相同的。在大城市里有报纸有杂志，他是否会让报纸竟相发表它们想发表的甚至是敌对的言论呢？毛给了肯定的回答。在共产党的新中国，会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新闻自由。在他明天的中国，人人都能在报纸上发表见解，在什么样的报纸上都行——除非是“人民的敌人”。我那时没有想起来问他一句：由谁来给人民敌人下定义。

他的知识，看来不象是科班的，从他的谈话可知他是那种自修型的人材，先是狼吞虎咽地读书，然后再咀嚼消化。他可以精确地引用马克思主义谈论西欧的土地拥有者和封建主义、谈论法国革命在使农民获得土地的时候资产阶级在法国的跃进式的发展。他在开导我时，把我在延安所看到的他的中国，和一个外国记者可能在福治谷①看到的乔治·华盛顿所领导的美国革命相提并论。他说，外国人目前对延安的原始

① 福治谷位于美国费城西北的斯凯尔基尔地区。在独立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中，曾经是乔治·华盛顿领导的革命军的主要营地所在。

条件的看法，就象他们可能在那里见到的华盛顿的营地时，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理想将使他成为胜利者一样。华盛顿有机器吗？他问道。华盛顿有电气吗？没有。英国人手中所有的那些东西，华盛顿手里都没有，但华盛顿胜利了，原因在于他有人民站在他一边。我这才认识到，在他读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时，没有完全弄清工业时期和电气化时期所处的确切时代。但这没什么关系：这个人是懂得他的国家的。这个人懂得理想可以使人民扛起枪来，权力是从枪口里喷出来的。他发明了现代的游击战学说，由穿军服的人们进行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男人、女人、儿童，不管自愿或不自愿都要没有例外地参加斗争和暴动。他的学说是不断革命论。就对他的人民认识程度而言，和我交谈过的任何领导人都比不上他。

用一句最简单的历史术语来说，他不是在同蒋介石竞选，他是在同孔夫子竞选。他要把两千年来的观念连根拔掉，再换上他自己的那一套。

我要去吃早饭，认为采访也应该结束了。但他看来对这种不得发表的训导式谈话兴犹未尽，我也颇得到了他的欢心，他又讲起来了。当他说该吃午饭了，并问我能否赏脸时，我不禁吃了一惊。我马上答应了。他的妻子江青（第三个夫人）走进屋子招待我们。她参加革命前是上海的一个电影演员。她那出众的娴雅仪容，尽管那天穿着厚厚的黑棉裤，仍不能被掩盖，令人有点着迷。她一边做饭一边和我们一起吃这简单的午餐。那时，她已三十二岁，比毛泽东年轻了将近二十岁，

他一定对她万般喜爱，我也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她的美姿。以后，很久以后，当她上了年纪时，也成了一名政治局委员，并且是血腥的文化革命的设计师之一。一个演员，不管是男是女，从事政治都是很危险的，因为政治会用对实际控制权力的沉醉，对有生俱来的戏剧表演功能实行扩张。江青是一个，也许是正果唯存的一个危险女人。但在那个窑洞里，她看来在与世无争地伺候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笑眯眯的，乐滋滋的，百依百顺的，同后来西方人所报导的皇后判若两人。

在那几周里，以及在一年后的重庆，我好几次见得到毛。但都是公式化的会见。他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第一流的———一个会用枪来思考的人，他的思想能强迫历史朝着他的理想迈进。

产生伟大历史力量的对话，在一开始就因为谈话自身的变化而被曲解是十分常见的事——美国民主党人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个在官方的首次接触时就遭到曲解的实例。中国方面的发言人是毛泽东，美国方面的发言人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毛是个天才，赫尔利是个白痴。赫尔利于1944年11月的第一周抵达延安，开始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这个谈判是被偶然事件拖离历史轨道的最明显的实例。

我现在把赫尔利看成是一个被割裂的人物形象——一半是他在延安机场出现时的形象，一半是我后来所报导过的在美国政治长廊里出现的形象，这两者都符合他的性格。我现

云才知道，他是硬挤进国内政治圈子里的，就是我后来在华盛顿所认识的那种类型的人物。他成为一个政客是在1928年堪萨斯市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为会场经理之一为赫伯特·胡佛拉选票。当胡佛赢得提名后，作为俄克拉荷马一个法人律师的赫尔利也根据传统的分赃政策，分享到一个职位。在大选胜利后，于1928年被提名为陆军部长。这是个为众多的美国内阁成员竞相角逐的显赫职位，能给世界以重大影响，非雄才大略之人不宜担任。赫尔利于1932年又重操他的律师生涯，参与过墨西哥政府和五家美国石油公司之间的一项协定谈判。墨西哥人没收了美国的石油资产，赫尔利用几百万美元赎了回来，获得了圆满解决。这样一来，他便作为一个善于谈判外国事务的能手而声名大振。战争爆发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想使两党一致努力进行战争，不仅录用象史汀生、诺克斯、洛弗特和福雷斯塔尔这样出名、显贵的共和党人装饰门面，而且还把三明治扔给一些名声较小，又具有一些装璜作用的共和党人，去做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象征性的礼节工作。因为中国在罗斯福的格局中位置较低，所以他就选派了时为美国陆军少将的赫尔利与蒋介石谈判，以建立一个由共产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进而取代蒋介石，在史迪威手下，就任中国的陆军总司令。

当赫尔利在1944年11月决定奔赴延安时，他在史迪威和蒋之间调解的工作已宣告失败。在他看来，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调解工作，困难程度要小一些。他对革命者的了解只停留在他的墨西哥之行中所获得的见识上，他把中国共

产党当作潘乔·维拉[1]一流的角色。赫尔利是个婆婆嘴，一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使用的是林登·约翰逊为代表的美国西南地区的饶舌腔调——他的信条是，如果因为他长时间的罗嗦使与会者谈得拢，创造出一个使各方互相了解的亲善气氛，那么这样的罗嗦是有价值的。赫尔利一张口就滔滔不绝，这种作风被一个年青的众议员描绘得活龙活现。他就是于1944年11月被罗斯福派到中国，一度做过大学的远东历史学讲师的迈克·曼斯菲尔德，后来出任过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这个曼斯菲尔德以简洁的措词向罗斯福报告道："我见到了赫尔利少将，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讲了两小时又四十七分钟，我讲了十三分钟就结束了。"

说赫尔利是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是指他是一个未能如实反映实际情况的人。他在1944年11月7日抵达延安时的盛况，使那天所有在机场的人们对他这场未作宣布的来访造成了误会。

我们有三人在机场目击了赫尔利的到来，在我们的著作中，对此次访问均有记载。约翰·戴维斯在《手执龙尾》、戴维·巴雷特在他杰出的回忆录《迪克西使团》等书中都记录了这一天。尽管我们的书内容不同，或许都是正确的。我对那一天的记忆是在机场写入笔记的，并在那天晚上又用打字机打下。

赫尔利喜欢戏剧手法——还有什么样的事情能比美国总

[1] 弗朗西斯科·维拉（1877—1923），墨西哥将军，革命家。

统的私人代表从天而降，进行美国和中国革命的首次高层会谈更富于戏剧性呢？而且事前没有宣布，未做通报，只有一个中士速记员陪同。是他记下了这场伟大的历史性会谈的记录。

那是一个阴暗的下午，戴维斯、巴雷特和我一起，到机场去等一架我们的气象飞机的到来，希望上面能有我们的信件。但我们发现空中还盘旋着第二架飞机，经过辨认才知道，那是几周前史迪威用过的个人指挥座机。一小群好奇的中国人象平时那样涌上来围观飞机落地——但从这架飞机里跳下的是一个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的美国军人，身着军服，外面套着大衣，裤线熨得象刀切似的，银白色的头发，蓄着少将特有的那种丛林般的小胡子，胸前的绶带从肩上一直飘到肋下。这就是我们都认识的赫尔利。作为最高军事官员的巴雷特走向前去致意，他穿了一件蓝色的中国棉大衣，显然被这位笔挺的特使认为是穿着便服。巴雷特是一个才气横溢的人，立即摆脱了这个窘境。他上下打量了这个将军，从头顶到脚跟都看一遍，回敬了他的观感："将军，看起来各大战役的勋章好象你都有，就是没有镇压谢司起义的。"这句话使这个将军大皱眉头，因为他没意识到此话的幽默所在。以后，象我和戴维斯以及所有在中国问题上向赫尔利进过谏的人一样，巴雷特也为此吃尽了苦头。

共产党对重大行动作出反应的速度总是让我赞叹不已。从机场到大本营一定有直通电话，还不到五分钟，一队参差不齐的士兵就从山那边跑步过来，一字排开，组成了一支仪

仗队。几乎与此同时，得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私人代表到来的报告，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一一出现了：毛泽东，穿一件皱皱巴巴，没有熨过的蓝色棉大衣；总司令朱德，穿一身普通士兵穿的那种桔黄色棉制服；总参谋长叶剑英，穿一身漂亮的毛料军官制服；周恩来，穿一件深灰色的皮夹克。那时的延安只有四辆汽车，毛用的那一辆是用救护车改装的。除了这一辆，其余的车辆都在为迎接罗斯福的特使进进出出，忙得不可开交。赫尔利那一表堂堂六英尺三英寸的身材，全身闪光，高踞于矮胖的中国人之上，就象约翰·史密斯①船长在波哈坦部族②的勇士们包围中一样。

赫尔利检阅了由这支松散杂乱的士兵组成的仪仗队，立定了一会，然后发出了一声尖叫——“呀呼！”——冒出了一句他的故乡俄克拉荷马土著乔克图人③的呼叫。我们一时都目瞪口呆了，但这可是罗斯福总统属意的人呀。我们都钻进那辆救护车——四位中国高级领导人、赫尔利、戴维斯、巴雷特和我。汽车沿着高低不平的车道向迪克西使团进发了。路上有一头骡子突然掉转方向，牵骡子的人看见汽车驶过来都吓懵了，用棍子抽打骡子。赫尔利一见，大叫道：“揍他，揍他，从另一边揍他。”然后，他向毛泽东解释说，他年青时是个牛仔，懂得牲口的性情。毛泽东说，他年青时也放过羊。巴雷特把这话翻译过去。他驾驭中文的本领真高明，细

① 约翰·史密斯（1580—1631），英国冒险家，美佛吉尼亚殖民地开拓者。

② 波哈坦（约1550—1618），佛吉尼亚的印地安人首领。

③ 乔克图人，印地安人之一支。

微的差别以及俚语客套都被他和谐地翻译出来。当汽车在延河干涸的渡口上颠簸通过时，毛介绍着这条小河怎样随雨水而涨落，有时激流滚滚，有时又干枯龟裂了。赫尔利这时对俄克拉荷马和干涸的小河产生了回忆。他说，夏天在他的故乡可以看到向上游弋的鱼群所掀起浪花和连接在一起的云彩。巴雷特一翻译，共产党领导人们都笑了起来；他们在这里的几个人都是人中豪杰。到了迪克西使团，我们都坐下来用茶，进行着愉快的交谈。一个记者的梦想就是在他不受注意的情况下把自己插入到伟人们谈古论今的场所。我的笔记，哎呀，在那个关键时刻竟搁笔了，因为我过于沉湎在这帮伟大人物的欢聚之中。那天晚上，共产党为纪念11月7日这个伟大的苏俄革命日，已准备好了一个宴会，我们都受到了邀请。对那个宴会，我回忆起来的甚少，除了赫尔利应邀讲话时的情景，其余全记不得了。只见他站起来，停顿一下子，又放大嗓门喊了一声"呀呼！"

对我来说，我和赫尔利在饮茶和宴会之间的交谈才是重要的。几天前，我刚和毛泽东进行过正式谈话。我把毛所说的事都告诉了赫尔利，并对毛作了简单描绘。我认为作为一个美国记者，在受到询问时，必须向任何一个位居要津的美国人作这样的简单介绍。我告诉他，毛泽东说了，这里没法子"解疙瘩"，没法子对已经萌芽的内战通过谈判进行和平解决，除非美国人承认共产党政府的实际存在，并把它看作是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独立盟友。

为这番简单介绍，我后来吃了来自两个方面的苦头。那

时，由于我的天真无知，没有认识到，我的记者职业是多么的有说服力，然而，又是多么的易招物议。当我同赫尔利讲这些话时，还不知道他这个未作宣布却并不简单的使命如果劳而无功，那将把他激怒到何种地步。20年后，当这些文件公开发表时，我读到第二天早晨，即那年的11月8日，赫尔利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文中汇报了我的“破坏性”作用。“西奥多·怀特，”赫尔利在秘密电文中写道，“……对我说他刚和毛主席谈过话，说毛告诉他，在他和蒋介石之间达成一项协议的任何可能机会都不存在。怀特还对我讲了毛为什么不能同意与国民党政府和谈的许多理由。怀特的整个谈话是百分之百地反对我现在担负的使命。”

这个小报告一定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档案里储存了许多年，然后又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灾难，那时我被指责为“把中国丢给赤匪”的人之一。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赫尔利马上当着毛泽东的面引用我的话。他们的谈话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一来，毛泽东的火气立即被点燃起来了。

这是一场公开的大吵大闹，我以前从没有和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和我争吵的是毛泽东的翻译，一个叫黄华的年轻人，现在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他大发雷霆，一边斥责我，一边叫我向赫尔利再重复一遍毛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你的，”黄华愤愤地说，“毛是相信你的；我们以前认为你是一个朋友。”

那是个非常难应付的场合，但却使人大开眼界。不论是

美国政府的赫尔利，还是中国的圣人毛泽东，都不懂得美国新闻业的功能。赫尔利希望美国的一名海外记者是实现美国目标中的一个武器；所以，我就成了他的叛徒。（我们的关系在六个月之后结束了。那时，在一场面对面，大声叫骂的争论中，他斥责我是“反美派”，並骂我“你他妈的，纯粹是个搞扇动的狗娘养的家伙”。从此，我们便永远分手了。）如果说赫尔利不信任我，眼前的共产党高官也不信任我，因为我向美国政府披露了他们的思想动向。以后，赫尔利在延安谈了三天，我一直被排除在谈判的门槛之外。那三天的谈话才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多年后，当全部文件都被公开时，明显地表现出赫尔利那三天的作为的悲剧性。赫尔利之行的一个简单目的是：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制定出一个休战或停战协定，这样结成了联盟，就可以增加而不是削弱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的力量了。

赫尔利抵达的第二天上午（陪同的中士速记员与会作记录）就同毛及其他领导人开始了会谈，出示了他和蒋介石以前共同拟定的条款：一个五点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两党都矢志于团结，共产党将得到合法承认，在将来的某一天，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矢志于进步的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要解散其军队，放弃他们的“解放区”政府（已经统治着9,000万人民），他们的军队要听从军事委员会的改组。

那天下午，毛作出了反应——是爆炸性的。他对国民党政权从上到下都作了谴责，指出，军事委员会没有什么权力，

只是一个割据军阀和地方部队将领的装饰性机构，其中只有一个位置留给共产党的部队是不够的，以此来让他放弃他那在中国首屈一指的部队及效率最高的政府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赫尔利说，这个协定将使你的一只脚迈进门里。毛说，如果你的双手被反绑在你背后，进去这个门里没有什么好处。赫尔利明智地提出建议，让共产党拟出一项自己认为是适当的解决条款①，他将乐意洗耳恭听。那个下午，他们为这个谈判建议暂时中止了会谈。

第二天是11月9日，星期四下午，他们又进行了会谈。共产党拟出了他们的书面提议，措词之绝妙，使赫尔利一点也看不出他们的强硬企图。赫尔利兴高彩烈地说，共产党的建议确实挺好，但就是迈的步子还不算大。他想改天再作评论。

所以，那天晚上直到第二天凌晨，赫尔利对共产党的提议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评价。我徘徊在他的身边，共同切磋，因为它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理解相互思想时必然碰到的对文字意思、成语和主题的翻译问题。

最让我们伤脑筋的是“自由”一词。把它译成中文，它的概念只能用“自由主义”等四个字来表示，它们的字面含义就是“各行其是的思想”，包含着“自私”或“人人为他

① 这些洋溢着生机，具有分水岭性质的谈话，其全部内容及经过可在两卷本的国务院文件汇编中窥其全貌（《美国对外关系》，中国部分，1944年——1945年）但在精神上令人感到最生动、最真实，也是最为突出的描述，当推戴维·巴雷特的回忆录《迪克西使团》。此书确实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可惜发表是在1970年，太晚了一点。——原注

自己”的意思。“民主”一词在中文里的翻译要追溯到古希腊，由表意文字“民主主义”，即以“人民的思想”作为统治的规则衍化而来。在美国的语汇中，民主是一个过程，翻译成中文，它就变成神学了。对于这些语言上的障碍，赫尔利全然不懂。他不是知识分子出身，只是一个美国民间的那种漫画式的人物。但那天晚间在迪克西使团的窑洞里，他竟以美国最优秀的传统改写了共产党的建议——而对共产党说来，当他们在10日的上午见到赫尔利的修改稿时，一定会被那修改过的提议弄得眼花缭乱。

在赫尔利的修改稿中，第一款便是团结：“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一致同意，作为三种平等的力量，共同抗日。这几乎是一些辞不达意的话——仅在概念上就令人吃惊——意思是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蒋的独裁政府）将被重新组织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所有的党派一律平等。在这个联合政府之下，还将有一个“联合的全国军事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军队共同对日作战；“从国外所得之供应将予以公平分配”，意思是美国将同时武装两党的军队。总之，经过赫尔利美国式的润色加工后，全文的基调完全是美国宪法和政治信仰的概念化翻版，既热情洋溢又让人翻译不出来。这个新的全国联合政府，赫尔利写道，将使人民获得“公正，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请求政府改正冤案的权利，人身受到保护的权利和居住的权利。”赫尔利在使美国承担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义务，在使一个东方国家接受美国的人权法案。

这些有约束力的信仰是詹姆斯·麦迪逊[①]和乔治·梅森[②]在美国革命之初向人民保证的。作为多余的装饰品，赫尔利还插进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式的革命："这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将实行旨在使人民具有两种行之有效的权利的政策：免于恐惧，免于贫困。"

对于东方这些荷枪实弹的革命者来说，这些条文的出现，实在好到了无法让人相信的地步，因为条文本身就好得不能让人信以为真。然而，如果罗斯福的个人特使能保证它作为谈判的基础，他们怎么能会说不行呢？他们是想获得承认的，美国人答应废除蒋的政府，代之以一个联合政府。美国人並且答应在这个政府里他们的军队和政府都将有资格申请所需要的枪支。对于人权法案，赫尔利坚持道，看来一定是翻译中有问题，使他们觉得既不可理解又不中听，因此它对蒋来说也一定是如此。但如果美国人能迫使蒋介石在这个稀奇古怪的文件上签字，共产党当然也会签字的。

他们并不急于等待这个重要仪式的到来。是赫尔利坚持要他们签字的。在一个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的秋日，在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文件被打开了。赫尔利签了字。接着是毛，他不是把印戳盖在文件上——这是正式签字——而是签上了他个人的名字。他的签字，才是至为重要的。一个空白处是留待蒋介石签字的，赫尔利为此作了努力和担保。这是奇迹，激动人心的奇迹，历史被创造出来了。那天下午，毛不愿乘

①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第四届美国总统。

② 乔治·梅森（1725——1792），美国政治家。

坐赫尔利的飞机离开延安飞抵重庆。他仍很小心谨慎。但周恩来要同赫尔利一道飞往重庆去进行谈判事宜。

周恩来在机场同他的妻子吻别，——这是我见到的中国伟人公开展示私人温情的少数实例之一。但也许他的心情并不宁静。蒋，正如我所说，那年秋天正沉浸在一种杀人狂的状态中。尽管赫尔利会把周作为一个谈判者予以保护，谁知道周能否活着归来呢？

我也乘坐赫尔利的那架飞机返回。除周恩来，还有他的秘书陈家康和巴雷特。我记得这是一次颠簸不停的飞行，气流在高空盘旋激荡，周恩来脸色冰冷地朝我正襟危坐。他或许对我有一股子火，因为我把毛泽东和我说的话告诉了赫尔利，或许他自己处于焦虑不安之中，认识到他正在从事一项没有希望的使命。我们在重庆一降落，我急忙跑去敲打打字机，发电讯稿。这是一个让人们喜得发狂的文稿，一个感情激扬的文稿，是关于和平怎样终于降临到中国，我们是如何站在天国和谐之门的。

《时代》杂志并没有发表我的文稿，正在远方不断运行的编辑部的过滤器，筛掉了我的感情佳作。事实上，它也只是希望和感情的升华，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谈判在不着边际地进行。双方都没有表现出灵活性。他们进行相互残杀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他们还要继续厮杀下去。眼下唯一有意义的问题就是看谁能最成功地说服美国人给他们提供枪炮去进行这场厮杀。还不到一个月，要求美国人为其安全负责的周恩来，申请一架飞机要飞回延安。出于面子，

赫尔利照允了。巴雷特与周同机返回，同毛泽东再一次会谈。结果使毛泽东又发了一阵子火，说他被赫尔利出卖了。毛经常被白人出卖——俄国人和美国人都有，在他的学说中强调亚洲的革命只能由亚洲人来进行，这个插曲肯定对他的学说产生了促进作用。所有的白人都是不值得相信的。毛挖苦他所喜欢的巴雷特，并暗示，他可能要把他和赫尔利在达成一致和平的秘密文件上的签字公诸于世界，把美国的出卖昭示于众。当巴雷特把这个敏感的政治反应汇报给赫尔利时，他也咆哮如雷。据巴雷特回忆："好一会儿，我真害怕他（赫尔利）的脉管发生爆炸。'他妈的——'，他吼叫道，'他戏弄我'。"

这是1944年12月的事。那一年的所有大事我都亲历了：我亲历了大饥荒和大溃退；当史迪威被解职时我正同他厮守在一起；在延安同巴雷特共同探索革命；在延安目睹了赫尔利的到来，同赫尔利和周恩来访谈并和他们同机返回重庆。至少可以说，我和其他记者一样了解中国这场斗争的实质，并了解我所参与的内情。我知道，共产党不再相信我了。美国政府不再相信我了——起码是赫尔利，总统在重庆的人，把我看成了一个敌人。国民党也不相信我，是因为我同蒋谈了河南大灾荒的事。但我自己却充满了自信，甚至是自负，知道我是在为《时代》杂志，为《生活》杂志而工作，我是卢斯在重庆的人。

其实，那时卢斯也在同我分道扬镳。我还未来得及从延安返回，重庆的情报机构截获了日本《同盟》新闻通讯社的

一份电讯稿，其中转载了《时代》杂志关于史迪威被解除职务的报导，并把史迪威的头像作为封面。我读了这家日本杂志的摘要，顿时头晕目眩。我不能相信它说的话。我偷偷送给卢斯的那十三页个人信件，是用史迪威离开重庆的飞机送达的，我在那里一板一眼，一桩一件地历数了导致史迪威去职的全部事实，我认为会成为货真价实的头条新闻的。《时代》杂志肯定收到了它，先是置之不理，继而便本末倒置地编造一个如此富于空想，具有如此强烈地倾向蒋介石的奇谈，刊登它只能把美国的舆论引上歧途——这是卢斯的职责，而我的职责则要预防这样做。

我同卢斯的争吵，始发于那年冬天，持续到1945年春天，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我认为，在这场争吵中，某些事情的重要程度要高于记者们同他们的编辑们的那种一般争吵。

第一，争吵的主题是中国。一场正在膨胀的革命事件要大于一场军事溃败，或一场阴谋斗争。一场革命正永远改变着政治的地理面貌，但是美国却被束缚在一个腐朽的制度和政权之上，并对这个政权寄托了战后亚洲的全部希望。想要制止或威吓这场革命是不可能的，将来要牺牲不可胜数的美国人的生命。这个问题在那时甚至就很清楚。虽然亚洲的这场革命和它对美国的影响，还依然围着一层帷幕。

第二，这道帷幕最倔硬的卫士，也是美国看中国所通过的那些最富有歪曲性的镜头，就是我为之效劳的那一家大众出版物——老板就是我的朋友卢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新闻业大王之一。

要戳破这道帷幕，那就意味着我不得不接受以卢斯为敌手这个严酷现实。

卢斯是个令人生畏的人。即使他与中国的事情没有这么重大的联系，他也能以其自己的能量置身于美国新闻史上的巨子行列。如果仅从对权力的研究，为卢斯的人格和思想多写上几笔也是值得的。这种新闻界影响公共政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个时期在报业老板控制的部分新闻界并没有受到过非议。新闻界的这种权力是与生俱有的，但是老板对他所发表东西的控制力也在呈现减弱的趋势。卢斯则是徘徊于这两种发展趋势之间的摇摆人物。

卢斯作为一个新闻界大亨，对他的权力是清醒的。这样的大亨今天已经为数不多了。他只负责平衡他的版面和良心，对于那些广告商、政客、记者、批评家等，凡是站在他和他希望他的杂志所处理的现实观点之外的人，统统不屑一顾。他本能地懂得现在已被人们说滥了的一个道理：新闻具有制定街谈巷议日程的威力。卢斯介绍那些只在一周或一年内有影响的人物和生活场景，有一多半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平常的东西。在他那个时期，在那个伟大的时代，卢斯创造了一些人物也毁灭了一些人物。他把一些无足轻重的人提高到国家领袖地位来宣传，正是他的这种努力破坏了他的事业。卢斯不能容忍别人控制他的杂志，也不允许别人说，是他在控制。他的记者从世界各地搜集事实。事实是重要的，但又是容易引起争论，可供引用，可供出售的。它们是办杂志的原材料。卢斯懂得原始报导的质量应得到多么大的倚重，但懂得这一点的编辑

是很少的。为此，他慷慨地收买报导。然后在纽约，这些报导再由他的编辑们按他的意图重新组装。新闻自由，他坚持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记者有想报导什么就报导什么的自由，另一方面，他具有否决他们的报导，或对报导按他的意愿进行改写的自由。

是他对中国的态度才使我们在一开始就成为亲密的朋友。他爱美国，也爱中国，想运用他的权力和影响使这两个国家永远结成牢固的联盟。卢斯有着出人意外的才学，既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伟大的实业管理人材，但超乎这一切之上的，他是一个基督教徒。而正是基督教才是他把中国和美国维系在一起的凝固剂。

在那个时期里，宗教之岸崩溃，口头的虔诚和社会的潮流伪装成新的信仰。卢斯所信奉的基督教看来是一个时代错误。但信仰是他的原动力，组织健全，思维严密的基督教同样可以象注入神学那样注入民俗学的福音。当他招呼来一个吓得发抖的编辑，说他对那个回家的孩子想了整整一夜，这个编辑就绞尽脑汁，苦苦思索是否在文章中忽略了一个什么故事——事情搞清楚了，原来是卢斯想的是《路加》福音中的那个回头浪子。那时，《读者文摘》的戴威特·华莱士，也有和卢斯相同的牧师家庭背景，也为世代相传的基督教信仰所驱使。卢斯和他也许是最后一批跻身于这类人物中的伟大编辑了。卢斯可能在他个人的放荡生活或浪漫史方面或在作为一个伟大的发行人必须对行政事务进行残忍的决断等方面，偏离了基督教的轨道和教谕。但基督教对他的编辑业务的指

导却是最出色的。也是基督教引导他与美国的黑人自由派进行了勇敢的战斗，引导他去谴责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在我们分裂的时候，卢斯的基督教信仰还孤注一掷地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他的传教士的祖先曾帮助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移植，蒋便是他们移植的产物，并担负着他们的希望。在史迪威危机中，卢斯觉得，不论错对，从他的道德观出发，他必须表明立场：站在支持蒋或无神论的共产党以外。对事件中的实际情况报导得愈少，对他所认为的事件真相就掩盖得愈多。他手中的杂志就是他的武器。

对这种观点，我持有强烈的异议。

我们的争吵不是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几年来我一直是他的心腹。因为他和我都认为，正是日本的罪恶才使中国由一个伟大的民族沦落到一个领土被日本占领的病夫。我们的分歧产生于中国成为我们的盟国，也就是在1944年春天的时候。那时，我飞回纽约，劝告他说，现在是我们最终必须讲出中国真相的时候了。蒋介石注定要灭亡，除非他能在美国的震慑下实行改革。从我们的交谈中，引出了我的一篇重要文章，《〈生活〉上的中国》。在文章中，我推着卢斯走向他所能走到的地方（文章中说："蒋的国民党集坦慕尼厅①和西班牙宗教法庭②的面目于一身，可能比它们二者合在一起还要坏。"）。他抑制住了我对蒋的愤怒，还依然对我在河南

① 坦慕尼协会的根据地，该协会是美国民主党的一派，成立于1789年，以纽约为基地，在19世纪后半期势力特别强大，政治上以腐败闻名。

② 中世纪天主教会在西班牙的宗教审判法庭，以恣意镇压、严施刑罚于异端闻名。

大灾荒中的表现充满热情，我也让我自己适可而止了。我们的争论集中在蒋介石的心灵和目的以及赎回那深重的罪孽是否有可能，美国(指《时代》《生活》《幸运》三杂志)是否要把他抛弃等三个焦点上。他全文照发了我的这份文稿——那是在我们之间进行了一阵非凡的笔战之后。

卢斯的思想和才智经常被他富于色彩和自负的行为特征所扭曲，也许引证一些我们的交谈能说明我们中的许多人长期对他忠贞不二的原因。卢斯和我经常交换备忘录。就在那年春天，对蒋介石政府是做一番扒皮式的揭露，还是撰写一篇悲伤而又有希望的报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产生了争论。当我们争论不休时，他写了一篇两千字的备忘录对我作答，现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摘录如下：

"在同样的人力条件下，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领导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这是相信上帝或别的任何一种信仰的核心所在……

"但这里有一些情况需要予以同情式的理解。中国人努力探讨使他们复兴的道德基础不是来自于西方，而是他们所固有，如他们所认为，是一种土生土长的道德。也许最让人们费解的事情……是，真正的道德源泉不是来自于这里或那里，而是如爱默生①所说，'处在宇宙的中心'，在那座城堡上飞扬的旗帜不是英国的，不是耶路撒冷的，不是麦加的，也不是孔夫子的。

① 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家和诗人。

"但现在我发现捍卫孔夫子的事业是件很陌生的事。但是我要捍卫……。必须坚定地，全面地看待这件事情……。（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接受不了19世纪西方的传教热情。西方人深深地相信一个自相矛盾的妄说：基督教和进步……。西方的人民，都被冒牌的知识分子引入歧途，洋洋自得于技术上的声色犬马；而陈立夫，正在把这一套一点不差地照搬过来。因为西方人在19世纪正朝着凡尔登和敦刻尔克进军的时候，他们也不妥当地对基督教和进步事业投了赞成票。这种西方的精神分裂症坑害了中国。基督教有其各种各样伪装（包括把科学作为理性），把迷信的偶像全推翻了在地……于是又乞灵于道德法律……。（但是）进步……也有其各种各样的伪装（包括把科学作为唯物主义），对中国进行剥削……进行挑战，进行羞辱。

"中国的反应是缓慢的，痛苦的和混乱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中国终有一天用自己的手接受改革——这正是基督教的代表人物虔诚希望的发展目标……。"

这份备忘录写了一页又一页，今天恐怕没有一个编辑会花费时间把他的全部哲学如此广泛地暴露给一个记者。我也写了同样长的一份备忘录，乞灵于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① 以及科学和理性来反对耶稣和孔丘。为一个可与之讨论问题的人而工作是件高兴的事，在整个过程中，圣经、孔丘以及一家杂志所贩卖给读者的东扯西拉都在谈论之列。我

①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1861—1947），英籍美国数学家和哲学家。

的这份备忘录在那时也同他的那一份在份量上一样——尽管蒋的政府无恶不做，但总比日本人或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作恶要小，蒋仍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这样，卢斯和我都共同痛骂了蒋的政府但又都称赞了蒋本人。只是在我又回到中国后，事实才说服了我，腐朽、怯懦、无能，无论对于美国或基督教的目的，蒋介石都不再是一个有用的血管了。我比卢斯更重实际。我不能对我所见到的置若罔闻，他不愿付印，因为那不符合他关于世界的哲学。

但当我于1944年夏天回到中国以后，这种腐朽发展的速度之快超过我原来的预计。日本人把华东战场上的抵抗力量一扫而光，那是史迪威所预见中的牺牲。卢斯手头有我关于史迪威危机的全部报告，他却把这个危机演绎成一个假话连篇，完全不光彩的故事。

我们之间的冲突以后又进一步发展到怒目相视的程度。那时，卢斯在纽约有一个心腹密友叫惠特克·钱伯斯，是一个具有非凡文学才能的共产主义危胁的制造者，其时担任着《时代》杂志的海外编辑。钱伯斯把史迪威事件说成是一个混乱的、腐败的、痛苦的、悲惨的并已在中国消亡了的故事。他承认蒋介石在实行高压统治政策，但又宣称蒋是在这样行事的：

“为确保民主原则在中国的最后一丝痕迹……正准备对延安进行一场不宣而战的内战。延安独裁政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如果蒋介石被逼迫接受延安的条件同延安实行合作，如果他被迫撤销对中国共产党区域的军事封锁，一个共

产主义的中国会很快取代重庆。与重庆政府不同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民），作为一个国际伙伴，倾向俄国（有两亿人民）的可能性要大于倾向美国（有一亿三千万人民）。”

美国必须进行选择，是这篇文章的主旨——要么支持蒋，要么把中国让给苏俄。象一般的具有启示性的故事一样，这篇文章的腔调及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全是错误的。

当我首次读到《同盟》通讯社对这个事件的简要概述时，我给卢斯发电报进行揭露："如果《同盟》通讯社所讲属实，那就无法维护我的正直人格，我就只好辞职了……。”卢斯回电道："你还是耐着性子等待着史迪威事件的全部故事见分晓后再说吧……。你总希望在这里受到尊重，但是，我并不认为，一旦你的编辑不遵照你的指教立即行事，就值得大动肝火……。”

待到这篇报导在《时代》杂志发表后又传回重庆，证实的情况比《同盟》通讯社概括的还要糟糕。我给卢斯起草了一封长达45页的信，为我申辩道，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民主。而我们的切身利益，需要支持一批最能帮助我们打击日本的人。如果扶蒋打毛，我说，就要把我们拖入一场灾难性的内战之中，等待我们的只能是失败。卢斯回电说，他对蒋的支持，并没有超过美国对英国邱吉尔的那种支持，属于对其它人民的政治"管闲事"范畴。

我们的争吵上升到白热化的程度。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发出了三封电报以辞职相威胁。卢斯只是提高了我的工资，并不想改变《时代》杂志的政策。我感到悲哀。是卢斯这个人，把我从无名之辈提拔起来，使我成了名；他和他的妻子克莱尔培养了我，在他们的家中保护了我，还介绍我同达官要人相识。现在，他正在把我抛弃，就象我的父亲公开承认我不是他的儿子一样。

我要做我能做的一切事情来保持或重得他的欢心。但是他培养成了我的新闻价值观。他赐与我的发表文章的名望，担负着一种职责——是对文章名誉，而不是《时代》杂志负责。我置身在中国，目击到这场伟大的革命并给予率直的报导。而他身在纽约，则感到必须把这场革命压碎。我不能在我目击到的现实面前退缩。他也不会从他看问题的方法上让步。我要坚持到底。我知道在报导中国的事务时，我是正确的，他是错误的。只要我还在他的手下做事，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了。所以，在以后的两年里，我利用了他；而他在利用我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满腹狐疑，直到我们分道扬镳。12年后，我们才又一次成为朋友，那是我们的感情克服了对宿怨的愤慨之后的事情了。

我们的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1945年的2月。共产党同意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又一轮谈判，结果以破裂而结束。我发回一个电报，提醒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所警惕。电报开头这样说："这是中国的新年，是互赠礼品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抓住这个时机向他们的人民送了一件既残忍又痛苦的礼品……

把未来的内战传递给他们的孩子们。”这份文稿的措词，一如我现在这样简练，完全是不偏不倚的，只是预告着悲剧要出现而已。

但钱伯斯对我的原稿一字不用，经他之手修改，我的报导变成这样一篇东西：

> “在重庆，中央政府和共产党的又一轮谈判已在僵持中结束。在快活的美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的鼓励下，共产党的谈判专家，精明儒雅的周恩来将军，已从延安飞返，在进行又一轮的尝试……。两周来，他同重庆方面的谈判专家，满腹经纶的自由主义者……王世杰……进行了漫长而又认真的谈判。重庆准备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和少数国防委员会里的职务……但当重庆方面要延安方面将共产党的军队置于最高统帅蒋的控制之下时，周将军却避而不谈……。周恩来什么时候再回重庆呢？他含糊地回答：‘不会很快。’”

以后，我和编辑们之间的电报官司，就这样你来我往，唾沫横飞地展开了。到了4月，我收到这样的一段电文：“在同卢斯磋商之后，他（特别强调出是他）觉得你做这些事较为适宜：呆在重庆或者重庆附近的某个地方至少四至五周，对中国进行非政治性的报导……（但）主要是小篇幅的富于乡土气息的奇谈轶闻。”接着，列举了他希望我报导的一个实例，是从伦敦一家电讯局关于英国第二千天战争的公

告上摘录下来的："……金黄色的藏红花怒放，一束水仙花售价一个半美元，下议院就自行车的后灯问题通过了强制性的法案。"电报继续告诉我："换一句话说，就是时髦的时代新闻……这个任务是有趣的，但非强制性的……所以你就有了一个为本刊组织稿件的大好机会。……也许你应考虑回到这里来稍事恢复。如何？"

我拒绝了"恢复"，一心投身于我所发现的"时髦新闻"的报导中。尽管象水仙花把伦敦打扮得婀娜多姿一样，重庆到处都有杜鹃花和梅花在开放，但英国的战事已稳操胜券——而在中国，共产党倾巢出动在日本防线的后方发动大规模攻势，使他们得以控制了长江流域。对此，我不能进行报导；对水仙花，我不想进行报导。然而，我还想在中国呆下去，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强打精神写一些令人高兴、阳光明丽的稿件，但内心深处，却象斗技场上的斗牛士，绝望和精神负担与日俱增。

对于这种阳光明丽的报导，我在中国记者站里的搭挡，我那时倾心热恋的安纳利·雅各比，比我更加娴熟。她憎恨卢斯、钱伯斯和他们的政策尤甚于我，她在打字机上把我们俩人的工作成果都储存下来。那年春天，她发现中国人能用传统的方式使鸡蛋站立起来。果不其然，在那个春天，真的有一个经过适当冷冻的鸡蛋是能够用其椭圆形的底部在任何一个地方竖立起来，但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她的文稿，引起了一直只关心战争事务的西方新闻界专栏编辑们的关注。有人为此走访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说这个把

戏是不可能成功的。安纳利为此向《生活》杂志发去了照片，表明爱因斯坦是错误的，中国人是正确的，鸡蛋是能站立起来的。这是个关于微观世界的特大新闻，安纳利为她的“这个不同寻常的鸡蛋的故事”，受到了各方祝贺。我也想竭力仿效她，但是我在那种状态下，不可能写出“令人高兴的”故事。

江坚才大夫（音译——译注）是中国最有名的中医。我写了他的故事，居然也获得成功。江坚才大夫的顾客大都是蒋介石内阁里受过西方熏陶的阁员，甚至也包括那个最高统帅本人。他诊断所有的疾病全是以“四风”侵入表里的理论为基础，他的处方是马的胆结石，制成粉末的蛇和公羊角，煮熟的小孩尿，从西藏麝肚脐上取下来的麝香，还有经过干燥的小动物的睾丸等中草药的混合物。他也是个针灸大师。这篇报导也发表了。

但对于中国的政治和被他们掩盖起来的震动我无处可诉，头脑中恍惚浮现出奇肯利特尔①粗厉凄楚的哀鸣：“天要塌了，天要塌了”，思忖着究竟是我还是我的老板发了疯。在我看来，这场革命正是我孜孜深索的历史组成部分——它宏大的场面，不允许任何戏剧化的手法将它进行夸大。我处在一个观察员的位置上。

因为我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不管《时代》杂志想不想

① 原文为Chicken Little，常在美国童话中出现的一种鸟，实际上并不存在。此处被用来形容作者矛盾、混乱的心理状态。

要这样的故事，我都必须同《时代》保持工作上的联系，让它维持对我作为一个战地记者的信任。从1945年开始，我就认识到了，免遭解雇的保险措施就是进行火线报导。我们是爱国的杂志，我们美国人在行为上是光明磊落的。所以，我就一如往常地把对首都进行政治观察的事交给了安纳利，而我，就跟随美国的野战部队，周复一周，日复一日地在野外奔波。

战地报导是对政治报导的逃避，对于我是轻而易举的事。我全神贯注的是士兵、弹药、坦克、炮兵以及枪炮的轰鸣。

我那时尚未认识到的一点是，我做这些事的重要性是同奔赴延安等量齐观的——都是政治性的。这场战争越临近结束，美国军队越在胜利中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本色。战争中美国军队的勇气和士气也象毛的游击队那样，来自于政治的激发和启迪。1945年，美国军队的战果是辉煌的——在亚洲，在太平洋也象在欧洲一样辉煌——如果不对把太平洋战争引向收场的所向披靡的美国战斗部队进行一番真实感人的回顾，那么，就不会有关于现代政治或现代历史的完整教科书。

第 五 章

胜利的政治：亚洲

要弄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是容易的，只要看一下那些农民子弟为了他们的事业怎样心甘情愿地去牺牲，怎样技艺娴熟地去厮杀就够了。要弄清美国在战争中的宏伟战略也同样是容易的，它已经或正在显示出来。正象历史学家按照登陆日期再现的那样，那全副武装的突破，连续的炮击和大规模的空中作战，受到威胁的护航和海战的胜利，高超的技术和高奏的凯歌都一一在实验室里呈现出来。

但是，要弄清在战争中拼杀、牺牲的美国人的政治基础则是件比较困难的事了。这些没人理睬的政治非常微不足道。而只有现在我才能认识到这些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可在那时它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几百万属于无名之辈的美国人在战场上奋力拼搏，对他们的祖国怀有一种缄默的，无可争

议的热爱与忠诚，当他们面临牺牲时，即使不是心甘情愿，也是无私、壮烈的。

那个时代的心情和气质距现在已很遥远了，美国在越南的灾难过后，在余光的映衬下，美国军队的勇猛顽强看上去有点模糊，好象受到时代错误的局限。也许这正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进行过出色表述的那种精神在驱使单纯的美国改变姿态。在他的小说《夜之恋》中，菲茨杰拉德让书中的主人公迪克·迪佛和一群美国人访问索姆②的英军战场。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七年了，面对重叠的山峦，厮杀的遗迹，将军们指挥上的失误，他们不禁目瞪口呆。迪佛强调这是对过去的讥讽。"看那条小沟，"他说，"我们只要两分钟就迈过去了。而那时英军花费了一个月才过去。整个大英帝国的行动都非常缓慢，前线在流血，后方在被包抄，……。扔下的尸体象无数个殷红的小地毯。"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迪佛又继续讲："你必须全神贯注地把你的情感细胞回复到比你的记忆还要久远的年代里。你必须记住圣诞节，记住印有克朗王子和未婚妻人像的明信片，记住瓦朗斯③街头的咖啡馆，记住翁特登林登的啤酒花园和市政厅里的婚礼。还要回复到德比④去，回复到你爷爷的连鬓胡子里去。"这是菲茨杰拉德1925年重访战地的情景，1934年

① 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小说家。
② 法国的一个省。
③ 法国的一个小镇。
④ 英国中部的一个城市。

他动笔写了出来。在1918年驱使人们奋勇拼搏的那种精神，同1941年促使美国人进行战斗的那种精神完全一致。根据我那时的观察和报导，那种精神象别的任何一种精神一样具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从1942年至1945年，我的全部战地报导只是那种精神的生动的外部表露而已。

我只是在1942年才开始报导美国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在以后的三年中，人人都能感觉到美国势力在亚洲的脉动，在战争的末期，明显地较在欧洲的脉动为快。在亚洲，开始它只是微弱地一闪，接着是起火燃烧，再接着是四处蔓延，而最后，燃起了冲天大火，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战争规模。这种脉动的原动力，我确信，不论是在欧洲战场还是在太平洋战场，还是在中国战场，都是来自于信仰所产生的那种勇猛精神，而这种信仰才是战争中的政治精髓。

这种精神是无法描述的，因为没有一个美国士兵会大声承认他热爱他的祖国。这种事是政客们干的。当他身处战场时没有人承认他是在为某个将军或某个总统效劳。但实际中出现的情况表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热爱确实是存在的。和我一起生活，共同飞行过的人们，不时牢骚满腹——对伙食，对“窝囊废”（我们的中国盟友），对泥泞，对牧师，对将军（不管是陈纳德还是史迪威），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常骂骂咧咧的。然而，当罗斯福去世时，我又见到有些人发出孩子般的恸哭。在1942年，他们没有什么歌可唱，只是经常吼两声：“你是我的幸福之源，我唯一的幸福之源”，当时这很流行。到1943年，流行的是“肩挎手枪的妈妈”，以后便

是“夜里的勃鲁斯”了。①我们中有些人学着唱。在一个喝得烂醉的夜晚，刚唱到“约翰·布朗的尸体正在坟墓中腐烂”，②一个来自南方的中校就咬紧了嘴唇，停下来说：“我们还是别唱这支歌了吧，谁嘴里再唱这玩意儿我就揍他个狗娘养的。”他产生了对近百年来的追思，歌曲已渐渐进入了他的灵魂。于是我们就不再唱这支歌了。随即我们又唱起了从德国传来的“莉莉·马琳”，从英国传来的“有一艘正离开孟买的军舰”。还有一首是从澳大利亚传来的“携带着偷来的行囊流窜”。那时，没有可称得上是伟大的美国战争歌曲；美国人也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即使是“妈妈和苹果馅饼”也不能使他们动情——他们的精神来自于对过去一个世纪的感伤，沉默无言却强大有力。

导致我把美国人的勇猛精神联结一起的纽带也许是第十一轰炸中队，我要面无愧色地为它歌功颂德。这个中队只有16架B—25型飞机，直到1943年它一直是亚洲大陆上唯一的美国空中打击力量。它是在战前才组建的一支部队，其中的不少人员都是属于志愿性质的。该中队以猛打快跑式的奇袭擅长，所以就其性能来说，应说是一支空中游击队。香港受过它的第一次袭击，河内受过它的第一次袭击，海防受过它的第一次袭击。在这些袭击中我都得以陪伴前往。在打完一场橄榄球或一阵扑克，或进行完一次自己无一人伤亡的漂亮袭击后，

① 勃鲁斯，一种拍子缓慢的爵士乐。
② 此歌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拥护联盟政府的北军所唱，这个中校来自南方，所以对此歌曲产生了厌恶。

或在放浪形骸的狂欢中或在前所未有的快活心情中，饮得酩酊大醉时，他们就对当官的发起牢骚。但这种牢骚是积极的，扯得都是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战斗士气实际上胜过战斗命令。

我记得，在1942年的圣诞节前夜，陈纳德命令退岗放假准备过节，因为大多数美国将军都不愿命令部队在圣诞节除夕出击。但这个中队却不以陈的命令为然。他们中有些飞行员认为，圣诞节除夕恰好是奇袭日本鬼子的良机，因为他们不提防我们。于是，当营房会餐之后，他们汇集了足够的人进入飞机座舱，起动了4架B—25飞机，谁也没有命令他们，全是自觉自愿性质的。他们在夜里腾空而起，越过萨尔温江，对那里的日本人进行轰炸。我们出发时，不少人还有点醉醺醺的，但这场突袭却干得很漂亮。我们在萨尔温江的峡谷里作跳跃式飞行，始终保持紧凑的队形，月亮照射着有围墙的中国式村寨，好象是一个个四方形的石块。腾越①，是我们袭击的目标，到达那里后，就朝它的主要街道上掷抛炸弹，那是日本人的仓库所在地。日本人作出了反应，他们的红色和黄色曳光弹紧紧抓住我们不放。我们返航了，紧跟着前头的飞机，好象这个混杂的小分队进行这种编队演习已经许多年了似的。敌人仍穷追不舍，我们的飞机也一齐发射了自己的曳光弹，有红的，有蓝的，还有白的，一齐闪烁，直到把日本人的压倒才罢。这时，我们再上升到预定安全高度，调整

① 缅甸一地名。

一下耳机，有个飞行员调到了由旧金山发出的对武装力量广播的短波频道，啊！他们正在为海外的军人播唱圣诞颂歌呢。我们都来听广播，在返回昆明的路上我们唱的颂歌是“啊，归来吧，所有你们这些忠诚的人们”。我们原以为这次违反命令的行动会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呢，但陈纳德只是对他的部下僭越命令的行为抿嘴一笑就过去了。

这种精神，年轻的美国人这种为结束战争天不怕、地不怕的热忱，首先，是源于我们的策略，其次，便是我们的战略。虚张声势可收到大胆计划之效，使人人都可以看到美国的武力能达到的范围。

一年后，又是在一个节日，1943年的感恩节，对福摩萨①的袭击，又是那个第十一轰炸中队去实施。的福摩萨距我们在昆明的基地有1,200英里之遥。但陈纳德把飞机包装起来，运到海岸线上一个叫陵岭的秘密机场，然后就征用当地的苦力背，用汽车运，给这个中队加上足够的汽油，使飞机能到福摩萨作一次双程飞行。感恩节的前一天下午，我们进行超低空飞行，在桂林加了一次油后，于黄昏时到达了陵岭。我们在一架飞机的机翼下集合，并被告知说，明天的袭击目标就是福摩萨。

要袭击的不是福摩萨全岛，目标是设在新竹的空军基地。新竹是日本空军的一个大活动基地。它们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从日本本土作连续飞行到这个岛上，再从这里飞到西南太平

① 即我国台湾省。

洋上，配置在那里迎战麦克阿瑟。空军情报机构报告说，作为对南线的补充力量，在新竹基地上，停放有日本40架轰炸机、20架战斗机。

当飞行员们得知，汽油仅够到达日本的基地再返回桂林时，都怏怏不乐。胜利，下达命令的军官说，依赖于三个条件：出其不意，此为一。如果日本人提前五分钟得到警报，他们就可从跑道上起飞，将我们淹没；其二，是天气——冷空气云团正由北往南移动；其三就是误差极少的飞行——新竹基地位于海滨，我们必须直接对陆上的目标自上而下地打击，哪怕只有一度的航行误差，就可让日本人把他们的飞机送上天。所以，我们被告知说，因为明天是感恩节，陈纳德下令给这个中队准备了一份特殊的饭菜，全是清一色的罐头火鸡和曼越桔酱，留着等我们完成袭击返回后再大啃大嚼。于是，就导致了这个中队唯一的一次造反行动，当时立刻就闹起来了。因为看来很可能有极个别的人在袭击后难以安全返回，也就难以吃到这顿美餐了。他们想在起飞前就享受感恩节的口福。我们的前线指挥官是克林顿·文森特上校，才刚满二十九岁；现场战斗指挥官是戴维·希尔上校，也是二十九岁。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人，对流血的战斗行动都有足够的理解。他们俩人都让步了。我们就在那前一天的夜里把感恩节的美餐吃了个饱。到感恩节那一天，天刚亮，太阳刚染红山背，我们就起飞了。

对福摩萨的那次袭击，虽然是美国空军在全世界进行的千百次漂亮仗中的一次。但是，这却是我第一次亲历的进行

得如此高明的打击。我们在看到海岸上的高山距离我们只有几英尺时，我们就把螺旋桨飞机下降到海面上，位置之低竟使激起的浪花溅进了机舱里。我们的驾驶员，是一个名叫雷·马扎诺斯基的小伙子。他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的波兰裔美国人，我们让他一定要找准新竹基地的确切位置。啊，找到啦，他用手指给我们看。日本人的飞机都在那里，翼尖靠着翼尖停泊在地上，红色的太阳机徽涂在丛林状的绿色机身上以便于伪装，正等待着我们呢。我们上方的战斗机有点沉不住气了。一架P——38飞机只用几秒钟的功夫就从我们上方一晃而过，盯住了前方空中的一架飞得很慢的日本运输机。待我们赶到时，这架运输机已经冒着烟朝下坠落了。我们把飞机上升到1,500英尺的高度，清理一下我们的炸弹，再迂回到日本飞机的上方，用我们的炸弹使停放在那里的飞机四处开花，火势向外蔓延，接着就从燃烧着的油箱上腾起一个个黄黑相间的蘑菇状烟云，看上去颇有特色。我们的战斗机对地上残留的东西进行扫射，包括军营在内，日本人纷纷逃窜。整个战斗，用我的秒表计算，没超过三分钟，这包括从海上接近，到达机场上方，开火，再回到海上。从看见第一架飞机接近陆地开始，到烟火在地平线上消失为止，前后也就是八分钟。当时，马扎诺斯基坐在驾驶座上，一架一架地数，接着大叫起来，我们的飞机都安全返航了，一架也没少，一个人也没丢，都在返家的途中。后来，通过统计，在那次袭击中，从空中到地上，我们共销毁了敌人的5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这对日本人来说，就意味着他们帝国的内海海域不再是安全

的通道了。因为福摩萨距离他们的本土只有750英里。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它的军事力量可以达到任何地方，日本本土只是下一个捕捉目标而已。

就是靠这种精神才获得胜利；就是靠这种精神和美国在教育和技术方面的巨大投资，才产生出这样的士气和威力。但打那以后，甚至就连我在那时也没有认识到这一“夸张”——竟成为美国被自欺欺人的空中战略迷住心窍的开始。30年后美国在越南的空中优势走上了绝路。

我对第一次产生这种“夸张”的记忆犹新。那是1944年8月的一个晚上，B—29飞机第一次从中国起飞，到日本本土对那里的敌人进行第一次白天轰炸。这些B—29飞机都是属于第二十轰炸大队，它们是那个时期最先进的飞机，航程可能超过5,000英里，只受哈普·阿诺德将军①和在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的指挥。它们是被专门生产出来消灭日本的。在1943年，根据设计和它的最大航程，美国可为它提供的最近的安全基地是中国。这样，在1944年春天，它们就飞过驼峰口到达成都，但不受当地的任何指挥和控制，无论是史迪威、陈纳德还是蒋介石都无权染指。它们纯粹是战略武器，是空军能投入空中的最强大的火力——望着它们飞翔，不断地把我和我们的将军们眼前的地平线向远方拓展开去。

第二十轰炸大队在那年8 月19日前一天晚上，就向飞行员们下达了战斗命令，用科学的分析，而不是胡思乱想，保

① 当时美国空军司令。

证使这场以中国为基地的袭击取得胜利。用一句足球比赛的行话来说，要使这次打击呈现出一种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风格。首先是介绍了关于天气和气象方面的情况，配有一幅幅巨大的图表。其次是一旦在某个地区被击中，进行救护的措施；再次是关于地理方面的知识，就是弄清日本与土八幡钢铁厂的位置，那是我们要在白天进行轰炸的目标。最后，由劳伦斯·桑德斯准将作一番例行的鼓气动员。桑德斯准将是这次打击的领导者。他讲起话来具有普通英国人讲话时的特点，发音浑浊不清，有些音节含含糊糊，但他的训导却是准确无误的：“小伙子们，打漂亮仗的机会就要到了，击毁我们既定目标的机会就要到来了……。你们飞行员必须按已定的海拔高度到达那里，还要保持平稳的速度。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弄得一团糟，那你还怎么希望你的投弹员去完成他的任务呢？这次奇袭将是猛烈的，但他妈的，这场战争就是猛烈的嘛。但你们要乘坐漂亮的飞机去那里，比他们梦想得到的任何飞机都要好。你们要对准目标各自为战。你们可要比他们棒多了，你们知道，那是一帮黄肚皮的坏东西……。”

那个对日本的第一次白天袭击的技术令人难忘。首先那个给飞行员的战斗命令就很长。但据现在回忆，最深的印象是我们能达到的范围及精神。在命令中谈到了这些B—29飞机在早些时候由中国基地出发的袭击中所经历过的挫折和胜利：他们对满洲的鞍山施行过打击，那是在北方的1,300英里处的目标；对荷兰的东印度群岛，也就是苏门答腊岛上的巴邻旁实施过打击，那是在南边的2,000英里以外的目标。这

个弧形打击圈给我的印象之深，使得我在我的笔记里第一次写下了美国的触角可以达到全球一类的话。有一个叫亚德勒的随军牧师，在下达完战斗命令之后，背诵起了马太福音，在场的全体飞行员也都一齐诵起马太福音来。在他们之中，不管是信仰天主教的还是信仰新教或犹太教的都没有例外地聆听着他给他们的祈祷："以祖国、后代及死者之灵的名义，阿门。"训导室里的人也都跟着他呐喊起了这些话，顿时给人以阴森恐怖之感。

第二天凌晨，飞机摸黑起飞了。它们的负荷都是满满的。携带的多是汽油，每只油箱都是满满的，装了足够飞到日本再返回的用油。成都机场的跑道那时在中国是最长的了，但仍让人感到太短而不舒服。我步行到跑道一端，察看一下飞机能否载着这沉重的负荷起飞，发现亚德勒牧师也在那里。当飞机一架接着一架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飞行员们斗志昂扬地腾空而起的时候，他就大声唱起了福音中的圣歌，好象是在以基督的名义给飞机的双翼再加一股冲力。阿门！

参加那次空袭的飞机都安全起飞了。他们让日本的国土血迹斑斑。但遭遇的危险比计划中多得多。美国的后勤保证为我们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十四架飞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没有生还——这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损失，我们是被禁止报导的。这样做是正确的。简单说来，是地理环境迫使这些B—29飞机在返回成都基地时越过中国的沦陷区。途中，日本战斗机起飞拦截了那些受伤返回的落伍者。显然，在那个时候，中国并非是驻扎远程飞机的理想之地。不久，当海

军陆战队也进入太平洋时，整个B—29机群都被转移到太平洋中那些岛子上去了。以后，就是从这些“超级要塞”出发，使日本夷为平地。接着就投下了原子弹。实际上，那套原子弹设备已在美国整装待发。能让远方遭到摧毁的威力，那天晚上看来令人毛骨悚然，以后变成了盲目的狂喜，装备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已超过了政治。

然而，在那个时期，政治确实是基础，是灵魂。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一接触到美国分散的武装力量，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人——手里做着苦活，嘴里发着怨言，但对死却不含糊。这种使士兵变为勇士，使领导变得大胆，用能感觉到的现实去点燃起的理想之光，正是政治所赋予的关键性威力。

以驼峰口为例。没有人知道第一架飞机是何时飞过驼峰口的，就连那个作第一次飞行的唐·奥尔德，也记不得了，可能是1942年4月9日，也可能是4月10日。飞越过驼峰口的人们（包括一个名叫巴里·戈德沃特的年轻中校）只是简单地认为他们做了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开始，他们的飞行要腾云驾雾，冒着1942年时还掌握制空权的日本人和喜马拉雅山带来的危险。他们驾驶着老式的DC—3型飞机，它们的上升高度很低，不得不借着太阳光斩关夺隘，而这样就会把它们暴露给日本人；如果在云雾中穿行，撞到喜马拉雅山的嶙峋怪石就会机毁人亡。伤亡人员很多，以至只好用C—87取代了DC—3飞机，但这种四引擎的飞机无法保养。驼峰口指挥部后来又接受了一批鲸鱼腹状的C—46型飞机，刚刚出厂，还没有经过

试飞检验，只好由他们在亚洲的崇山峻岭里进行试飞。他们自己制做了地图，把未命名的山峰、基地和降落场地都标了进去。待到战争临近结束时，这些地图上有一个叫丹巴斯塔普尔的降落场。这个空运大队的其它基地都是根据英属印度勘定地图来命名的，但丹巴斯塔普尔的命名却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日本人袭击位于一个英国茶园附近的一个降落场。一个名叫戈里·梅森的美国上校，看见他的人都坐在空地上，当发现敌人的飞机就在头顶上时，不禁吃了一惊，大声喊道，"快躲起来，你们这些愚蠢的杂种（dumb bastards）!"从此以后在官方的地图上就把这个机场标为丹巴斯塔普尔（Dumbastapur），属于印度。据我所知，这个降落场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那里。

来自驼峰口的运输量，从1942年5月的每月80吨上升到战争结束时的每月8万吨，那是现代空军后勤保证的艺术杰作，它在1948到1949年的柏林空运中又一次得到施展。以后，它就发展成为现代世界常见的那种航空货运业务了。

对我自己来说，对于那些日以继夜地越过喜马拉雅山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刚毅和技术佩服不已，它在测量人类精神方面给我上了一堂持续很久的教育课，使我第一次接触到一种极为珍贵的关于精神病科学方面的合理解释。真是一个高明的主意，华盛顿方面的某人实在太英明了，他往驼峰口选派了一位名叫唐纳德·弗里金格的"飞行军医"，他的军衔是空军中校。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精神病学家。看起来，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用来从一个基地到另一个基地来回走走，

漫无边际地同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们东聊西扯。据我现在回忆，当我就此询问他时，他解释说，他的工作是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懦夫，是不是胆怯到不能飞行的地步，或是决定这个人是不是在重压下生病到了不能再飞行的程度。而这个工作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弗里金格往他面前拉过来一个茶杯，就以这个杯子为例讲了起来。他说道，每个人就犹如一个茶杯。人是各种各样的，就犹如大的杯子和小的杯子一样，每个人都含有不同的气质能量。一个人如果紧张过度，就象个杯子里的水要外溢一样，什么事情都能发生。如他们会撞毁飞机呀，脾气变得暴躁呀，在判断上失误呀，在空中不计后果地行事呀等。有的人，他说，可能通过十次驼峰口，有的可过三十次，有的甚至可达到六十次——但不可避免地是，或早或晚，一个人总要达到他的紧张极限。而他，弗里金格是可以认识到这个极限的，要把这个达到极限的人在对他自己或他的机组造成危害之前，禁闭起来或送回国去。弗里金格更多关心的是那些劳累过度又被派往较远的地方去工作的人，对于懦夫只是偶顾一下。他测量不正常状态下的精神，用的是勇敢的表现指数，也就是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我在以前或以后都见到过。打那时起两年后，我就用从弗里金格那里学来的方法，用压迫感和紧张感进行自我测试。

也就是在1945年初，我放弃了对秘传中的中国政治进行报导的念头，正在扩大的内战之类消息已不在《时代》杂志的栏目中出现了。当然，在我内心深处仍关心着政治，我只是

用战地报导使我的思想获得逃脱罢了，或是企图强迫我不去想那些编辑们的事。在我看来，在战争结束以前，我只有和战士们相处了。我同他们所建立的同志关系是随和融洽的，是在合作中获得的。那时人人都是心情舒畅的。

从1945年1月，直到战争结束，我尽我的最大努力去参与各种战斗——而这些战斗又总是最终把我引向到政治和历史的领域。

1945年1月过后，战争在战场上进展顺利。史迪威所做的训练努力那时得到了回报。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充实在中国部队中充当联络和训练官员。在丛林里的吊床上，在泥土地上的草棚里，在古老的中国庙宇里，一边睡觉，一边为他们创建出来的军队自豪。

从一开始，美国努力的目标便是打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重开缅甸公路。这一仗在1945年1月中旬只用了十天就结束了。在回龙山顶，对坚守阵地的最后一批日本守军发动了攻击，这是一个转折点，其中还有一则动人的小故事。回龙山有7,500英尺高，三个由美国人训练的中国步兵师要爬上6,000英尺高的山背去肃清回龙山之敌——这是又一个歼灭战的杰作。那一天，攀登的山路很长，天气又热。美国飞机先在山顶上方盘旋。突、突、突，炮兵连发三颗烟幕弹，指示了日本人在山顶上的位置。接着是美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依次俯冲，倾泻的有凝固汽油弹、杀伤性炸弹还有重型炸弹。接着是炮兵发挥威力了：每隔一个小时就连放三个持续八分钟的齐射，每三个齐射过后，中国步兵就来一次冲锋，穿过

被炸弹炸倒的树木，冲向下一个制高点。再来一个齐射，可以看见身穿蓝褐制服的中国士兵匆匆地冲击山洞，把日本碉堡团团包围起来，居高临下地惩罚他们。最后，在四点钟，在明亮的太阳光照射下，美国人指挥的炮兵部队发出了最后一个快速齐射，中国步兵冲到山顶，展开老式的白刃战。我们当时在指挥所里，仅几分钟的功夫，便可以看到他们：头顶蓝天，威风凛凛地站在那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公路上。这正是联结缅甸公路和中国公路的结合部。从那个已占领的高地出发，对还在顽抗的任何日本据点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摧毁。我们知道，要不了几天封锁就会被打破。

现在，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两件事仍然栩栩如生。其中之一是山鹰飞掠到山坡上来啄食日本人的尸体。这些在阳光下曝晒了几天的死尸都腐烂了。但日本人的精神不死，他们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在离家万里的他乡死去。封锁被解除后，我唯一的战利纪念品，现在我还保持着，是一面在回龙山飘扬过的日本战旗，上面洒满了日本士兵的鲜血，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意投降。这些血可能是在战斗的最后一天，负伤的士兵洒上的，可现在都干枯了，颜色也褪掉了。确实，他们也是有精神的，可惜被他们帝国的军阀和官僚们糟塌了。

在战争收场的那几个月里，我几乎要得精神分裂症了。从战场上所传来的消息，简直让我激动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不禁产生出一种美国人的自豪。不论我们是否象日本帝国糟塌了它的人民那样，糟塌了战场上我们人们的精神、技术和刚毅，但我们会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无疑

等德国相机，如果你能碰到一个好的兑换比率，花2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架。丝绸和工艺品也很便宜，很少见到中国商人同胜利的美国人讨价还价的现象。甚至就连妓院的老鸨和舞厅酒吧店的老板都欢迎初尚的美国人。在这个解放了的城市里的第一个晚上，我们这一伙人就穿过欢呼的人群来到了一家舞厅酒吧。老板是个白俄，见到我们穿军装的美国人非常高兴，竟让我们免费大吃大喝了一顿——然后脱下帽子致意，让我们对这家酒吧里的女人随意挑选，任何民族，任何肤色，任何个头的女人都有——她们都被他享受过了。

我想第二天一早就进行政治联系。因为我知道，共产党是如何进行地下活动的，只要暗示一下周恩来或毛泽东的名字，我就可以在24小时内同共产党联络上。我马上被他们的地下工作惊呆了。他们遵照朱德将军的第一号和第七号命令立刻行动起来了。“红色工人”夺取了十个工厂，坚决地反对着支持蒋介石的“黄色工人”。新四军的部队逼近了上海，距城也就是10英里左右。学生们想实行全面罢课，红色工人的总工会也想实行全面罢工。他们声称他们控制着上海市里的若干市区，并能指出这些区的名字来。但在10天前，即8月25日，延安暂时收回了发动起义的号召。目前，他们的命令说，人人必须耐心等待。他们说，那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本人正在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纪律要求他们头脑冷静，以便让毛泽东拟出一个和平解决方案。

在上海，在日本投降后的两周里，美国军队如不登陆，共产党可以毫不费力地从日本人手里接管权力——即使他们

占领了上海，几乎可以肯定，也会被迫交出来的。在重庆和华盛顿的美国人正决定怎样移交权力，以及移交给谁。由于毛和周都在重庆同蒋介石和赫尔利谈判，胜利果实的分配将在那里决定。所以，我必须立即赶回重庆去，不能再滞留在上海寻欢作乐了。

当我到达重庆后，才发现毛和周已先我于8月28日来到了重庆，其时，我们正在东京湾为投降仪式作准备呢。赫尔利将军飞到了延安，就来重庆同蒋谈判时的安全保证向他们作了承诺。那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旅行。他是个拴在土地上的人。在延安人们的欢送声中，他在机场公开同他的小女儿紧紧拥抱，同妻子话别。有一个在场的美国人说他“象一个绑赴刑场的犯人一样”。毛神色不安地走进了机舱。当他在重庆露面时，穿着绉巴巴的蓝色制服，头戴一顶不协调的印度软木太阳帽，在这里他也受到了欢呼。之后，他就风尘仆仆地驱车来到那个最高统帅的深宅大院里。这个大院位于高出重庆市的山上。蒋把自己的一幢楼房进行了修缮，现代化的房间里安装了抽水马桶让毛居住。毛拒绝了所有的警卫，甚至连美国的军事警卫都不要。在进行严肃谈判之前的几天里，他和这个最高统帅，两个长期对对方的人员和家庭进行攻杀的人，进行了互访，在花前月下一起散步——最高统帅穿的是笔挺的中山装，有时换一身黑丝满清长袍；毛泽东，则是一成不变地穿着他那身从延安穿来的绉巴巴的蓝棉布制服。

接着，也就是在东京湾里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同一天，严肃的谈判开始了——周恩来同蒋介石政府里的对等对手谈；

毛和蒋所谈的，用历史的术语说，是中国的前途。

当我于9月第一个星期末回到重庆时，对话已经破裂。撇开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诸如中国的团结呀，中国的目的和独立呀，暴露出来的问题症结在于统辖区域的划分：谁来控制中国的哪些省份？谁的军队、谁的枪炮、谁的警察去控制日本人投降所交出的那些地盘？蒋的许诺和前提一如既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共产党也象军阀所做的那样把他们的军队置于他的军令之下，那么，毛和他的共产党就可以在他的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但毛和周不为所动。他们将向蒋让出整个长江流域和华南。但在华北黄河流域的省份里，他们既不让出也不接受蒋的命令。至于满洲——朱德的军队已经在林彪的统率下到达那里同苏俄的红军建立了联系，在用双脚进行着占领竞赛。那块地方，他们也是不会交出来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宣布了接受两个中国的意愿；蒋只能处理一个中国的事务——他的那个中国。

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接踵而来，而当时是一片混乱。在这样的时刻能捕捉的只是迷惑不解。人们都希望在远方的指挥中心里，有人能弄清各种日报的记者们随处采集到的有着相反内容的全部现象。在华盛顿，是谁，凭什么，在对这些现象进行判断，我们在实地工作的人是无从知晓的。

但是，我笔记本里的某些片断反映了对这种大混乱的感觉。

其一。据我们在重庆的情报机构报告，从莫斯科转来的消息称，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认为他是个民族主义分子，

不可能忠诚于共产主义。如果俄国人占领了华北，在整肃了共产党后，有可能把他清洗掉，就象俄国人对东欧共产党人的整肃那样。华盛顿方面一定也获得了相同的情报。毛泽东是在倒向哪一方呢？是加入美国人这一伙还是加入斯大林那一帮呢？

其二。收到的报告说，苏俄红军已和中国红军在卡尔甘，一个进入蒙古的门户附近进行了第一次接触。中国红军遭到苏俄红军的断然拒绝，有些人还被俄国人缴了械。在满洲，俄国人大肆劫掠，把所占领的城市拱手让与蒋的部队而不是让给中国共产党。

其三。中苏条约刚刚签订，它在震撼着中国共产党。是否象文字所表明的，它意味着斯大林只承认蒋介石，而不是中共他们，以此来换取蒋在满洲对苏俄索取特殊权益的让步？这里是否存在着我们可以同毛探求友谊的机会？

与以上相反的事实，一个是一位在美国空军情报系统工作的年轻上尉，刚刚遭到共产党的杀害。他叫约翰·伯奇，长着蓝眼睛，红头发，脾气刚烈暴躁。他能讲一口漂亮的汉语，以前是一名来自佐治亚州的传教士。我认识他，非常欢他，为他之死怜惜不止。但他的死因在那时就含糊不清。伯奇在后方是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顾问，他们曾同一批好斗的共产党部队交过火。究竟伯奇是作为一个犯人被共产党冷酷地杀死的，还是在激烈的战斗中被打死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对他的怀念后来就成了约翰·伯奇协会的种子。20年后，我在美国的政治界里，和这个协会有过接触。更为重要的是，

池是在内战中被共产党杀死的第一个美国人，这是我们所不理解的。

另一个在重要性上占压倒优势的事实是，中华民国是我们所承认的盟帮，蒋介石是它的总统。我们参加了这场战争，才招致了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为的是拯救蒋介石的"自由中国"。他是个把我们拖进这场战争的扫帚星。英国被拖进这场战争是为了拯救波兰，可是在七年后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共产党攫取了去。难道也让我们不知为着何人的利益而被拖入战争，也眼睁睁地看着"自由中国"被共产党攫取走吗？

一切事物都面临变化，世界地图要重新绘制，亚洲要改变面貌。但是，怎么变，怎么绘，怎么改呢？用扶植蒋？还是用承认毛？还是完全袖手旁观，让中国的军队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重庆的最后几天里，接到的最后一条消息看起来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毛和蒋的会谈陷入了僵局。我们已经开始用我们的飞机空运蒋的部队到沿海和华北的城市。魏德迈将军已经飞回华盛顿就接管问题进行协商。他的司令部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将军已经产生继刚刚进行的大规模地空运部队之后再来一次的想法。所以，当魏德迈不在位的时候，我被叫去参加一个军事会议。我只是一个战地记者，但对中国的政治和战场上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可能引起了一个或两个参谋人员动念，想听一下我的或许有用的意见。那次邀请我去开会的是乔治·奥姆斯达德准将，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但在和平时期是个民法专家，也是个随机应变的政客，后来曾竞选

过衣阿华州的州长。奥姆斯达德懂得，美国政治的动向要比空运能力的后勤保证重要得多。他要我来，我现在确信，是想让我证明他的论点，即空运蒋的部队到共产党控制区的大城市里去，在政治上是愚蠢的。参加一场内战既不是我们的职责也不是我们的义务。

奥姆斯达德要求我对将军们讲几句话。我指出空运蒋的人到共产党已占据农村，并对城市实行了包围的满洲和华北去，是一个可怕的冒险。我们把这些人空运到驻地或城镇，他们的供给还得靠美国的空运才能保证。如果美国人一撤退，就象我已经感觉到的那样，等于把蒋介石部队里的最美丽的鲜花摘下来，移植到一块它们根本不能成活的地方。其他几位将军被我的这些话激怒了。我的发言只是在进行政治判断，并不是在做军事实力的估量。我唯一的一次参与对美国政策的决策就这样结束了。于是，这个会议草草收场。有个准将，用前所未闻的对所有新闻事业的谴责语言，对我大声叫道："那里没有他们，你偏说共产党游击队在那里。他们都是美国新闻界杜撰出来的子虚乌有的东西。"他继续讲道："他们一没有枪，二没有人去封锁那里的铁路线。他们的能耐就是会让美国记者对美国人民宣传他们。象你和埃德加·斯诺这样的家伙就知道滔滔不绝地讲共产党的游击队和他们的什么区——就是你们这些小子助长了他们的气焰。我告诉你，他们不在那里。他们只是存在于报纸上。"这样的腔调我后来就听到得更多了。

不幸的是，共产党的游击队确实存在，就象我们的飞机

和空运能力确实存在一样。而飞机，空运力量，过剩的飞行员，现在对于我们自己的目的都成了不需要的了，这样，就不得不在逻辑上引起人们的关心。现在是不需要这些庞大的运力了，但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这些运力可以用来帮助中国迅速发展生产嘛——但蒋在华盛顿的影响占了压倒优势。在华盛顿方面看来，空运蒋的部队到共产党控制的区域，是一个方法性的问题。在我们控制的这张世界地图上，它只是一个地区性和后勤保证方面的决定。对于国内政治，它也是说得出口的，——一次宽宏大量的援助行动，帮助自由的中国人保卫他们的祖国。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解释，我也没有发表文章指出，其时毛正在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做出选择这一事实。是我们逼迫他选择了俄国人作后台，在以后的20年里，他对俄国人的依靠并不舒服。

也没有人认识到，我们是在第一次使美国卷入亚洲的一场内战。

所以，当空运开始时，我们的思想就被我们的空中优势所毒害，在一步步地引导我们和中国走进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

所以，就在这场大战结束的时候，我同我的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抵触，也同我在《时代》杂志老板的专治统治产生了分歧。卢斯决定，在战后的最早两期《时代》杂志封面上，分别刊出两个伟大的英雄头像，第一周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下一周是蒋介石。蒋的事迹分配由我来撰写。我觉得，

此举对《时代》杂志是最不明智的，用通常的措词，只能把蒋说成是中国的又一个正统的昏庸暴君。我直接给卢斯回电，粗暴地拒绝了他的这一指派。他立即作了答复，指责我具有政党偏见。我回敬他说："这里的工作在严厉的束缚之下做得平平淡淡，寻寻常常。我对公开的党派斗争深恶痛绝……只有在本周达成一次妥协才能避免内战和由此而产生的一方或另一方的全面胜利……我身处实地，接触的全是事实……。在过去一年中对中国问题（在《时代》杂志上）所作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表现出了我们在观点上的分歧。"这一次，我要求回国进行解释；这样一来，再没有什么拖延的余地。他命令我立刻回国。

在我离开重庆的前两天，有一天夜里，我爬上了我喜爱的一座山，向它告别。这是重庆城里的一个制高点，上面长满了片片青草。朝下望去，可以看到嘉陵江从峡谷中穿过，在不远的地方同长江汇合。爬上山的最高峰，弯弯曲曲的河道，和灯光所组成的螺旋形链条都尽收眼底。眼下灯光把重庆照得通亮，对它的山背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感觉。一轮圆月当空高悬。我想起了我还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在这一块一块的草地上挤满了一拨一拨的中国人，他们正在为昔日对这个城市的希望而凝思，他们是七年前从日本占领下流亡到这里来的。已经在这个难民充斥的城市里生儿育女，步入老年。他们曾对蒋介石寄托过信心，对中国寄托过信心，现在，我推测，他们就要重返故园，去上海、天津或是中国别的某个令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去重建家园。他们都静默无言，在

月光下，完全的静默，只是看着河水，盼望着归乡。他们曾希望回复的过去那番景象，恐怕永远不会再现了。

我，我也要回归故里了。象他们一样，我将会发现这里不存在我重新回返的道路。我刚到这里时，是个希望成为一名历史学教授的小伙子，但我见到过的历史学教授实在如汗牛充栋，以致我再不想当那个历史学教授了。目前，乃至我的余生，我要做的只是一名记者。如果我能尽快地回到国内，作为接触到中国故事的第一个人，我要把我收集来的报章杂志编纂成一本书。

对于一个新闻记者，关系是一张可以永远兑换现金的银行支票。我同司令部有关系，他们可以为我挤出一张第二优先的乘机证明——一张航空卡之类的东西可载我在一周内离中国回到纽约。在9月18日，一个星期二，在那场大战刚结束后的两周，另一场战争的刚刚开始之际，我踏上了飞赴纽约的飞机。那时已见端倪的对蒋的军队进行大规模空运所导致的灾难，后来使他们陷在东方的泥沼中不可自拔。飞机满载着蒋的士兵朝东方飞去。我坐的飞机却是朝西方飞去的。我最后一次飞过驼峰口，越过印度大地，横穿非洲大陆，飞机在卡萨布兰卡作一番逗留后，接着就飞渡大西洋，到达了纽约郊外的弗洛里德·本涅特空军机场。不可思议的是，在没有军用通行证的情况下，我要自己掏腰包租车进入曼哈顿。尽管我还穿着军服，实际上我又一次成了平民百姓。自由了，再不受约束了。

我一回到纽约，就立刻爱上了这座城市，而且爱的程度

超过了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城市。我驱车进城后，下榻在古老的新威士顿饭店。第二天一早，就上街买了一套西服。我离开美国时，只带了一套要扔的旧衣服，还有一套新衣服，那还是我的母亲为我挑选的。如今，七年过去了，即将上班工作了，要为自己买一套美国式的服装。不是制服，而是一套真正的西装。因为我仍着戎装，售货员就给我打了折扣。穿上这套黑条纹衣服，那个售货员说，我一下子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百姓。我再也不回波士顿的家乡了，中国也不再是我的家了，尽管我那时对此并不了解。

我迫切要做的事情是清楚的：写一本书，解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本书要说的事情不仅仅是第一手的，第一流的，而且也是快速的。“快”是精髓，因为，如果信息要对社会的理解力予以指导的话，它就必须及时地被发表出来，通过人民的渠道反馈给政府，政府才能根据对这种压力的反应做出决策。我的信息是重要的。它是新闻，而不是历史。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探讨对于记者和他所报导的人物来说新闻的威胁究竟比历史大到什么程度。在那个刚从战场归来的时刻，我下定决心成为第一个去报导蒋介石政府不可避免的垮台的人。尽管这将意味着要同《时代》杂志和卢斯要发生全面冲突。安纳利也将在几周内从中国归来加入我的阵营。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洋洋自得于这样的一个错觉，即我们可以使事情朝我们指引的方向前进，只要我们明确无误地指出了这个方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
作者＝
页数＝２８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